

求真雜誌

第一卷 第三期

要 目

評『下關事件』	時事評	鶴臯明
怎樣消除內戰	海明	
法意選舉之意義	論	

論官僚制度

戰後國際政局之演變

劉少嚴

美國六十家族之戰爭利潤

喬治·沙爾

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

蔡尚思

再論老子與孔子——答歐伯先生

李季

維新運動底階級基礎和解放意義

唐虞世冰夷編譯

論文藝復興時代西班牙的戲劇

英國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續完）

朱維基譯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三）

李毓鏞

求真雜誌社出版版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一月一日

信孚實業公司

化工原料大本營

福州路四三一號
電話九七一四一七七四

華富運輸行

HWA FOO TRANSPORTATION CO.

電話：九二七七五四五六九一

事務所：漢口路四五五弄五號

承接

水陸運輸
代客報關
起卸工程

專運

方工廠鍋爐
棚引擎
重大機器

求真雜誌

第一卷 第三期 目錄

評「下關事件」	時事論	鶴臚(三)
怎樣消除內戰	海明(五)	
法意選舉之意義	海明(七)	
評官僚制度		

戰後國際政局之演變

劉少嚴(一五)

美國六十家族之戰爭利潤

喬治·沙爾(二四)

數以萬萬計之贏利

曉山譯(二四)

戰後企業界的利潤將有怎樣的龐大

謝山譯(二七)

利潤與工資

少棠譯(三〇)

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

蔡尚思(三四)

再論老子與孔子——答歐伯先生

李季(四〇)

孔子不會革貴族的命

陳振維(五一)

維新運動底階級基礎和解放意義

唐虞世(五四)

論文藝復興時代西班牙的戲劇

冰夷編譯(五八)

英國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續完)

朱維基譯(六八)

求真(詩)

羅式熙(七八)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三)

李毓鏞(七八)

編輯餘談

編者(六七)

上海南京路中
央大夏一一三

號美星公司電
一八四九九



Manufacturer of
All Kinds of Hand Emb'd.

SILK GARMENTS
LINEN NAPERY
EXQUISIT HANDKIES
WHOLESALE & RETAILS

TRIAL ORDERS CORDIALLY INVITED

新華酒家

粵菜茶點

整桌筵席

高等質料

精美和菜

份量豐富

地址廣西路三四五號

電話：九一一九五號

時事評論

評「下關事件」

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名和平促進團體代表馬敘倫、黃廷芳等十人，赴京請願，呼籲和平，於甫抵車站時，即被所謂蘇北難民代表數百人包圍毆打。代表中重傷者有馬敘倫、閻寶航、雷潔瓊、陳震中四人。大公報、新民報及益世報記者亦受毆頗重。此外，毆打者並將被毆者之財物（如皮夾、現款、手錶和自來水筆等）洗劫一空。這是所謂『下關事件』。

自『下關事件』爆發後，不但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注意，發生了相當的反響，且掀起了各方對這一『事件』之是非的爭論。正當全國民眾要求民主，反對內戰當中，而在首都的青天白日下竟發生如此『毆打事件』，我們認為有將事件的真相加以檢討並評斷其是非之必要。首先讓我們摘引外國通訊社關於此事件的報道來看吧：

『聯合社』南京廿四日電：『上海人民團體推派來京請願之代表馬敘倫，……等一行，昨夜抵下關遭羣衆毆打。……行兇羣衆似「甚有組織」。車站警察，於出事時，并未予以干涉。和平代表四人……及中國記者三人，已因受傷送入醫院。憲兵對行兇羣衆，亦未見加以逮捕。共產黨指稱：此次事件係由國民黨「特務分子」造成，……中央日報論調與此完全不同，據稱：係因蘇北難民請求代表匯濟而起。……

『法國新聞社』南京廿四日電：『上海各和平促進團體代表十人晉京請願，昨日午後七時半達到下關車站時，遭遇意外事件，代表十人中有四人受傷，中國記者三人在騷擾中亦受輕傷。先是火車達到鎮江車站時，有身穿紡綢長衫者十人，自稱為被中共趕出蘇北之難民，要代表馬敘倫勿往南京。此輩并不明示意向，但暗示或將發生『若干事件』，……各代表當繼續來京。據其目睹者稱：昨日午後六時三十分時，即有大批羣衆分成各小股，在下關車站等候，另有一部份憲兵在車站各出入口佈崗。各代表下車穿過站門時，人叢中有口笛一響：『打，打！』之聲四起。……某代某移步向前時，喊聲又起，石子如雨點飛來，該代表不得不急急退避。僵持片刻後，外面之羣衆，衝過少數憲兵，進入車站。本社記者目擊代表數人即被迫進入候車室。中國記者三人亦被迫至該處。羣衆逐漸增加，五人或六人一組，陸續加入，待至午夜時，有穿白衣者高聲發令，當有數人在喊聲中穿破候車室窗戶，闖入室內。各代表及記者乃被痛毆。……騷擾歷數分鐘，迨至午夜時，暴徒乃一哄而散。候車室完全被毀，傢俱全被破碎，各代表渾身血跡，衣衫被撕成片片……

據『聯合社』和『法國新聞社』記者們關於『下關事件』的這兩個報道看來，其描敘雖有詳略之異，但說及事件的經過却是大體

一致的。因此我們有理由根據它們來作為分析事件本身的可靠資料。

從這兩個報道中，明白地指出了以下兩個要點：（一）這次敵打不但顯然是有組織的（如聯合社稱『似「甚有組織」』，及法國新聞社說『大批羣衆分成各小股』，『有穿白衣者高聲發令』……）；而且是事先有計劃地準備起來的。（如在『鎮江車站時，……有身穿紡綢長衫者十人，……要代表……勿往南京……暗示或將發生「若干事件」』，這就是事先有計劃地佈置這一敵打事件之明證）。（二）憲兵、警察分明對敵打的暴徒採取了完全縱容的態度。因為在事前，敵打者之分組佈置，憲兵警察既未加以任何阻止，而在敵打時，他們又『並未加以干涉』（聯合社記者語），甚至在時間延長至六小時之久的紛擾狀態中，也未及時報告上峯，請求派遣援兵來鎮壓。這顯然證明警察憲兵是奉行某種命令在『作壁上觀』。假如不是這種解釋，則現在的首都簡直已陷入無政府狀態中了！然而這令人相信嗎？

最後的問題是：像這樣事先有計劃有組織的敵打舉動，究竟是出於『蘇北難民的代表呢？』但就全部的事實及其邏輯看來，都是十分可疑的。因為：（一）如果真是仇恨共黨的蘇北難民代表，那他們首先就應直接同被派駐南京的共黨代表們有所舉動。但他們何以不直接向南京的共黨代表們施行報復，而偏要來敵打『要求和平』的上海代表團呢？有人會說：因為要求和平的代表團是偏袒共黨的。假定這話是真的，但我們又要問：何以『難民代表』竟放過他們的直接敵人，而反來向其偏袒者進攻呢？即是最精於詭辯的人，恐怕也無法解答這一問題吧！（二）再退一步說，行兇者確是『蘇北難民代表』，但何以政府治下的軍警對此種『代表』竟如此客氣，如此放任，而不敢加以任何干涉？對此只能有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那就是這種『蘇北難民代表』是與政府治下的某種特殊組織有其特殊的直接關係的。但與『特殊組織』有特殊的直接關係的『蘇北難民代表』，也就遠非普通的蘇北難民代表了。所以由普通的蘇北難民所組成的『蘇北流亡難民回鄉促進會』的負責人李鴻儒宣稱：『前日下關事件，絕非該會主張』。（文匯報二十五日南京電訊）也許有人還要辯解說：政府已事後對下關事件表示惋惜，並擬懲辦肇事者。但事先既不加以阻止，事變中又不即行鎮壓暴徒，專在事過之後來表示惋惜，却未免令人有『貓哭老鼠』之感哩！

由前面的分析，『下關事件』的真相是很明白的，這是『校場口』一類的把戲，是某一特殊組織在幕後發動起來的。然而在現時，這種舉動不但是極不名譽，而且在事實上對於當權者也是沒有任何效果的。政府當局既已再三宣佈要『還政於民』，並『信誓旦旦』地允許人民『四項自由』的諾言，何以連和平請願的代表也不容許，而要加以這樣不名譽的對待呢？假如政府當局認為這次的請願者有不對的地方，或是偏袒了共黨一方面，政府當局儘可以據理力爭，甚至加以申斥，又何必要縱容（不加干涉就是縱容）某種特殊組織來幹這種不名譽而又無效果的勾當呢？

『要求民主』，『反對內戰』，這確已成了現時各層人民的最迫切的願望，不管是國民黨或共產黨，誰如果硬要違反這一『願望』而一意孤行，誰就將要遭到人民大眾的深惡痛絕，其後果是可以推想而知的！（鶴臯）

怎樣消除內戰

六月六日，正當國民黨軍隊收復了長春，向哈爾濱推進的時候，國府主席頒布了一道停戰令，限期十五天，其主要內容為完滿解決：（一）完全停止東北衝突之詳細辦法，（二）完全恢復國內交通之詳細辦法及進度，（三）獲得一確切之基礎，迅即實施本年二月廿五日有關全國軍隊復員整編統編之協定。」（六月七日申報）但據另一方面消息，除了這三點公開的目的之外，政府尙有所謂『加重馬歇爾之仲裁權（最後決定權）』的提議。

自然，根據大戰後短短九個月的經驗，我們知道停戰令之後，一種顯然冗長、繁雜而又無效的秘密協議又活躍起來了。久已在東北撕殺中，蟄伏不動而被人忽略的『第三者』又紛紛入京了。但直至今天，這一次停戰令已過了期，二十一日，國府主席又下了一道延期八天的新命令了。到底他們在談些什麼，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這種談判阻緩而且毫無成效，我們相信每一個中國人民都在發生疑惑的。據雙方代言人說：『談判的詳細內容還不到宣布的時候。』這當然是『人民世紀』的出奇的作風，人民的命運居然被人在背後來決定！不過無論如何，根據報紙的不完全的報道，我們終歸可以看出一種合乎邏輯的真相。

停戰宣布後，周恩來立即飛返延安，他第二日從延安帶返一個提案，其內容如何不得而知。但據廿一日，即停戰令期滿而又宣布延長八天的那一日，中共代表團『致蔣主席及政府代表』的『建議書』看來，共產黨提出的條件是四項：『（一）由三人會議立即宣布東北長期停戰，並重申全國停戰令，規定停止一切軍事衝突之具備辦法，命令雙方部隊嚴格遵守。（二）停戰令下後，由三人會議立即協商，恢復全國交通之具體辦法，並首先修復重要鐵路。（三）由三人會定期商定全國及東北整軍復員之具體補充辦法，並立即付之實施。（四）由政府經協商定期重開政治協商會議，迅速解決改組政府、保障人權、解救民生、完全統一等各項政治問題。』（六月廿二日申報）

在新談判過程中，政府方面顯然堅持僅談軍事和交通問題，政治問題則認為是『空泛題目』。現在我們就僅拿停戰令指定的軍事問題來觀察一下，看雙方談判的具體內容如何。主要是關於整軍問題，本來今年二月間成立之協定會規定東北國共軍隊的整編比率為五與一，後來因為蘇軍撤退，共產黨領導之『民主聯軍』攻佔長春，所以延安方面認為形勢已非，又要求修改原定的比率，直到最近，雖然國民黨軍隊已奪回長春，將共軍逐往北滿，但延安尙堅持原來的意見。當然，國民黨軍隊既已在東北新佔優勢，牠不會在這個時候反而向延安讓步的，故據申報南京十九日電，政府對國內外共軍人數及駐區均有明確之規定：『東北方面許可共軍在齊齊哈爾、海蘭泡、永吉駐兵三師，但在華北方面須減除二師，共軍並須退出哈爾濱、熱河、察哈爾、及山東之烟台、威海衛；且須退出津浦線之德州、泰安、臨城及臨棗支線之棗莊及張店、周村、膠縣各地。』中共方面對駐區之要求則包括東北吉、黑和熱、察、綏三省及冀、魯、豫、皖、蘇各省之大部。』（見六月二十日申報）關於政府方面的用意據中共解釋說：

牠『企圖將中共部隊在整軍期間，排出大城市及鐵路線，以便消滅。』（見申報載二十一日中共建議書）這就無怪中共把這一點視為『生死關頭』的爭執了。

此外，政府爲了保證今後一切新協議的順利解決和執行，不惜將『最後決定權』（Final decision）交之於馬歇爾之手，後來雖然因爲中共的堅決反對及外間輿論之攻擊，改爲『多數決定』，但這終究對中共而言是致命的，所以一直僵持不決。

從上面整理出來的事實中，我們大致可以明白：國民黨政府乘着東北戰勝之餘威，向中共提出了一個哀的美頓式的要求，限定於十五日或二十三日內完滿答覆，否則其後果，我們不用說了。其實所謂停戰、談判，用不着克勞塞維奇將軍說出來，我們現在也充分懂得，只不過是在一種新的軍事佈置之前爭取戰略時間的手段吧了。談判的雙方却以外交的辭令暴露出這一點。去年日本投降之後，當共軍幾乎控制了整個華北，政府一個兵也沒有的時候，國府主席托美國大使赫爾利親自把毛澤東請到重慶，經過了一個多月的毫無實效的談判，毛澤東突然發現政府軍已在美國的協助之下，完全佔據了平、津、濟南、青島、……等華北重要據點了。因而當毛澤東一回延安，便立即發動了四面八方的攻擊，但形勢已變，無法挽回了。後來因爲國民黨政府在東北尙無一兵一卒，而解決華北問題的先決戰略條件還是收回東北，所以一方面要求蘇聯延緩撤兵，另一方面又和中共重開談判，這一次牽涉的問題仍然是政治和軍事兩方面，而且這一次談判更見得堂皇而鄭重了，不僅幾個中間黨派參加，還參加了一個威望甚大的馬特使。經過了一個月光景，簽訂了幾個協定，大家彷彿鬆了一口氣，但想不到在協商期間，國民黨政府又在美國的協助之下已把牠大部分精銳部隊運到東北去了，所以協商結束，馬特使回國之後，政府就立即請求蘇聯撤兵，蘇聯過去之同意延緩撤兵的請求，也不外想給牠所同情的共軍一個從容佈置的機會。但現在形勢已非，國民黨軍隊似乎已有了相當充分的準備，這一點使蘇聯當局躊躇起來，結果，中國的反蘇示威與貝爾納斯一道强硬的聲明迫使蘇軍匆促撤去，於是東北的內戰正式爆發了。久已準備好的共軍攻佔了長春，一躍而握了東北軍事形勢的優越地位。但經過一個月的苦戰，終於崩敗下來，全部局勢改觀，這無疑給了中共一個巨大的打擊。現在國民黨軍隊已於擊潰了共軍主力之後，逼近哈爾濱。延安覺得又一次在戰略上遭受了難堪的失敗，爲了挽回軍威，威脅國民黨政府的後方，顯然想在華北，主要是在山東又發動四面八方的攻擊。但國府主席恰在共軍發動之前一日，立即頒發停戰令，迫使共軍的攻擊在輿論的面前顯得彷彿是故意破壞、故意搗亂似的！這就是今天新談判的背景。國民黨政府分明已在計劃對中共來一個決定性的政治與軍事攻勢了。

中共雖然過去已一步一步的退讓了許多重大的戰路據點，但形勢已終於迫使牠要最後決定了：接受國民黨政府的『統一』要求，還是內戰？根據中共的聲明，似乎牠不願意在國民黨政府的條件之下『統一』，因爲這等於澈底的就範，那末，是不是牠決心走向戰爭呢？這又很難說，因爲牠的領袖過去在那樣有利的時機也沒有跟政府決裂，牠這一次當然更不願意這樣幹了。但不幸今天國民黨政府的態度却出乎意外的強硬，牠彷彿不顧中共願意與否，也要迫使牠在妥協與決裂之間有所決定。照這樣發展下去，一個規模更大的內戰似乎已迫在眼前了，不管人們主觀願望贊成與否。況且，美國恰在這個時候通過了協助中國整軍的計

劃，無異使內戰的陰霾更顯得濃重。

內戰將產生什麼悲慘的後果，這是每一個人都了解的。因為如此，所以雙方雖然久已在進行內戰，也不得不靠『反內戰』或『反內亂』來掩飾，那末，不管雙方的藉口如何，動機如何，這個內戰對中國民眾而言，是毫無出路的。假如參加協商的政黨，不管國共雙方也好，『第三者』也好，真的為人民設想，在內戰的嚴重威脅之下他們應該首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把人民當做真正最後仲裁者，而不應該反客為主，把一位美國客卿——馬歇爾將軍當做最高仲裁人，甚至把最後決定權交給他。事實上，馬特使的『調停』究竟有否結果，是否能夠『公正』，談判者全體都應該明白了，今天中共之拒絕馬特使的最後決定權已等於公開承認牠一貫所誦揚的『公正的媒人』在最後關頭站到國民黨方面去了。假如國民黨政府真是誠意為民眾謀利益，真正想建設一個統一獨立的中國，牠不應該再讓民眾受戰爭的蹂躪，而應該設法從政治與社會改革着想，因為這是統一中國的先決條件。至於共產黨方面，如果牠真正是一個名符其實的革命黨，牠也應該不要僅僅注意於軍事力量的保持、地盤的劃分以及政府官位之分配，而應該直接提出真正民主改革的要求，因為在今天真正能解中國民眾的倒懸的，不是一些無效的上層協商和一個官定的國民大會，而是一個真正代表民意的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不是局部的改良，而是澈底的土地改革；不是一面稱贊馬歇爾的公正，一面又怪責美國幫助政府；而是真正廢除一切新的不平等條約（包括反對國外駐兵、收回香港、九龍、澳門及反對雅爾達協定對中國被壓迫民族之不公正的待遇）。

誰能够尊重人民，勇敢的提出和實現真正的民主改革，誰就是勝利者，可惜準備內戰的雙方似乎都有意忽略這個真理！（海明）

法 意 選 舉 之 意 義

自歐洲戰事結束之後，歐洲各國人民於興奮之餘，為了尋求戰後的出路，大率趨向左傾，所以法、意兩國的新政府均握在共產黨與社會黨手中，右翼各黨均屈居下位。但為時不及一年，情勢已逐漸轉變，歐洲人民，特別是西歐人民似乎對共產領導之左派政府不感興趣，他們的希望的目光已從莫斯科移向大西洋之彼岸，六月初，法、意兩國的選舉明顯的指出此種趨勢：法國之天主教進步黨在新國民制憲會議中獲得一百五十九席，共產黨一百四十七席，社會黨一百十六席，其餘六十餘席歸其他較小黨派。意大利選舉之結果，也以天主教民主黨佔先，獲七、八六六、八六四票，社會黨得四、六〇六、五〇九票，共產黨四、〇〇四、七四一票。

這種結果顯然已引起英美資產階級輿論的普遍慶祝，『紐約時報』六月四日的社評稱『這是歐洲民主對共產主義極權浪潮的肯定的勝利』，『法國已重新恢復了她傳統性的自由』。總而言之，過去一年來惴惴於歐洲革命大災來臨的心理彷彿已告弛鬆

了。但這種『民主主義』之勝利究竟從何而來呢？牠能够真如人們所想像的那樣『樂觀』嗎？

法、意人民在此次選舉中所表現的傾向當然不是偶然的。他們受了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的長期蹂躪，已不相信舊制度能給他們帶來什麼奇蹟，所以他們強烈地傾向於社會主義革命及象徵這種革命之莫斯科與共產黨。不幸一年來法意兩國左派政府之施政綱領仍在於恢復舊秩序，其在法國準備施行之最時髦政策亦不過欲略略抑制大資產階級的利潤，把幾塊麪包丟給一羣餓餓的工人而已。此種政策既不能滿足人民之渴望，也不能避免大資產階級之強力抵抗。莫斯科之小麥借款亦僅是一種應急的救濟，絕不能解救法國的經濟危機，當然也就不能穩定法國左派政府的基礎。雖然爲了挽回這一危急局面，法國左派政府在莫斯科的聲援之下，會堅決要求割讓德國之萊茵區與魯爾區，希望靠這一個西歐的富庶工業區來推動法國的復興，但此種要求不僅遭逢德國人民（德國的共產黨也不能例外）之強烈反對，而且還不是英美所能接受的。在此種內外政策均陷入死巷的情形之下，法國人民自然要另謀出路：或者走向更激進的社會改革，或者得到更強有力的救濟，趨向保守，二者必居其一。

意大利情形更是嚴重。南方之農民從來就呻吟於地主的封建式剝削之下，最近幾年又遭逢戰爭的破壞，他們之希望改革非常殷切。北方之工業地區及全國鐵路線尚在戰勝國之掌握中，且泰半陷於停頓或遭受毀損。大量失業工人均急謀就業的機會。佔了人口中一個頗大數目的小資產階級也顯然得不到生活的保障，他們對於改變現狀都有一種性急的期待。但左派政府面臨此種千瘡百孔的局勢，束手無策。而內憂方興，外患又來，莫斯科竟向破產之意大利提出三億元賠款的要求，並想割去她的特列波列坦尼亞和特里雅斯特港，這當然大大增加意大利人民之不安情緒。不僅此也，在意大利政府中佔重要地位之共產黨竟在特里雅斯特問題上表示袒護南斯拉夫和莫斯科。這在意大利便造成空前未有的大危險：廣大的農民因爲對左派政府的無能發生失望和反感，竟擁護了保皇黨，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對政府也開始表示冷淡，正在尋求一個強有力者替他們打一個出路，工人階級也陷於苦悶狀態，他們彷彿又面臨第一個更殘酷的決鬥了。這就難怪莫洛托夫在外長會議上憂急地指出，意大利又回到二十幾年前，法西斯上台之前夜的形勢了。

爲了挽救這種危局，或更正確的說，爲了挽救這種左派政府也無法控制的局面，爲了和緩法、意兩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危機，美國立即借了十三億美元給法國，同時英國也以飛機與配備協助法國建立強大的空軍，包括雷達與炸彈。這種援助的實際意義，紐約時報的記者給了一個明確的說明：『英美得着教皇的協助，已很明白的要直接干涉去抵抗法、意兩國的共產主義。美國對法國貸款，好像是在協助選舉中的反共集團，就像以前蘇聯借小麥給法國是在幫助共產黨。』（大公報紐約特派員六月四日電），結果，當然是美元戰勝了莫斯科的小麥。

貝爾納斯，這位歐洲的『救主』，立即轉過來替意大利作戰，他首先在外長會議上迫使蘇聯抑低了一半的賠款要求（貝文還要根本取消牠哩！）索回特列波利坦尼亞，堅決拒絕她對特里雅斯特港的企圖，最後還要她簽訂了一個較寬大的和約。站在這個新佔取的陣地上，貝爾納斯還在最近這次外長會議上，繼續進攻下去。第二步，當然還要給予意大利以經濟復興的機會。總之，

正如紐約前鋒論壇報所說的，『英美現時是意大利的唯一保護者。他們一方面防衛它，抵抗蘇聯的目的與要求，另一方面防上她的經濟崩潰』（大公報紐約特派員六月六日發專電）。

當然，英美的救濟取得第一步的勝利之後，能否使法、意兩國經濟得到較大的復興，能否使這兩國人民得到滿足？還是個問題。法、意人民在這次選舉中所流露出來的保守傾向只是建築在一個新的幻想上，他們這種傾向還正在開始，而且還是帶着觀望和試探性質的，『美國能給我們帶來奇蹟嗎？』他們心中正在猶豫着。特別是意大利，國內問題複雜而又無比嚴重，再加上一個難堪的戰敗國地位，就是她的保護者也將感到束手無策的。因為意大利今天所要求的並不是那種應急式的救濟，而是一個根本的改革，除此以外就別無更好的出路了。第一次大戰後的意大利被迫而在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來一個抉擇，並終於採取了後者。這一次我們更沒有任何能力替意大利尋出第三條道路。然而法國現時所處地位之嚴重性，同意大利比起來也不過是程度之分而已。（海明）

本誌停止贈閱啟事

本誌出版以來，迭承各學校、各圖書館、各社團、各機關，紛紛來函要求贈閱，除已克盡棉薄，分別寄贈外，奈以本誌最近成本特高，長期贈閱，實為力所不逮。爰自第一卷第四期起，將『贈閱本』一律停止續寄。為此竭誠奉告各社團機關暨各地圖書館（即原有贈閱關係），今後祈照『本誌優待閱戶辦法』，惠予訂閱。事非得已，諸希公鑒！

求真雜誌社啓

附奉本誌優待閱戶辦法計

紙

廿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論 官 僚 制 度

陳人白

關於抨擊當前官僚政治的輿論，在一般報章雜誌中，最所常見。然從歷史觀點、中外事例，對官僚制度的發生根源及其興替條件，作有系統之扼要分析，並指出真正消滅官僚政治的可靠方法，如此論著，究不多見。編者認為此屬歷史與現實的重大政治問題，因特約陳人白先生撰著本文，及時發表，尚望讀者予以注意。（編者）

在近來要求民主和反對專政的運動中，人們又開始特別注意到我們的『官僚制度』這一問題上來了。例如最近馬寅初教授就特別提出了『官僚資本』作為攻擊的目標，且獲得了社會某些方面相當廣泛的響應。至於反對貪官污吏，反對官僚把持操縱的呼聲，則早已普遍到了全國。但我們的官吏何以特別貪污，我們的官僚何以特別敢於把持操縱，甚至壟斷了國家一切重要的經濟機關呢？這却很少看到對此有過較為明確的解釋。換句話說，人們雖然痛恨貪官污吏，痛恨官僚們的把持操縱，但對於我們中國這種官僚制度或官僚主義（Bureaucracy）的社會根源及其與政治經濟各方面的關係，却很少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研究，因而對於怎樣消除官僚制度或官僚主義，也就得不出一個明確的結論來。正因此，人們攻擊官僚或官吏時便常限於枝枝節節，而所提出的救濟方案，當然也就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罷了。

我們為了正確地推進民主改革的運動向前發展，有效地反對軍事專政及其官僚們的貪污壟斷，現在把官僚制度來重新作一番科學的探討，或者不算多餘的吧！

從歐洲歷史上的官僚制度說起

凡是一種制度，如果形成了一種力量，不管好壞，便都有其客觀的歷史原因。官僚制度當然也不能例外。官僚制度就其表現說來，乃是政治上的一種病態，有時候簡直是社會政治上的一個贅疣，一個瘤。但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下，這種官僚制度是無法避免的。同樣的理由，在另一歷史條件和另一政治制度底下，官僚制度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淘汰了。

如果以歐洲歷史來說，官僚制度或官僚主義是和君主的專制主義或專制政治同時發生的。更確切點說，官僚制度乃是君主專制政治的派生物或附產品。在古代希臘的奴隸社會裏，我們不會看到官僚制度的出現。但在古代羅

馬的『共和國』（奴隸主和自由民的共和國）滅亡及凱撒的君主專制政治成立之後，官僚制度便踏上歷史舞台了。

在羅馬凱撒的絕對專制的統治底下，從中央到各省各州各縣，乃至各殖民地，都有各種各式的官吏。那些官吏們，從上至下地一級一級地服從上面，一直到凱撒為止。這整個的官僚機構，有如一個金字塔，底層是奴隸、佃奴及一般平民（如手工業者及小商人等），塔身是各級官僚，而站在塔頂上的便是凱撒。不但凱撒對於全部官吏具有絕對的權力，就是一個上級官對於下級官也往往有着絕對的指揮權。至於每一個地方官之對於奴隸、佃奴及一般平民們，那更是一個凱撒的縮影了。

構成這個官僚機構的階級成分，乃是奴隸主及一部分商人和高利貸者。奴隸主的貴族們大概是擔任行政上和軍事上的職務，而商人及高利貸者們則多半擔任財務官及收稅吏。

這種官僚制度，在凱撒的絕對專制所統治的龐大帝國內是必須的。因為沒有這種制度，沒有各級的官吏為其工具，凱撒是絕對無法統治那樣龐大的帝國領土的。但這種官僚制度一經形成之後，它也就依照自己的特有邏輯發展。而這種『特有邏輯』的主要趨勢是：官僚制度原來雖是為了專制君主便於統治下層人民而建立，但它發展至某種程度時，却往往自趨於『貪婪橫暴』與『腐敗無能』，使得君主專制政治日趨撕裂，並引起下層羣衆的憤恨和反抗。結果常常是專制君主的統治，不是在下層羣衆的反抗之下趨於解體，就是在外來勢力的侵襲之下被毀滅。而凱撒的羅馬帝國則是在內外這兩種勢力的夾攻下垮台的。凱撒的羅馬帝國瓦解了（自然，瓦解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當時羅馬的奴隸經濟已走到了絕路），於是它的派生物——官僚制度也就跟着

烟消雲散，代之而起的是中世紀的封建制度。

在封建制度下，官僚制度是無法形成的。因為這種制度的特性是各個地方的諸侯或地主貴族們各自分立和分治，中間不容許有各種各式的官吏的存在。但當中世紀的末期，商業資本獲得較高的發展而要求對內統一國內市場，對外擴大商業殖民地時，一種統一集中的君主專制政治又應運而生了。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的英吉利，以及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的法蘭西，便是這一時代最為典型的君主專制政治的國家。

在這種君主專制政治的制度下，久已消逝的羅馬帝國的官僚制度又跟着重現於政治舞台了。固然，這種官僚制度比之凱撒治下的官僚制度有不少特異之點。其中最主要的是經濟基礎大大不同。前者的基礎是奴隸經濟，而後者的基礎則已是前資本主義期的商業經濟了。因而牠的階級之構成也就大有區別。這種新興的官僚制度的構成分子，已非奴隸領主和羅馬式的商人高利貸者，而是一種從封建制度脫化出來的地主貴族和開始從事原始資本積蓄的商業資產者了。但新興的官僚制度的經濟基礎及其階級成分雖然如此不同，然而這一制度本身的結構（金字塔式的結構），及其對於幫助君主專制統治的作用，和對於壓制下層羣衆的方式，在基本點上還是與古羅馬的官僚制度一脈相承的。也正因為如此，這一官僚制度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時，也就『自趨於貪婪橫暴與腐敗無能』，變成了社會發展的贅疣，引起了下層羣衆的憤恨和反抗，最後也就跟着君主專制政治的塌台而被結束了。英國十七世紀的兩次革命，以及法國十八世紀的大革命，就是結束此種官僚制度的範例。

代替君主專制政治而起的是現代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制。當這一民主制度還在往前開展，換句話說，當資產階級還依着它的朝氣向歷史的山峯上爬，還有勇氣運用自己的民主制度時，它確會擯棄了官僚制度或官僚主義。十九世紀中葉左右的英國和美國便是這樣。但當這個階級開始趨於衰老，而又感到下層羣衆（特別是工人）的某種威脅時，它又逐漸地從歷史的陳列所裏把古舊的官僚制度搬出來作為自己統治的輔助工具了。例如英國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後，資產階級便在它的行政機構中以『保障事務官地位』的名義，將它自己的官僚制度逐漸地建立了起來。固然，資產階級這種官僚制度，在它的民主制度尚未完全放棄時，與君主專制政治下的官僚制度是大有區別的。主要的區別就是：決定並擔任國家重要政治的『政務官』（如內閣閣員及各

省市的省長和市長等），都是根據選舉的方法產生並定期更換的。在這種情形下的官僚制度，當然不會獲得充分的發展。但當資產階級完全放棄了民主制度而轉回極權政制時，官僚制度便又以更兇橫的面貌表現出來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專政，同時也就是資產階級的官僚制度之登峯造極的表演。此種法西斯專政下的官僚制度，比起古代君主專政下的官僚制度來，固然含有許多特異之點，但就它的兇殘橫暴方面說，不僅和以往的官僚制度相同，而且是所有一切官僚制度中之最兇橫的。

從前面簡略的歷史敘述看來，官僚制度明顯地是寡頭君主或『領袖』軍政的必然產物。它的政治作用，則是君主或『領袖』代表少數上層階級（如奴隸主，商人高利貸者，地主貴族或金融資本家等）的特殊利益用以壓榨人民大眾的一種機構或工具。這制度，由於它本身所導演的政治作用的特性，往往與貪婪橫暴和腐化無能乃至愚蠢無知常是聯繫在一起的。要根本消除這種制度，首先就必須消除任何形式的『寡頭專政』，其次則必須以人民大眾的真正民主制度去代替它。否則，即令一種官僚制度打倒了，另一種官僚制度又要跟着產生出來。這在我們中國歷史上，尤其表現得明顯。

中國官僚制度的起源及其演變

歐洲的官僚制度既發發生於凱撒的羅馬帝國，則我國的官僚制度便顯然是起源於秦始皇所建立的統一集權的帝國中。也許有人會說，西周也是一個集權的帝國中。但實際上，西周時代的『中央集權』（指初期），僅是一種軍事部落國的中央集權，有如歐洲古羅馬滅亡後查理曼大帝時代的『中央集權』一樣，不過是每封建制度奠定基礎的一種工具而已。只有到了秦始皇消滅六國，除封建制度，建立統一集權的君主專制帝國時，官僚制度在客觀上才有產生之必要與可能。

因為秦始皇既消滅了封建諸侯的割據和分治，剷除了封建貴族在政治上的世襲特權，把全國領土劃分為許多郡縣而統一於中央君主專制政府，一樣，從中央到各郡縣，各地方，便需要有大批的官吏，以便從上至下地來統治人民了。而這大批官吏也就從上至下地形成了整個的系統，變成了專制主壓制人民大眾的機構，由此官僚制度才第一次出現於中國的歷史舞台。但秦代所建立的官僚制度，同它的君主專制政治本身一樣，還不會達到充分發展其機能的時候，便被一個兇猛的農民暴動所摧毀了。

從農民暴動高潮中湧現出來的西漢帝國，起初會企圖在君主專政的集權制和地方封建的分治制之間從事調和（如劉邦一方襲秦制建立中央的集權政府，一方又分封親族子弟及功臣於各地方），但結果釀成了『七國之亂』，封建的分治只得完全讓位於君主專制的集權政治，因而官僚制度也便得以逐步地發展下來。

從秦以後直至清代二千餘年的歷史，中間雖變換了許多『朝代』，但自政治的本質上來說來，從沒有脫離過君主專制政治的軌道，因而我們的官僚制度也就有如影不離形地隨着君主專制政治的發展而積重起來，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機械，好像一副愈來愈重的枷鎖永久地套在人民大眾肩上。雖然中間會發生過幾次偉大的農民暴動，幾度摧毀過這副枷鎖，但暴動的農民永遠提不出一個新的政制來代替它，所以結果總是在舊的官僚制度跟着舊的朝代被破壞之後，新的官僚制度又跟着新的朝代被恢復起來。而且這種官僚制度，每經過一次破壞和恢復之後，它的本身也就更增加了一次『經驗』，更加『嚴密化』，更加『發展』和『提高』了。到了滿清時代，這種君主專制政治下的官僚制度可謂已達到了它的頂點。所以當滿清末年西方人與這種官僚制下的 Mandarin 接觸時，莫不表示驚異，『嘆為觀止』！由此，Mandarin 竟成了一個代表中國官僚或官人的極帶諷刺意義的代名詞。

就這種官僚制度的階級成分說，差不多都是地主和商人及高利貸者。雖然，下層平民中常有不少的分子（所謂『士』）不斷地爬進這一官僚機械中，充實了這一機械。但這一機械的階級性並不因為平民分子的加入而有所改變，至多不過是替這種機械灌輸了一些『新的血液』，得以更有力地『更靈活地』壓抑人民大眾而已。並且『平民分子』一經加入官僚隊伍中，立刻也就官僚化，以『陞官發財』為目的，而逐漸地變成土地所有主或兼營商業和高利貸者。中國歷代專制君主之從下層平民中吸收一些官吏，可以說是一種頗為巧妙的策略（在古代羅馬的凱撒統治下，甚至從奴隸層中引拔了一些奴隸參加它的政治），這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容許某些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之參加政治，含有頗相類似的政治作用呢。

至於中國官僚制度的一般性質，當然與歐洲的官僚制度大體相同。但由於中國君主專制政治之亞洲式的（即特別野蠻和橫暴的）特點，便賦予了我們的官僚制度以一種亞洲式的特性；同時又因為這種制度在兩千餘年來連續不斷地存在和發展（像歐洲古代羅馬的官僚制度便中斷了千餘年，到十六、

七世紀才又復現出來），也就更具有一種特殊的『傳統』和豐富的『經驗』了。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官僚制度比起歐洲的來要『進步』得多。這就是說，中國的官僚們，比起歐洲的來要更為『貪婪橫暴』，更為『腐敗無能』和『愚蠢無知』得多。

如果我們要把中國以往的官僚制度的一般特性和全部面貌描繪出來，簡直須要寫一部大書。因此在這兒，我們只能將它的幾個要點略加敘述罷了：

(一) 凡是官僚，差不多都是為了『陞官發財』，而所謂『陞官』，最後說來還是爲了『發財』。因爲官陞得愈高，發財的機會就愈多，財也就發得愈大。作官既然是爲了發財，於是自然而然地要盡量貪婪，盡量納賄，盡量進行搜刮了。所以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都充滿了貪官污吏，雖間有所謂清官者出，則往往被人們當作神話來傳奇。把『清官』當作『傳奇』，這就足夠證明中國官僚之貪污是達到如何普遍化的程度了！

(二) 作官的既然是渴望陞，或者希圖保持其固有職位，於是下級對於上司，便不得不表示『維恭維謹』。而且爲了博取上司的青睞或眷寵，更只有趨承奉侍，進貽輸財，卑躬屈節，甚至奴顏婢膝，吮癰舐毒，亦無所不爲。反之，上級對於下級，則往往虛驕橫暴（所謂『擺官架，打官腔』），藉端索賄，乃至任意排斥異己，任用私人。這樣，『奴性與驕橫』便成了官僚層的特殊習性。『天王聖明，臣罪當誅』乃是官僚『奴性』之最高表現。而『只許官家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以及『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爲之』，則是官僚『驕橫』之確切寫真。至於同級的官僚之間，不是互相勾結，朋比爲奸，所謂『官官相爲』，就是互相嫉妒，互相排斥，甚或互相傾陷。

(三) 凡是貪污，必然帶來『腐敗』，而『無能』又往往是腐敗的必然後果。至於詔上的奴性與驕下的橫暴，更是促成腐化與無能之另一重要原因。因此，官僚們在其職務上只會『等因奉此』，遇事敷衍。即有所謂『能吏』，由於上級多方牽制，下級陽奉陰違，也很難有所建樹。所以畏首畏尾，因循苟且，『泄泄沓沓』，便成了官僚們的一般作風。

固然，當着所謂有能爲的或『賢明』的君主在位時，也往往注意到了他們的臣下官僚們的種種積習，以所謂明賞罰，獎賢能，懲貪污等手段來救治它們，甚至設置御史官來檢舉它們。但官僚制度有它自己的邏輯，一經形成之後，就是所謂『賢明』的君主也無法改變它的特性（即貪婪橫暴與腐敗無能），至多只能對它加以某種限制而已。因爲任何所謂賢明的君主，都絕

不能離開他的官僚機構來直接統治人民，這正如獵者不能離開獵狗來打獵一樣。所以結果，他總得遷就這一機械及其生成的特性。何況所謂聰明的君王，在君主專政的制度之下是絕無僅有的呢。所以，官僚制度下官僚們的貪婪橫暴與腐敗無能，乃是君主專政的政制下之一種無法避免的產物。這已成了歷史的定律。要想避免這一「規律」，制止官吏的種種惡習，則只有採用另一制度，即採用徹底的民主制度來代替官僚制度，才有可能。然而這首先就要推毀君主的專制政治。我們的辛亥革命，在客觀上是含有這一歷史傾向的。

現時官僚制度的新發展

但異常不幸，我們的辛亥革命只是推倒了滿清的君主，而這一君主治下的官僚制度不但原封不變地承襲了下來，而且在它上面更加上了一些新的因素，把它推到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了。這主要的原因是：代替滿清君主專制政治的，雖然名義上是民主共和國，而實際上，起初則是袁世凱的軍事專政，繼袁氏而來的是各系軍閥的軍事專政，最後則成了一黨的軍事專政。無須說，在這些專政底下，是絕對少不了官僚制度這一傳統的工具的。固然，現時的官僚制度，在其階級的成分上已有了大大的轉換。就是說，這一官僚制度的階級基礎已經不單是那些古老的地主和商人高利貸者，而主要是站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上的買辦、銀行家乃至工業巨頭了。然而這種階級基礎的轉換，並不會使我們的官僚制度改變其原來的傳統特性，相反地，却使它的傳統特性發展到了空前未有的奇觀！現在先讓我們把現時官僚制度的幾個要點來簡略分析一下吧：

官僚的買辦化。因為我們的國際地位是半殖民地性的，且這種地位已存在了將近一世紀之久，因而我們的買辦便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階層。這個階層從政治上反映出來，首先就是官僚的買辦化。從著名的李鴻章，梁士詒，……直到現在的某些大員，都要依靠這派或那派帝國主義，以鞏固並提高其在國內政治上的地位，藉以謀取經濟上及政治上的某些特殊權益，——如政治借款的佣金，藉外債以把持國家的財政機關，交通機關，乃至某些工業部門等等。這種買辦化的官僚們，他們的利益不用說是與國家民族的利益背道而馳的。他們不但是一切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者，而且經常是此等條約的促成者。正因此，他們不但從不敢提起取消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反而是不斷地將新

例如：我們的關稅雖然已被宣佈自主了，但我們的官僚們却不敢自行訂定保護民族工業及一般國民經濟的關稅稅則。因此在關稅上仍然是任聽外人的操縱，致使外貨有如潮水一般地湧進來，迫着原來早已陷入困境的一點工業基礎迅速地在破產了。更可笑的是：甚至連海關總稅務司及江海關稅務司也要被宣佈取消了的。可是最近又自請外輪來恢復內河航行權了！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由此足證我們的官僚們的買辦性或帝國主義的代辦性，是根深蒂固的。現時我們的官僚們之對於某一帝國主義，簡直有如以前的官僚們之對待專制君主或「太上皇」一樣，大有「唯命是從」之概！正因此，帝國主義也就成了我們的官僚們之最有力量的靠山。

官僚操縱金融和工商業。我們的官僚們，從清末以來即已把持了國家銀行及「官商合辦」的銀行和企業。到了一黨專政下，此種情勢更獲得了驚人的發展。不但國家銀行及一切「官商合辦」之銀行和企業，全為新舊官僚所把持，而且它們運用其特權和財力，將許多民營銀行和企業的「指導權」也逐步地奪取過去了。所謂「四大行」和「四小行」，簡直支配了全國整個的金融界。戰後，官僚們利用「處置敵產」的名義，把日帝在華的大部份產業組織起來（如中紡公司及中蠶公司等），完全放在它們的任意支配之下，儼然成了一種特殊的私產。此外，官僚們並組織了×××××××等大公司，企圖壟斷對外貿易。這樣一來，官僚們便形成了一個奇形怪狀的經濟集團，利用行政上的一切權利，利用國家的交通工具，並自訂稅率，自定貨價，把持操縱，壟斷居奇，為所欲為！這便是現時「人所側目」的，馬寅初教授所一再指責的「官僚資本」的輪廓和動態。此種官僚資本，不但在我們的歷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現代的國際間也是一個僅有的可怕怪物。它現時差不多已掌握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扼住了一切民營企業的咽喉，如果任聽其發展下去，它將蠶食整個國家的僅有財富，摧毀一切民營企業，吮盡一切民脂民膏，陷全部國民經濟生活於離奇古怪和萬劫不復的深淵！

官僚與軍閥的結合。在以前軍閥（如段祺瑞，曹琨及張作霖吳佩孚等）統治時代，官僚們往往是軍閥的輔助工具，隨意支配，任其所為。但在一黨專政下，情形是逐漸改變了。各地的下級官僚們雖然仍舊是充當軍閥壓榨民衆的輔助工具，而高級的官僚們却已越來越居於地方軍閥之上，成了軍閥們在政治上或財政上的靠山，或工商業經濟上的合作者。另一方面，官僚們亦

常常利用地方軍閥的武力，從事種種政治上及經濟上的非法活動。於是，官僚與軍閥便結合在一起，而構成爲『一人之下』與『萬人之上』的一副壓榨機了。

此外，我們的官僚們更在城鄉培植了一種『底層勢力』。那就是：它們在城市不借利用流氓，拉攏『老頭子』，以爲營私舞弊之工具；在鄉村勾結土豪劣紳，以爲敲詐和剝削鄉民之爪牙。近來並以保甲制爲其機柄，將上敘的兩種『底層勢力』有系統地團結起來，合法化起來，由此，我們的官僚們更加『深入民間』，得以『無孔不入』，『無爲不遂』了！至於黨的名義，更不用說，是我們官僚們的盾牌或保鏢哩。

我們現時的官僚制度，既具有如上所敍的許多要點，於是我們的官僚們的『貪婪橫暴』與『腐敗無能』，也就進到了『冠絕古今』，『蔚爲奇觀』！至於事實呢，且不要追溯已往，只須將戰後半年餘來各種報章雜誌對於官僚們所已暴露出來的奇形怪狀略加注意，就够你驚魂動魄了！

單以各地所謂『接敵偽產業』的官員們之所作所爲來看，其『貪婪橫暴』與『腐敗無能』，就已經使你摸盡字彙也無法形容。封洋房，搶汽車，劫物資，索金條，……花天酒地，狂嫖爛賭，……；至於工作呢，那就把工場關閉，讓機器腐蝕，讓剩下的物資霉爛，……真可謂『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

即以最近上海發生的『糧貨』舞弊一案來說，也就足夠象徵我們現時的官僚們之貪婪橫暴達到了何等駭人的程度！堂堂『糧食部』的官員，以『解劇抬糧價，藉以肥己！在『國際觀瞻所在』的『上海大都市』，『堂堂糧官』『尙擅敢舞此大弊』（十九日大公報語），則在其他的地方，我們的官僚們之『胆大包天』（見同上），營私舞弊，也難可推想而知了。因此，素以『溫和持重』著稱的『大公報』也不得不對此表示：

『說來傷心。近年官吏貪污已成了風尚，檢舉一案，又一案發生，官官相護，被包庇起來的大大小小貪污案子，更僕難數。政府也好像沒有整肅官箴的決心。遇有貪污案件被揭發，不得已斬幾個倒署的僚屬了事，高高在上的巨惡大慾，恒得逍遙在外。』（該報六月十九日社評）

『官吏貪污已成了風尚』，這就差不多等於說：『有官皆貪，無吏不污』了。大公報記者認爲這是由於『政府也好像沒有整肅官箴的決心』所致。但

『政府』何以『沒有整肅官箴的決心』呢？難道『政府』不是由『官吏』構成的嗎？所謂『高高在上的巨惡大慾』，不正是『政府』中的大員嗎？其實，這種貪污普遍化和極端化的情形，正是一種極權政制下的官僚制度發展之邏輯的後果。因爲我們現時的極權政制是亞洲式的，所以我們現時的官僚制度也就具有充分的亞洲式的特點。

總結起來說，我們現時的官僚制度已經達到了頂點，它差不多已吞沒了整個的國家，壟斷了一切，作盡了一切，它不但成了社會的贍疣，而且簡直是一個癌。假使這種官僚制度不加以澈底的消除，那我們這個民族便只有步古羅馬滅亡的後塵！

怎樣才能清除官僚制度

我們的官僚制度既已成了一個『瘤』，但究竟要怎樣才能清除它呢？要澈底解決這個問題，就得澈底解決這種制度所由產生的基本條件——專制政治。我們必得重複說一句，在任何寡頭的專政底下，官僚制度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極腐惡的專政下，也就常常產生極腐惡的官僚制度，這有如『影之隨形』，簡直成了一種歷史的定律。所以要澈底清除我們的官僚制度，首先必須澈底廢除當前的寡頭專政或黨專政，而以最澈底的民主政制來代替它。此外的一切辦法，都是行不通的。

假如寡頭專政被廢除了，澈底的民主政制實現了，則官僚制度也就自會烟消雲散。因爲在澈底的民主政制下，人民大衆不但具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思想信仰的完全自由，而且還有選舉和罷免一切官吏的自由權。官吏如由人民選舉，則人民自會選舉他們素常所信任的廉潔而有能爲的人員。萬一被選舉的官吏仍然營私舞弊，則人民可以自由去批評他，檢舉他，告發他，罷免他。在這樣的政制下，任何官吏不但不敢貪污，而且也不能貪污，不願貪污了。那時的官吏，將自動發揮其服務能力，廉潔精神，來取得社會的榮譽，以此逐步地走上官吏與人民間的界線之廢除。這就是說，人人都可以服務於公衆的一切職務，這樣也就無所謂官吏與人民之分了。

我們中國，自秦以後曾經歷了二千餘年的亞洲典型的君主專制政治，因而也就經歷了二千餘年亞洲典型的官僚制度的統治。這無疑地是我們一種最壞的最腐惡的傳統。辛亥革命後，這種最壞的最腐惡的傳統，不但被保留了下來，而且在新的條件下更加發展了。正因此，我們需要一種汹湧澎湃的民主潮流來清洗它。讓我們人民大衆從今起準備去迎接這一潮流，推動這一潮流吧！

戰後國際政局之演變

一、戰爭給我們帶來什麼

從去年八月大戰結束到今天已差不多整整過了十個月了，這將近十個月的時間並不算短促，已足夠供人類作深切反省的機會了。我們回想在戰爭之初，擺在我們面前的，都是那些人類命運之主宰者所擬製出來的最漂亮、最動人的諾言和戰後計劃書，從大西洋憲章，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到開羅宣言，人們總是三番四覆的向我們保證：戰後的世界將是上帝也難於模擬的天堂，有充足的麵包和自由，沒有恐怖也沒有貧窮的肩膀；總而言之，只要希特勒及其同盟被打倒，這次戰爭將是最後的戰爭。幾千萬青年都為這些動人的諾言被動員到戰場中去。他們現在大部分死的死了，殘廢的殘廢了，但至少還有一部份人活着，思索着。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與威爾遜的十四條宣言有什么差別呢？第一次大戰之初，人們不也同樣應允過我們：這次戰爭是最後一次戰爭嗎？在第一次大戰中，人們的藉口是反普魯士的軍國主義，這一次則是反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在這些藉口之下，最卑鄙醜陋的沙皇也會平空被渲染成爲『進步的』了，最不民主、而且也還是道地專制的國家也成了『民主國』了，滿身血污、而其犯罪歷史不下於威廉皇帝和希特勒的統治者也成了人類解放的救主了，只爲的是他們參加了所謂反普魯士或反法西斯陣營。現在展開在我們面前的並不是人們所應允過的那種幸福的世界，人類居住的這個星球被戰爭弄得更慘淡和漆黑了。那末，人類不是又愚蠢地自己欺騙了自己一次，又犯了一次更可怕的自殺行爲了嗎？僅僅相隔二十一年。但這個二十一年的間隔在我們今天看來也還是一個幸運的距離哩！因爲在這次戰爭之翌日，人們又立即把第三次戰爭的準備公開的、毫不顧忌的提到議事日程上了。人類假如不是真的瘋狂，目前確實應該沉痛地考慮一下了：這些人類命運的主宰者究竟將仔心把人類帶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們就甘心這樣又一次盲目地走到毀滅的深淵裏去嗎？

現在來爲昨天而悲傷，當然是無益的，我們還是好好的把事情理解一下吧。在這次戰爭中，死了幾千萬士兵和平民，剝奪了另外幾千萬人的工作能

力，浪費了人類一半以上的財富。假如真的是爲了人類的解放，這種犧牲倒沒有什麼，因爲在大多數人類的合理的改造和計劃之下，人類生產力將不僅迅速的恢復而且將迅速的遠遠超過昨天的標準。但不幸這次戰爭的領導者，法西斯的希特勒也好，民主的靈魂們也好，通通都志在保護這個破爛不堪的舊財產制度。唯一能够在這次戰爭中得到歷史正義的同情的，是蘇聯抵抗德國和中國抵抗日本的鬥爭。但克林靈宮主人早已聲明他無意於這個世界的改造，至於中國統治階級，由於其本性使然，牠當然不會給我們帶來什麼奇蹟。這就難怪今天美國的統治者驕傲地說：『人們預言資本主義經不起這次戰爭，但牠畢竟平安地渡過牠了。』這種驕傲的宣告當然不是人類的福音。人類幾千年的歷史已清楚的證明過：一種舊制度愈破爛不堪和過遲的改造，則任何補綴的工作只好是人類生命和財產的浪費，徒然延長和增加人類的痛苦吧了。

二、資本主義營壘之普遍衰敗

我們現在就進一步仔細的測驗一下這個舊世界到底衰敗到什麼程度，到底有否值得驕傲的地方吧。

從戰爭開始到現在還不到六個年頭，我們眼見舊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幾個營壘，在戰爭的打擊之下，一個一個倒下去，式微了，破爛到難於令人相信的程度了。首先是法國，這個第一次大戰後制霸歐洲大陸的強國，受了長期經濟恐慌的損害，在納粹對她發放第一砲之後，便發覺自己國內被階級衝突撕成幾片，火十字團的軍官與工人出身的士兵的火熱的摩擦，使她的軍事機械整個擁換，魏爾和貝當之流，在逃亡的議會，裏根斯得里地拿虛幻的巴黎共產黨暴動來作超速投降的口實。第三共和國的輝煌的大廈竟不到一個日功夫，便像紙屋一樣倒塌下來了。希特勒在賓丘，向法蘭西帝國的光榮唱了一支莊嚴而帶譏刺的輓歌。這個帝國衰敗和腐朽到這個程度，她在整整幾年之內，竟無法對希特勒戰爭機構的沉重的壓迫，作出任何有效的反抗，希特勒的『勝利』僅僅是英美軍隊在巴黎奏凱的迴聲而已。這種虛幻的勝利只能

喚起法蘭西統治者一種痛苦的回憶，她已喪失了全部艦隊，喪失了一半以上的生產力，百萬以上的勞動人口，而且正在準備喪失全部重要的殖民地，總而言之，她已降為第四等的國家；此刻連最反動的政治家也不敢信賴特戈爾的復興的野心，所以也就於勝利之翌日被迫辭職了，他去了，也就表示法蘭西的人民已從虛幻的勝利中驚覺，他們原來正陷入通貨膨脹和饑餓的深淵中哩！

其次是意大利，這個歐洲的日本。莫索里尼高據在封建的農業與輕工業的基礎之上，藉助於法西斯主義的嚴峻的統治，把意大利人民整整抑制了二十一年。戰爭的第一日便無情的把他那彷彿永無了結底統治的真面目暴露出來：意大利的生機原來已被斬喪淨盡了，她的人民正在準備一個危險的反叛。莫索里尼發覺他的羅馬帝國的幻夢原來建築在一枝充滿失敗主義精神的軍隊上，這枝軍隊竟用自發的大規模投降來懲罰自己的統治者。意大利腐敗入骨的舊財產制度之所以終於保全下來，只因為她的革命運動的嫩芽一開始便被『戰勝國』的首腦們摧殘掉吧了。現在她正處於奄奄待斃的狀態中，騎在她身上的『勝利者』正忙於用一些顯然無效的手術來延長她的壽命，但無論如何，意大利失去了地中海的艦隊，失去了殖民地，她將澈底變成一個巴爾幹式的國家了。

現在我們談到德國，這個炫耀一時的第三帝國，在希特勒那種戲劇式的行動表彰之下，確也會經迷惑過不少的庸人，特別是那些受了過度驚嚇的知識份子，他們居然相信一個法西斯主義的光榮時代已經來臨，牠將代替資本主義等等。事實上，希特勒軍事機構的爆炸性僅僅是一個高度工業化國家失去世界市場與殖民地的反映而已，這等於一個炸彈失去安全針一樣，爆炸是必然的，在爆炸的時期內，牠的富於毀滅性和不可抗拒性也是必然的。但任何有頭腦的人也不會相信一個缺乏原料和燃料的機械化軍事機構能經得起一個長期的戰爭。希特勒之走向失敗之路早已命定了而且被預言了。他的軍隊遭逢史大林格勒第一個打擊便一直崩潰下來，這對於我們並不是一件值得驚奇的事情。現在人們總得承認，希特勒的納粹主義並沒有替歷史開創一個新時代，牠更不是準備代替資本主義的什麼新制度，牠仍然是這個腐朽的舊制度生長出來的一枝毒草。牠想靠一種科學的殺人法來維持這個制度，却被歷史那樣無情地判決了死刑，結果證明牠除了使這個制度更陷於不可藥救的衰敗之外，沒有做出任何奇蹟。現在勝利者已把牠的屍體瓜分了四塊，正在議

論如何剷除和分配牠的臟腑——工業配備。

歐洲大陸的舊世界是整個的衰竭了，英倫三島當然也不能例外。這個『無落日』的老殖民帝國受了產業革命之賜，享受了差不多兩個世紀的繁榮和特權。第一次大戰已暴露了她衰老到這個程度，這個世界的超等強國竟成了華爾街的一等債務人，以後她與這個新興的亞美利堅帝國在世界舞台上絕望地爭持了二十一年，結果這次的戰爭一次而又永久地迫使她屈服於華盛頓。但戰爭勝利也挽救不了她，保守黨正當慶祝『和平』的時候，向全國人民宣告了國家的破產：國外投資十一億磅已蕩盡，對外負債已達三十五億磅，即已超過了她一年的經營收入，她已變成全世界最大的債權國了；內債，即對人民的負債已達兩百億，出口貿易低減幾達百分之六十，國內生產力也萎縮了一半以上。邱吉爾把這張戰爭清單擲給阿德里，便匆忙的下了台。但這位『社會主義』的首相的唯一辦法也只是把這一張破產的公告轉呈給華爾街，要求一筆更嚇人的債務——三十七億五千萬美元——而已！這筆巨債不僅把英國的債台築得更高，而且還迫使她付出一個致命的代價：把帝國整個殖民地市場的大門打開，迎接美國商品的洪流。其實，用不着等到美國來敲開大英帝國的大門，英國殖民地本身的離心傾向已被這次戰爭促進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了。她們既然已得不到倫敦的定貨，她們既然被這次戰爭迫得相當發展了自己的工業，又她們既然已成了唐寧街統治者的債權人，她們自己更有理由要求割斷和宗主國這種無可忍受的痛苦關係。去年六月間，倫敦那位著名的資本主義經濟辯護人菲夏教授，曾在達姆飯店向一批苦悶的實業家作了一次無望的演講：他證明英國繼續靠榨取殖民地來解決當前的危機，已顯然遭逢幻滅的悲哀，因為這些殖民地或自治領都已羽毛豐滿，已和英國目前的利益不一致；她們覺得英國已成了她們的嚴重累贅，所以都已背向倫敦而傾心於美國的資本和商品。假如我們留心英國這些破落戶的言論，我們將發現不少這一類『耶利米的哀哉』。

除了歐洲這幾個舊資本主義堡壘之外，還有一個在戰前屹立於亞洲、不可一世的太陽帝國。這個小帝國是資本主義的過遲的產物，她是在半農制的基礎上建築起來的輕工業帝國，只因為沙俄和滿洲過於腐敗才給了她一個『永遠戰勝』的機會。但她得到歷史這種短促的幸運的機會，便忘記了自己的貧弱的基礎。居然在歐洲資本主義耗去一個多世紀的時間也無力將東方殖民地提高到工業化的平面上、甚至已無力繼續控制她們的時候，她，小小的日子

本帝國却企圖把整個東亞，把中國和印度，放在她的『共榮圈』內，這不是世界史上最荒唐，最無知的妄想嗎？現在她已為這個無稽的野心償付了大大的代價。失去了殖民和不斷向外擴張的機會，這個小帝國宛如一個失去了安全網的蒸汽鍋，她內部久已蘊蓄着的矛盾正在醞釀一個大爆炸。

當東半球整個舊世界陷於空前衰落和萎靡的時候，高踞於西半球皇座之上的人衆國彷彿成了一個例外，因為她雖然支付了等於第一次大戰十一倍的損失，但她的生產力畢竟增加了一倍以上，聽到天文學數字的利潤。而且她已成了世界唯一巨大無匹的債權國和出超國了。但美國六十家族得到這樣龐大的戰爭利益，得到這個空前未有的世界霸權，不僅以大半個地球的荒廢為代價，而且還以美國國內人民生活水準之普遍低落為代價。當杜魯門呼籲全國人民繼續拉緊褲帶以救濟世界的饑餉，又當他竟不惜動員海陸軍來鎮壓美國那種驚人的大罷工時，我們就明白：美國是不能獨立於這個舊財產制度普遍衰敗的影響之外的。她是這個制度的心臟，她必須把資本的血大量輸到這個垂死的癱瘓的有機體的各部分去。但這種救急工作只不過反過來把這個心臟弄得一天一天的衰弱下去而已。這個世界帝國無疑是稱霸於這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最後一個了，在第一次大戰之後，我們還能看見有她的生長，但在她之後，我們看不出有任何光輝的後繼者，有的只是一片廢墟。

三、在舊世界普遍衰落中之蘇聯

我們必須向人類指出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實：在第一次大戰後產生出來的這個社會主義工人國家，儘管從舊沙皇制度中繼承了一份蹩腳的遺產，儘管因為處境孤立與經濟基礎之貧弱而不得不依賴於一種放肆的全能主義的統治，但在過去舊世界陷於長期的經濟恐慌中，她却能按照一種集中的計劃，得到了繁榮；最後在整整五年的毀滅性戰爭中，她却居然能支持下來。我們不要忘記，資本主義已有了幾個世紀的歷史，這個新生而且還是先天不足的新制度遭遇着這次嚴重的戰爭試驗時，才不過二十一歲。她那樣幼弱，又受到那樣致命的摧殘，但至少她却向我們證明：她比許多舊資本主義國家更堅韌一些。這似乎是值得全人類深思熟慮的事實。假如黑格爾那句名言：『存在就是合理』是對的，則蘇聯的存在顯然已得到歷史的辯護了。當然，她生存下來所付出的代價是最足驚人的，世界變革的延遲使她遭受了這次流血的懲罰

多個，村莊達七萬個以上，家屋被毀六百萬所，鐵路被損壞了六萬五千公里，牛被殺死或帶走達一千七百萬頭，豬被殺死三千萬頭，人口喪失了一千七百萬，……總而言之，俄國最精華的歐洲部分差不多泰半被毀滅了。全國生產力空空萎縮了一半以上，人民陷於缺乏消費的嚴重狀態，而且對外還負了十五億美元的債。假如我們認為這個打擊對於蘇聯不會產生嚴重的後果，那當然是盲目的想法。克林靈宮主人那樣不顧一切的從東歐、巴爾幹、甚至中國的東北部將物資搶運回國，以及他向美國要求六十億借款的提議，都清楚的指出蘇聯經濟所遭逢的危機。縱使今後有十五年的和平來實現克林靈宮主人的三個五年計劃，蘇聯仍不能達到奧泰基的理想——事實上，今天來談奧泰基，無異希望叫昨天回來，她今後只有愈來愈依賴於國外資本主義的市場。何況十五年的和平在今天看來簡直是一個荒唐的幻夢！

四、美蘇衝突的意義

戰後世界所呈現於我們眼前的第一個尖銳的現象便是：美、英與蘇聯之間愈來愈緊張的衝突。這種衝突當然不是起因於克林靈宮對這個地球還有什麼變革的企圖。汎斯拉夫主義與彼得大帝—蘇伏勞夫崇拜之復活最多只能喚起一種沙皇主義復活的輕微的疑懼，絕不會使聰明的白宮主人與邱吉爾把這種古舊的幽靈錯認作革命的怪物的。事實上，現在克林靈宮比之任何時候都渴求『和平』，戰前二十幾年與資本主義世界『共存共榮』的黃金時代已永遠成了牠追求的美夢。今天克林靈宮在東歐、巴爾幹、近東、和遠東進行建立的所謂親蘇勢力圈，只是牠自己的物質力量過於衰竭，而對美國勢力的過度膨脹過於畏懼，希圖沿蘇聯的邊境建築一道萬里長城而已。但就是這種工作也含有對舊世界讓步的意義，因為克林靈宮在這一勢力圈內已小心的經過一些改良的手術，把舊財產關係保存下來，以免令白宮統治者發生過度的憂懼和反感。假如我們不是健忘的話，我們總記得克林靈宮在這次大戰之初也顯然在波羅的海推行過同樣的政策，所不幸的這種政策竟無法延緩希特勒對蘇聯的進攻，今天，這種政策顯然也無法緩和美、英反蘇的尖銳情緒了。

我們剛剛已指出過，美國之取得這個世界霸權完全是以舊世界的普遍衰敗為背景的。這個世界被戰爭毀損到這樣難於救治的地步，竟使八萬萬人，

即人類之三分一，陷於饑寒交迫，無家可歸的絕望中。財產損失的程度簡直令國善後救濟總署已成了一件失敗的作品，她的救濟物資放到這個飢餓和災荒的大海中，簡直是一粒粟。在國際的糧食會議中，美國的代表宛如碰到一羣餓殍包圍。每一次嚴重的國際會議，除美國之外，各國代表所帶來的幾乎全是破產的清單。這使美國統治者發生一種尖銳的感覺：她所獲得的世界市場是過於破爛和狹小了，而且還充滿了爆炸性。美國高踞在這個星球上面無異高踞在她那個神祕的原子彈上面。假如她不趕忙挽救這個危險的局面，她在戰爭中增加了一倍的生產力便要重新萎縮下去，國內的危機也將和這個世界其他部份的矛盾一同爆發起來。這是美國，同時也就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所遭逢的歷史上最嚴重的時機。現在美國已把幾十萬萬的借款輸送到東半球，主要是歐洲，但任何復興的工作也需要時間，何況美國担负這樣巨大的救濟工作能否在一兩年內奏效還是一個大疑問哩！八萬萬人的飢餓和美國巨大生產力之缺乏市場却是一個立即就要解決的問題。在今天，只要不是自欺欺人的騙子，人們總得承認大多數人類不甘於受騙和飢餓的情緒已尖銳到異乎尋常的境地了。世界到處是不安靖的烽火，被戰爭犧牲最大的地方，則火出的噴火口又臨近爆發的時刻。這些飢餓人民對舊制度的憎恨將難免與他們對蘇聯新制度的評價連結起來，儘管克林靈宮對這種事情已失去任何興趣，但這種事情的發生終歸是難免的。美國統治者對這一點異常敏感，他們也自然把牠看成爲事變發展的邏輯結果。另一方面，市場愈是狹隘，舊制度復興的機會愈渺茫，美國生產力對於世界市場的追求愈是急迫，則美國資本主愈難忘情於占地球六分之一的蘇聯市場，同時也愈難忍受克林靈宮的每一步建設親蘇長城的計劃。（克林靈宮竟想把牠的國防的前哨推展到脫列波利坦尼亞哩！）一句話，一個充滿衰敗和騷亂的舊制度是再也不能容忍一種不相容的愈來愈難容忍她國內這種同一的奢侈政制一樣。這就是我們今天了解戰後整個國際局勢的鎖匙。美國的軍人現在已清楚的宣告：爲了穩定這個舊制度，必須以第三次戰爭——反戰爭——爲補充。

五、國際政治的樞紐在歐洲

現在我們進一步診察一下，圍繞着這一緊張的基本矛盾的週圍，整個國際政局發展的趨勢。

國際政治的樞紐無疑仍在歐洲。本世紀初，歐洲的工業生產力已發達到這個程度，整個大陸結成了一個工業的整體，使那種國家界限的瑣碎的分割成了最不合理的，難於忍受的桎梏。殖民地工業之相對的發展，亞洲日本與美洲合衆國兩個新帝國之勃興，使歐洲內部陷於恒久空氣的狀態，第一次大戰已清晰的指出：歐洲已開始衰落了，產業黃金時代之花——民主主義與改良主義也跟着凋謝了。第一次大戰之後，每一次新的社會危機總迫使歐洲人民要在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加以選擇，而且愈來愈急迫。歐洲人民的抉擇不僅操縱了歐洲的命運，同時也操縱了整個人類的命運。一個鄙陋的村夫，也許對一九三三年德國的選舉，以及納粹主義之登台不感興趣，但整個歐洲、整個星球被拋入血海中就從那個時候開始決定了的。經過了這次可怕的戰爭之後，歐洲更荒廢了。長期的法西斯主義統治與戰爭的謀害已成了歐洲人民的一個噩夢。他們在飢餓和憤恨中，對這個舊制度已失去任何幻想。受了蘇聯紅軍那種令人眩目的勝利的鼓勵，他們於戰事將要結束之時便已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改革要求。事實上，除了在一個新的合理的制度之下把歐洲加以重新改造之外，他們已無法生存下去了。從這種心理狀態中，我們就不難了解，不僅會被西歐列強背信絕義地出賣過的東歐及巴爾幹小國家，甚至意大利、德國和法國的民衆最初也把他們的希望放在蘇聯方面的。我們只須留心一下意大利和法國第一次選舉的後果便可以明白。共產黨和社會黨操縱了大多數的選民，這除了表示法、意的人民希望社會主義的變革之外，我們找不出第二種解釋。德國雖然沒有選舉，但克林靈宮最初曾在德國提出成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這個提議直接地證明克林靈宮對德國人民的親蘇情緒已有了把握，否則英美不會拒絕的。今天英美之趨於拾起克林靈宮昨天的提議，而又遭逢了後者的決絕的反對，只不過證明一種逆轉的現象吧了。甚至英國工黨之上台也不能不被解釋英國工人要求一種社會主義改編的反映，工黨那種冒牌的「社會主義」政策就含有緩和這種要求的作用。

但歐洲人民懷着強烈的社會改革的希望却遭逢一種冷淡的待遇。他們想不到克林靈宮竟向那些受法西斯主義欺騙最深、失望最大、飢餓最厲害、改革的願望最強烈的人民索取那樣可憐的賠償。他們也想不到克林靈宮於這樣無望和腐敗的舊制度中仍然那樣熱心去尋求一種改良的可能。經過了短短的

試驗之後，這些飢餓的人民已逐漸迷惑起來：在獨占資本的王國中反對獨占，經過殘舊的國家機關去進行國有化，以及局部地實行一種過遲的土地分配，能够解救歐洲的困厄嗎？在這次戰爭之前夜，這個舊制度的物質基礎還沒有受到大規模的破壞，但同樣的政策和企圖（『人民陣線』）已證明沒有阻止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和戰爭，那末，今天，有什麼理由讓歐洲人民在更不可能的條件之下，去重走一遍引向悲劇的道路呢？

意大利和法國最近一次的選舉已開始證明：這些飢餓的人民已覺得大洋彼岸的救濟和借款較之克林靈宮的『新民主主義』福音帶來更切實的安慰。克林靈宮之拒絕自己昨天關於統一德國的提案也證明這同樣的情形已在德國發生了。

羅斯福和他的助手邱吉爾對歐洲革命大災的畏懼早在歐戰結束之前已表現出來。這位『最民主』的王國首腦，『民主反法西斯』戰爭的舵手，竟當意

大利民衆蜂湧起來推翻墨索里尼的時候，與薩伏伊皇朝及羅馬教皇勾結，向這個革命的背後插了致命的一刀。往後，顯然在這兩個『民主』領袖的慫恿之下，羅馬教皇突然成了歐洲，甚至全世界的教主，各國的天主教黨，在基督的名義之下，成了『共和』、『民主』、『進步』、『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的選手。我們宛如處身於一個新的黑暗時代。這個舊制度的無可挽回的破產竟迫使資產階級丟棄了自己的宗教，無望地求助於那個中世紀的發臭了的宗教死屍。但這種卑賤的宗教手段如果不輔以美國的金元將仍然證明不中用的。法國天主教進步黨的勝利緊接在十三億美元借款之後，這件事的意義再清楚也沒有了。

美國爲了制霸這個世界已首先把整個西半球團結在她的羈絆之中，現在爲了確保這個既得的霸權，她便不能不用雙倍的力量去整頓這個星球，使牠得到復蘇，整頓這個星球的首要條件便是有效地組織歐洲，而在歐洲具有穩定力而又急切需要救助的便是大英帝國。大英帝國的突然崩解將引起整個世界的大震動，這一點羅斯福及其後繼者都非常清楚。殖民地之兇猛的獨立運動與英國工黨之被迫而採取銀行和某些重工業的國有化政策，表示大災難已迫近了。沒有美國大借款的加油，英國工黨的統治將在下一階段遭逢絕大的歷史危機。美國固然已立心吞併大英帝國的市場並以她的遺產的當然繼承人自居，但她必須小心地咀嚼這種戰果，換言之，她必須延緩大英帝國解體的過程，否則她有全部失去這份遺產的危險。我們從英、美大借款談判的經過

中，知道美國最後只以英國打開其帝國市場爲滿足，她對約翰牛堅持暫時保留帝國優先權的可憐的要求，終於表示讓步，這就是說，美國今天還不敢遽行將引起的危機同樣是致命和可怕的。共產黨與社會黨之得到選舉的勝利、銀行與工業國有化的提案、北非與越南的叛亂、特爾戈之匆匆下台……這些都是令人不可忽視的病徵。這種形勢逼得法國資產階級用『中立』的友誼來取得蘇聯的小麥，回頭則把這種友誼向華盛頓拍賣，博取了十三億美元的借款，當然還有個附加條件：法國必須對美國商品打開她的大門，並順便放棄了她對德國的過份要求。

但擺在美國面前的最煩惱而又最嚴重的問題還是德國、意大利、東歐和巴爾幹的局勢。

特別是德國。假如我們說國際政治的樞紐在歐洲，則今後德國問題的處置就成爲歐洲政治的樞紐了。這個工業最進步的中歐國家，竟在波茨坦會議上遭到了死刑和肢解的判決。民主國的首腦們，甚至社會主義國家的元首竟因爲希特勒的犯罪而遷怒於全體德國人民和她的工業基礎，因此，使德國的人民今天受到比戰爭罪犯還更難堪的待遇，她的工業基礎竟判定要被瓜分於戰勝國之間，充作賠償，此外，她的國土還平空被分成四塊，蘇聯佔領了她的東部農業區，英、美、法則分別占領她的中部和西部的工業區。這是一種不分皂白的懲罰和報復，我們只能在人類歷史較原始的時代尋到類比。真正的戰爭根源不是在於近代工業的生產力和勞動人民，而是在於這個不合理的舊制度，希特勒就是這個舊制度的絕望的代理人。這個淺近的真理，至少克林靈宮的主人是應該曉得的。不幸得很，這些判決德國死刑的裁判官過去對希特勒生長這段黑暗的歷史，都有過一種洗不清的責任。這就令我們不難了解，何以德國人民得不到公平的待遇了。但對德國盲目的報復顯然已生出一個急迫的危機來了。一個完整的經濟機體被強力分解爲四塊互不合作的佔領區，不僅西部的工業，就是東部的農業也陷於停滯和完全衰敗了。許多工業人

帶來什麼好處的。這一點已在倫敦和華盛頓引起煩燥而來着懊悔的爭論。最近貝爾納斯與貝文的德國聯邦計劃以及西部佔領區當局之聲明拒絕將工業配備遷到莫斯科，已表明一個新的試驗正在開始實行。但德國聯邦計劃與工業基礎之相當保留却無疑含有德國舊財產制度復蘇和完全傾向美、英的意義。

這是克林靈宮所最不願意的！因為牠既然已無意於改變德國的社會制度而只希望用支解她、解除她的工業武裝的辦法來除掉這個西方的可怕的強國，牠當然用一切力量來反對她的復興。這種具有歷史意義的爭執將得到什麼結果呢？社會的法則強過於任何統治者的主觀的願望。具有高度文化的德國是不能繼續過着支離破碎的生活的，或者讓德國人民被迫而陷於恒久的飢餓和反叛，或者讓他們重新享受一種統一的經濟和國家生活，利害的計算已迫使英美不顧一切的選擇後者，法國也已顯然在借款的壓力之下暫時放棄了對萊茵區的要求。克林靈宮將選擇那一條路呢？牠在開始在埋怨美國企圖恢復舊秩序，但白宮主人不走這條路又有別的什麼路呢？難道他可能代替克林靈宮去改變德國的舊財產關係嗎？無論如何，克林靈宮是不能延遲牠的抉擇的。德國的命運，大概在不久的將來總可決定了。

意大利僅僅因為內部的危機已到了爆發點才連忙投降，她與德國遭遇的不同就在她僅僅受西方同盟國的單獨占領，現在也就靠這個外來佔領者替她抵禦內在和外來的打擊。意大利人民無疑已因為戰敗淪為餓殍。他們的澈底改革的企圖遭逢了英美的壓制之後已開始將希望的票投向共產黨和莫斯科。但恰好在這個時機，克林靈宮無情地向意大利提出了三億美元賠款及特列波利坦尼亞託治的要求，而且還支持南斯拉夫對特里雅斯特的侵奪企圖。這種不幸的政策除了助長意大利人民之絕望情緒與極端國家主義的傾向之外，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今天意大利法西斯份子之大胆活動，保皇黨之敢於領導南部農民一個反動的示威，以及共產黨選票之突然降落已清楚的指出：缺乏一個廣泛的社會改革（包括土地改革）的政綱，英美支持的聯合內閣已喪失了南部廣大農民的擁護，把他們推到保皇黨之類的反動勢力方面去，克林靈宮的要求與南斯拉夫的邊境示威只能增加這一危機。

這件事迫使美國堅決拒絕克林靈宮，壓迫牠放棄了一半的賠款數字，承認特列波利坦尼亞交回意大利管理，並簽訂了一個較為寬大的和約。美國這樣做，為的是一方面緩和意大利國內的情緒，另一方面順便打擊莫斯科，保持美國之為一個意大利保護人的地位，雖然克林靈宮顯然尚不願放棄對特列

雅斯特港口的要求。美國對意大利問題已取得了外交上的初步勝利，她下一步大概將拿美元借款來補充，否則她所支撐的那個軟弱的內閣，在緊張的國內衝突中，勢難苟延一刻。

跟着德國問題與意大利問題之後，美國將繼續作征服波蘭、奧、匈、捷、克與巴爾幹半島的企圖。這些國家，除了希臘及奧國一部分之外，完全受蘇聯的軍事控制。克林靈宮顯然已立心把這些小國造成為蘇聯邊境的永久安全地帶。但這個地帶却是歐洲最落後、最富於爆發性的地帶，而且牠分明是歐洲西部工業地帶的農業區和工業市場，克林靈宮之把牠從西歐割裂開來，正如地把德國的東部割裂開來一樣。這種人工的分裂使克林靈宮遭逢一個最大的困難。這些國家將從什麼地方獲得牠們的消費品呢？牠們的可憐的工業將從什麼地方得到資本的救助呢？蘇聯的領導者早已承認從來蘇聯就沒有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今天，遭逢了那樣厲害的戰爭打擊之後，她當然無法立即代替西歐和德國往日的地位。縱使新的五年計劃真的能使蘇聯辦到這一點，但在戰爭蹂躪之後，這些國家的窮苦人民能忍耐五年之久嗎？國有化與過遲的土地分配也不能對這個問題有決定性的幫助。克林靈宮主人企圖靠美國六十億借款來緩和這個問題已遭逢了美國的乾脆拒絕。就是白宮批准的十億元借款也還要以打開『東歐鐵幕』為條件哩。美國顯然已把蘇聯這個無法克服的弱點視為未來金元外交攻勢的良好基礎。今天匈牙利的駭人聽聞的通貨膨脹，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國內保守政黨的大膽的活動已證明：除非克林靈宮在下一階段把這一地帶蘇維埃化，否則牠將成了蘇聯的危險區，而不是安全區。

六、亞洲——第一個偉大的噴火口

現在我們將視線移到這個星球的另一個偉大的噴火口——亞洲。這個古代文化的搖籃，由於發展的停滯和過於遲緩，不得不成了其後來者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殖民地。但近代資本主義文明一度刺激起這個地方的初步工業發展之後，便不僅顯得無力完成牠的工業化，產至還成了牠的生產力發展的主要障礙了。數世紀以來，西方帝國主義者賜給這個老亞洲的輕微的工業能力，抵補不了由於他們的無情的掠劫、剝削和壓迫所造成的恒久的貧困、軟弱和飢餓。在過去一個世紀之四分之一時期內，尤其是受了第一次大戰及十月革命的刺激，東方殖民地的奴隸們已激起普遍而有組織的反叛。由於幼稚而

易於受欺，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懦弱，這個反叛運動受了不少的失敗和挫折。但長期的經濟恐慌，加上這次殘酷的新大戰，使東方的殖民地解放運動變得愈來愈兇猛和大胆。中國已舉行過八年的抗日戰爭。大戰甫告結束，東印度、越南、印度、馬來、緬甸和菲律賓便到處發生或醞釀着獨立的武裝叛亂，迫使垂死的英、法、荷帝國主義於『民主反法西斯』那個漂亮的大屠殺之後，立即輔之以鎮壓殖民地的血腥的殺戮。英國那個『進步的』，『社會主義的』工黨內閣與法國的『民主內閣』又一度暴露了他們的真面目。事實上，東方殖民地的奴隸們這一次比之過去任何时候都有理由輕視和唾棄他們的帝國主義統治者了，這些老腐敗在戰爭中表現得那樣無能和衰敗，不僅在危急關頭對殖民地沒有任何有效的軍事防衛，甚至還成了牠們債務人和賴債者的頭，貝文才下了一道緊急命令：『與其被趕走，不如及早退讓。』現在從東印度、越南到印度，即在那些最無法收拾的地帶，人們已在進行一種新的試驗：希望把政權交給他們所信賴的殖民地資產階級，藉以保全他們的財產和宗主權。但這種過遲而又毫無誠意的讓步也只能使土著資產階級發生興趣而已。不抵抗主義的甘地，『社會主義』的尼赫魯，披上共產主義外衣的胡志明，以及民族主義的夏利爾……這些人是毫不以談判和簽一張自治領式的『獨立』契約為羞的。但幾萬萬飢餓的奴隸却清楚的知道：永無了結的談判和一張『獨立』的契約書不會令他們得到麵包、土地和自由。他們對帝國主義老腐敗們之恨入骨髓以及對本國資產階級的逐漸失望使他們不肯輕易放下武器，而且還勢必迫使他們向國際方面尋求新的援助和希望。

在亞洲正如在歐洲，人民走向解脫之路難免要與蘇維埃的試驗和理想接觸，十月革命與蘇聯在列寧時代對殖民地，尤其是對土耳其、伊朗和中國發佈的那一道放棄沙俄特權的公告，已爭得了亞洲數萬萬奴隸的無限同情和信賴，事實上蘇聯東方邊境之真正得到保護也主要是靠這些被壓迫民族的同情和獲得解放。在這次戰爭中，蘇聯在歐洲之驚人勝利，無疑使亞洲人民對她生出不可遏止的希望，數十年來，他們就一貫把她當做真實的友人，這一次不幸克林靈宮正在東方邊境忙於建設同樣的萬里長城和實施雅爾達的秘密協定。沿伊朗北部跨過中央亞細亞，經過新疆、內蒙以至滿洲及朝鮮，牠

企圖劃一條任意的安全界線，把蘇聯東部國境圍繞起來，在這個真空的區域內只能容納親克林靈宮的勢力。世界的其他部分則交由帝國主義去處理，『最好這個世界能安靜點，否則我們也可以獨善其身，閉門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公式已應用於歐洲，現在當然也要應用於亞洲。但在東歐，克林靈宮的安全界線還多少與小國的境界相符合，在東方，牠就不得不被迫而把幾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國家的北部國土硬生生的割裂。為了這，朝鮮的工業與農業受了支解，中國和伊朗陷於無望的分裂和內爭，滿洲的工業成了戰利品。最令人驚訝和迷惑的，便是克林靈宮竟支持朝鮮的託洛斯基！這無異給了整個東方殖民地解放運動一個出乎意外的悶棒。我們不否認美國在企圖利用這些地區進行一種不利於蘇聯的軍事佈置，但克林靈宮不求助於殖民地人民的同情，反而不惜犧牲這種寶貴的同情而進行一種顯然得不償失的戰略企圖，這除了給美國一個無比有利的機會之外，還有什麼良好的結果呢？

美國在這一次戰爭中之最準確無誤的目的便是要繼承幾個老大帝國的殖民地遺產。這些遺產之最重要的一部份便在亞洲。她那樣雄厚的資本以及舊世界資本營壘之相繼陷落，使她無須乎立即採用軍事的佔領政策，爲了避免引起危險的震動，她也用不着立即終結那些老帝國的壽命，她只須迫使她們作一種必需的讓步：把關稅壁壘除去，給予殖民地資產階級以更大的選擇主人的自由，使她自己能得到保障，從容地，不受障礙地把資本和商品傾入這些市場，便適可而止。在戰爭進行中，她已開始這一工作了，她今天之那樣熱心裝做殖民地獨立的同情者和保姆，因而常常嘲罵那些老帝國的腐敗和無能，其主要目的不過在示好於這批殖民地的孤苦無告的資產階級而已；當到奴隸們認真風起雲湧的起來幹他們的危險的解放事業時，這位保姆便又連忙表示不願意他們過於性急地脫離宗主國的血淋淋羈絆了。事實上，戰後短短的時期內，事變發展得那樣險峻和急迫，使得美國在東方也只好採取一種保守的政策。一個過時的世界帝國帝義者是不可能彈出第二種新的樂調出來的。一切『民主』、『自由』和『反法西斯』的好聽名詞只是在掩飾一種不光榮的工作而已。雖然白宮在叱責英國對印度的種種可鄙的罪行，但這並不妨礙牠在那個『解放了』的菲律賓裏，不顧一切把那位『菲奸嫌疑犯』羅哈斯強加於大多數非律賓人民的頭上，結果造成一個內戰，這個內戰的閃光還順便的暴露了一件令人驚愕的事情：原來美國的長期統治工作只給了非律賓一件民主的外衣，對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關係還不敢觸動絲毫哩。那末，我們

還能希望她給別的地方帶來真正進步的禮物嗎？

美國在東方的最得意的收穫是奪取了中國的市場，她顯然把中國的經濟上和戰略上的價值估計得非常之高，以致把她提到『強國』的外交地位上。她的目的非常顯然的，她想把中國澈底轉化為美國資本和商品的重要市場，同時又在軍事上把她造成為對抗蘇聯的重要基地，這就可以解釋她何以那樣熱中於中國政治的穩定和軍事機構的改造。這個古老國家無疑是過於腐朽了，是最易於傳染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瘟疫」的，所以必須把她從頭整頓和武裝起來。但美國一開始幹這件工作，便發覺事情並不是那麼輕易的，如果不經過狂風暴雨的改革，要想把具有二千多年傳統的腐敗官僚統治加以改良，簡直是無望的。莫斯科比白宮方面更熟識這一點，不過克林靈宮主人已宣布過不願意與資本主義世界再引起一種『悲喜劇式的誤會』，牠此刻也只希望中國有一個理想的『聯合政府』，不要讓中國完全擺向太平洋的彼岸去。

她彷彿也會勸告過美國，沒有莫斯科的幫助，中國政治是無法穩定的。但中國的有產者不能容忍任何改良，而美國又不願意一種捺上莫斯科烙印的改良

。美國軍艦、飛機毫無顧忌地裝運中國政府軍隊北上，貝爾納斯強硬聲明與中國民眾的反蘇示威那樣巧妙地配合起來，這使最愚蠢的人也明白：美國正在利用克林靈宮傷害了的殖民地人民的感情來打擊蘇聯。她中國內戰中站在那一面呢？這個問題是用不着解答的。克林靈宮在伊朗北部和中國東北之被迫而撤退，正如牠在意大利問題上的撤退一樣，除了鼓勵貝爾納斯不斷的攻勢之外，大概不會有什麼有利的後果的。在邊境上留下一個內戰，對蘇聯只是一個危險的威脅，距離安全遠得很啦！

美國有一位將軍已明白的聲明：美國從中國經朝鮮到東京已完成了一道堅強的軍事包圍圈。這無意中給了我們一個鎖匙，去解釋美國在這一個地帶的政策。她在朝鮮樹立了一個『右派』政府，在爭獨立的旗幟之下與北方蘇聯佔領區內的所謂『左派』政府對峙，後者又是堅決擁護托管制的。這種出奇的現象，只有拿兩種戰略利益的衝突來解釋，否則從外表上分別羊和狼是不大容易的。誰對朝鮮人民的獨立要求尊重些？這個問題很難答覆。

但最值得注意的還是美國對日本的政策。這是美國單獨控制和佔領的戰敗國，在波次旦宣言上以及在羅斯福的許多演講辭上，她會得到允許，要實行一種徹底的民主改革，而美國輿論公認的最根本的改革是日本的封建的土地制度，神秘的天皇政制就是植根於這種制度之上的。現在距離日本投降以

將近十個月，麥克阿塞顯然對日本統治階級之再教育與美國的軍略利益較之對日本的澈底改革有更大的興趣。下一步將迫使他要考慮：把日本工業剝除是否有利？今天日本缺乏一個社會改革已陷於危險狀態中，剝去她的工業不是使她成了美國一個沉重而又危險的贅瘤嗎？克林靈宮當然是不放過這個弱點的，牠已經過管理委員會不斷提出關於土地改革與民主政治的質問。這迫使麥克阿塞幾次煩躁地宣布美國不需在日本實行共產主義。美國統治者瞭解得那樣清楚，澈底的民主改革與共產主義是緊密關連的。克林靈宮的解釋當然是不同的：牠只希望日本也有一個聯合政府，用一種局部的改良去醫治這個垂危的舊制度。麥克阿塞也十分明白，所以他那個煩躁的聲明是含有雙關意義的：他此刻既不贊成真正的共產主義，也不贊成克林靈宮經過共產黨去改良（也讀作『干涉』）日本的政治。

七、世界前途之預測

我們已經把這個舊資本主義世界的整個有機體做了一番細心的診察，我們很難替牠作出較為樂觀的診斷。美國無疑已在這個星球的廢墟之上擡得了世界的霸權，她現在正在努力鞏固這個霸權。藉金元之助，她企圖使世界的市場能够復蘇和擴大，但為了實現這一着，她勢必要迫使蘇聯放棄分割東歐和亞洲北部的『安全』計劃，進一步還要利用蘇聯的種種弱點，迫使克林靈宮打開牠的國門。假若美國能經過和平的經濟壓力與原子戰爭的威嚇，逐漸助長蘇聯向資本主義的墮落和屈服，這當是最經濟的手段，這也是舊世界獲得穩定的一萬一希望。但不幸這種試驗需要太多的時間和太多的條件，美國當然無法坐待牠的可疑的效果。那末，我們退一步來看，美國是否能够在壓服蘇聯之前，幫助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獲得復蘇和穩定的機會？金元的援助無疑使歐洲幾個臨近崩解的老帝國暫時延長一下壽命，她們的工業和金融可以得到相當恢復；但問題在這裏：美國借款給她們的最大條件是撤去她們的關稅壁壘。那末，我們就假使在下一階段，英、法和西歐其他幾個國家在美國借款的援助之下，暫時獲得一種微薄的週期的景氣（這是可信的），這種景氣立即就引起她們與美國的競爭，特別是在殖民地市場方面。這就使他們對美國那種『門戶開放』政策感到一種不可忍受的壓迫，於是那被迫而擱置起來的保護關稅政策又要重新提出來，財幣戰爭與外交的陰謀又重新活躍起來；其次，有許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如西半球的加拿大、中南美諸小國，

亞洲之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亞，澳洲、新西蘭，非洲之埃及和南非聯邦等大都在戰爭中，因為先進國的陷落，工業有過一種畸形的戰時繁榮。大抵距離戰場愈遠的國家，獲利也最多，如西半球諸小國，她們有些（加拿大等）簡直把資本溢出國外成了半殖民地半帝國主義式的怪物了。這些殖民地國家有少數由於資本已過於充溢，大多數則由於國內農業過於衰微，市場過於狹小，正急於替她們的工業尋求一個出路，現在突然碰到宗主國的商品重新和他們競爭，企圖壓毀她們，這除了把本已緊張萬分的關係弄得不可收拾之外，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第三，美國的金元救助只能限於少數國家，而且每個國家所能得到救助的程度又不同，比如受損害最大的東歐和中歐直到現在還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救助；即使在下一階段，蘇聯被迫而退讓，美國對這些國家的幫助也是有限的，因為她的進出口銀行的基金已行將告罄了。這就表示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國家得陷於恒久的貧困、飢餓、死亡和動亂的深淵中無法自拔，特別是東方那些古老的殖民地國家，農業人口那樣多，農業生產又那樣落後和衰敗。那末，即使某些國家得到一種景氣，這也是非常短促的，牠對於資本主義的穩定將沒有什麼幫助，新的恐慌與經濟窒息將給與這個垂危的舊財產制度帶來更大的災難；最後，工業復興之過於微弱與市場之過度狹小表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本已存在的恒久失業隊伍增加到難於忍受的程度，小資產階級的破產者將大批大批地增加起來，尤其是在經濟特別無出路和過於貧困的落後國家中，這種破產或行將破產的小資產階級數量是難於估量的，這兩大羣逐漸喪失階級地位的人匯合起來將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最大也最危險的累贊。這對於工人階級本身當然也是一個致命的威脅，這種隊伍增加，工人的生活水準是無法提高的，只有絕對降低。我們只須指出美國工人那種風起雲湧的大規模罷工，就可明白，工人的不滿、不安和好戰性已傳染到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土中了。舊世界統治者之普遍缺乏自信，經濟之無望地衰敗，一般小資產階級羣衆之苦悶煩躁，再加上日趨激烈的工人鬥爭，已清楚的指出人類在下一階段又將被迫而回到老的抉擇：法西斯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人們相信：第一次戰爭的勝利，希特勒與莫索里尼的打倒彷彿已經應該替我們保證法西斯主義死滅了，一個『人民的世紀』或『民主主義的燦爛時代』得到穩固的勝利了。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於戰爭結束之翌日不斷驚訝地指出：法西斯還到處活躍着呀！是的，他們也應該清醒了：在一個愈來愈破爛不堪的舊制度基礎之上，『燦爛的民主主義之花』久已枯萎。現在能

够接二連三地生長出來的只是法西斯主義的毒草。那末，不管人們願意不願意，一個凶猛的新決鬥又迫在眼前了，誰也不能避過牠。

根據上面列舉的幾個條件，我們不相信美國能重新穩定這個世界。她希望經過聯合國會議去操縱和穩定世界的政治，又希望經過國際銀行去操縱和穩定世界的經濟，結果，聯合國會議成立的頭一天，敏感的新聞記者便希望向牠提出問題愈少愈好，羅斯福的第一部傑作——國際銀行計劃顯然也因此成了難產。戰爭發生之初，她也會應允過照美國的理想把各國造成為一個民主主義的大家族，但顯然戰爭尚未結束，她便與全世界的舊皇朝、舊宗教、舊軍閥、舊政客進行和解，法西斯主義的機關車似乎又將在美國修補好的舊軌道上重行開到政治舞台上了。這就難怪美國的國會追得要贊成將軍們的建議：為了確保美國的世界統治，維護這個可憐地被人忽視的聯合國會議，美國必須維持龐大的海陸空軍，實行嚴格的軍國民教育，延長兵役，保持全球的戰略基地，最後，大量製造原子彈和毒菌彈。這個瘋狂的計劃分明針對着普遍大災難的威脅，蘇聯的不可忍受的存在，以及資本主義世界的絕望。同樣的理由迫使她要幫助別的資本主義國家武裝起來，戰爭的準備又成了一種瘟疫，軍事預算繼續吞掉國家收入的重大部分，軍需生產像夢魘一樣壓在各國的經濟機器上。蘇聯當然也不能避免這種牽累，她的新五年計劃無論如何仍在國防的基礎上進行。

那末，第三次大戰是不可避免了嗎？這樣一種難於設想的新自殺行為是不是可以避免呢？為了正確解答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公正的指出：戰爭這種冒險的事業不僅損害大多數人類的利益，同時也致命地損害發動這個戰爭的舊制度，照這個意義看來，就是舊制度的主人主觀上也是不願意輕率地選擇這種危險的手段來解決問題的。問題就在：並不是他們的主觀願望，而是一種盲目的社會規律在支配他們的一切行為。他們之終於得出戰爭（和法西斯主義）的結論，正如大多數人民之得出革命的結論一樣，都是以這個舊制度之無法和平改良為前提的。假如他們在這次可怕的屠殺之翌日，便那樣大膽和絕望地宣告立即準備第三次戰爭，這就正確卻誤地證明這個舊制度已陷於無可藥救的地步了。因為一種社會制度追得要靠接二連三的大規模殺人和毀滅生產力來過活，牠對人類歷史還有什麼益處呢？牠還能夠長久的支持下去嗎？自本世紀以來，這個破產和絕望的制度已一次又緊迫一次催促人類在社會主義改造與戰爭（和法西斯主義）之間加以抉擇，人類由於輕信了一種錯誤的領導，已有兩次誤入自殺的歧途，我們相信這一次人類是不會帶着痛徹骨髓的創傷又闖入毀滅的死巷中去的，我們的科學的分析已給了我們一個更夢觀的結論。

美國六十家族之戰爭利潤

喬治·沙爾著

本文著者喬治·沙爾 (George Soule)，自本年一月份以來，在美國『新共和雜誌』上，連續發表了三篇文章，暴露美國資本家在戰爭中所賺得之驚人利潤，並研究戰後發展之前途，指出工資增加是否可能等重要問題。本誌資料室認為上述三篇文章，意義重大，特多譯之以饗讀者。(編者)

一 數以萬萬計之贏利

曉山譯

美國商業部 (Department of Commerce) 估計全國各大企業公司，在除了各種捐稅 (包括過分利潤稅) 以後，所得的贏餘：一九四一年為八十五萬萬元，一九四二年為八十七萬萬元，一九四三年為九十八萬萬元，到了一九四四年為九十九萬萬元。這九十九萬萬元的贏餘數額，與一九三九年尚未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時的贏餘相比，要超過一倍以上；若與美國開國以來商業最繁盛的一九二九年相比，也要超過三十萬萬元。據政府的統計學家說，這些估計也許太低了，因為他們所根據的，僅是幾個大公司的記錄，那些小公司相信獲得了更多的利潤。

在這龐大的數字中，戰事工業的贏利當然比民用工業的來得大。但是，有若干商品的生產額已減少，很少幾門商業是找不到代替品的；人民總共的消費遠勝於以前；政府又不斷地在收購各種各樣的生產品。

譬如：四十七家鋼鐵廠，除去了捐稅以後，淨得的贏餘在一九三九年為一萬四千六百萬元，一九四一年為三萬二千五百萬元，一九四四年為一萬九千四百萬元。一年獲得二萬七千四百萬元的贏餘，一九四四年獲得二萬一千二百萬元的贏餘。

四十九家出品食料、飲料與菸草的公司的贏餘：一九三九年為一萬五千一百萬元，一九四一年為一萬五千九百萬元，一九四四年為一萬七千五百萬元。

鐵路獲利更鉅，除去了捐稅以外，一九三九年淨賺九千三百萬元，到了一九四一年淨賺九萬〇一百萬元，一九四四年也淨賺了六萬六千八百萬元。從上面的事實看來，這許多贏餘，並非僅僅來自軍需工業的了。

聯邦儲備局 (Federal Reserve Board) 根據六百二十九家企業公司的報告，紀錄下他們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的贏餘為九萬八千一百萬元——比一九四四年同一時期內的贏餘九萬一千萬元高出七千一百萬元。鐵路方面，根據其報告，也同樣的獲利。

我們不要忘記，這些數字所包含的是除了公司的債息及其他各種的費用，以及聯邦、州、和地方各級政府應徵的稅額以後，餘下來的數額，純然歸於公司老闆們的。要是我們把所得稅、過分利潤稅 (最高稅額達百分之八十五·五) 也估計在這贏餘之內，那麼在一九四四年的贏餘，約為二百五十萬元，要超過前面所記載的數字一倍以上。這裏就指出了在戰時的成本與價格的水準上，充分生產，又不抽任何戰事特別稅，美國的工商業所能够造成的一筆天文數字的巨額利潤。售價與成本既然沒有什麼暴漲，彼此間的步驟又非常配合，這就證明：足以刺激起一切生產的市場需要，對於國民收入是非常重要的。

贏餘怎樣用？

那些公司的額外贏餘，大部分不是分給股東的。紅利政策 (dividend Policy) 是保守的。譬如：在一九四四年，只拿四十五萬萬元 (較一九四一

年的標準年略少)用來分給股東，其餘的五十四萬萬元都併入了公司的公積金。公司把這一份額外的收益，不用之於增加他們的股東的購買力；而大部份主要的是在鞏固公司本身的地位。在一九三九年，一百五十二家大企業的優先股與普通股的股東，總共只分了六萬五千四百萬元的紅利；換句話說，只佔他們公司淨利的百分之七十七；這餘下的一萬九千三百萬元仍被留在企業中。在戰爭開始之後的五年當中，這許多公司，只拿他們贏利的百分之六十作為紅利，平均每年僅六萬七千一百萬元。公司每年幾乎從利潤中扣出十萬萬元左右；戰後計算公積金，在這上面要多出四十九萬一千五百萬元。

除了上面所述的大公司大企業以外，在比較小一些企業組織中，他們的利得百分率還要大。譬如在鐵路方面，紅利較之一九三九年之純收入更大，一萬二千六百萬元對九千三百萬元(原因是上列總收入中，把鐵路方面的某些虧蝕已扣除了)。在戰時進行着的幾年中，鐵路方面雖然拿二萬萬元以上的數額來作為紅利，而實際上，這個數額還不到淨贏餘額的四分之一呢！

前面所說的各業贏餘數額，都是在去除了各項開支後才見之公開紀錄的。但在這些開支裏面包含了從當時收入中撥出添置工廠、配備、以及改善設備的一大筆附加費用；公司為戰事生產所購的機器的折舊率，規定在五年中全數退清(雖然大都在五年後仍有生產的價值)；職員之巨額薪金與紅利；為造成商譽而化的大量廣告費；為改善戰後生產品及生產方法所用的研究費。此外還有為應付一切意外所作的種種準備。(就會計上來說，這許多開支，都不能算為真正的「開支」——譯者按)

幾個例子

公司的報告，並不能夠公佈一切重要的事實，但從後面幾家比較著名的看來，也許可能發現一些東西，那倒也是一件有興味的事情！

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這一家大公司於戰爭時期內減去了稅額，在一九四三年曾淨賺一萬五千萬元左右；一九四二年曾淨賺二萬〇二百萬元。就大體上說來，過分利潤稅的徵收固然使淨贏餘額略低於戰前；但假定牠在一九四六年的情形能像一九四四年一樣大規模，成本與價格不變動，過份利潤稅却又得以取消，那麼牠的贏餘數額將在二萬六千萬元至三萬萬元之間，比戰前要超出三分之一。

一九四〇年以來，公司之盈餘自四萬七千一百萬元增至六萬四千五百萬

元，派付紅利之後，實賺一萬七千四百萬元。加之以，公司另外又立出一項特殊的「意外準備金」。在這項目下，一九四〇年撥用了一千七百萬元，一九四一年撥用了一千八百萬元，一九四二年撥用二千六百萬元，到了一九四三年，撥用的數額達三千六百萬元。以後的數字無從探悉。這筆款子是預備充作復員的開銷等用場的。在敵國及其統治國內的全部投資——那是一個相當大的數額——在一九四一年，計算贏餘之前，這一筆投資便已不計算在內。而將來要求政府賠償時，因賠償不足而可能遭到的損失，也可用這筆款來彌補。

通用汽車公司每年的折舊和分期償債的費用，自一九三九年的四千三百萬元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六千四百萬元；從後來幾年較大的廠房與設備看來，這個增加原也是意料中的了。但除此以外，還有為獲得戰爭生產所用底特別設備的額外折舊費用，這一筆費用，公司可以隨便在購買機器後之五年內扣清。這些數字的意義，就是說明公司從戰時收益中償付了一筆分期實現的計劃開支(大批新裝備)之後，計算出來的利潤。除此償付特別的軍事工業機器以外，其他的開支大都每年分作十期或十二期償付的。

通用汽車公司的營業總額，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要增加到三倍。但同時牠的開支費與修理費，也自六千九百萬元增加到一九四三年的三萬〇九百萬元——最後一年是有記錄的。開支和修理費已增加至四倍半，這個事實也可以說是消耗戰中在生產上所必須有的調整的反映；但牠似乎至少指出：在結算贏餘數額之前，公司早已把所有這一類開支很精密的估計過了，而且工廠供將來開工，情形還很好。

在全國每年收入最多的十五人的名單中，通用汽車公司的職員倒佔去了六位。該公司的總經理威爾遜每年收入四十五萬九千〇四十一元，在名單中佔第二位。六個人總計收入每年二、〇五四、〇八六美元。這僅僅指薪金和紅利而言，從投資中得來的收入是除外的。享脫每年收入三十五萬九千五百十九元；柏拉萊每年收入三十五萬〇四百三十二元；史密司與白朗每年各收入三十萬六千三百十元；凱脫琳每年收入三十萬六千一百十七元。

公司的支出雖然大，但在一九四四年年底，還保有一萬六千九百萬元的現金和四萬二千八百萬元的政府債券。這整筆款子，隨時都可運用去抵付一切賬單、利息、紅利，甚至當時業務上所招致的損失虧蝕。假定公司關閉三年四年，照樣可以有足够的流動資金，照着原來規定的利率，去付給股東們

，不管將來稅額減低與否。

合衆國鋼鐵公司 (United States Steel) ——這一家公司保有全國鍛鋼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他的收入，連已增加的稅額也計算在內，自一九三九年六千五百萬升至一九四一年的二萬七千二百萬元和一九四二年的二萬六千一百萬元。往後幾年減少了，一九四四年的收入只有一萬五千五百萬元。但在這一年內，已不再償付過分利潤稅了。

除支付股息之外，合衆國鋼鐵公司的盈餘在一九三九年為一萬六千三百萬元，至一九四四年底為三萬七千七百萬元——賺到了一萬一千四百萬元。

生產物資的增加，可從折舊等常年的支出中看出：在一九一九年僅是六千一百萬元，而到了一九四四年，升至八千一百萬元；另外因戰事生產購置了許多的特別機器，因此我們又可從償付這筆緊急減債基金的數額中看出生產工具的激增，其數額在一九四一年為一千萬元，一九四二年為三千二百萬元，一九四三年為四千四百萬元，到了一九四四年則為五千七百萬元。在這時期中，工廠和投資的擴充，都是從戰時營業中支出的。這裏我們又可從公司的生產品方面證明盈利的程度；在一九四〇年，鋼的生產額的飽和點是一千五百〇一萬四千噸；而到了一九四四年則達到了二千一百〇五萬一千噸的紀錄。

現在假定這個生產紀錄，能繼續到一九四六年，生產品的成本與售價也能保持一九四四年的水準，那麼在付掉了聯邦的稅額以後，公司的贏餘將比一九三九年增多百分之七十五。同時因為戰事生產擴張，各種折舊與減債基金等費用可能減少，所以這個總數恐怕還要大一些。

這一家公司也同樣的保有很多的現金與政府公債。

美國製鋁公司 (Aluminum Company of America) ——美國製鋁公

。牠的工廠擴充與財源的擴充是從戰時營業中支付了的，因此戰後牠的財產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假定它的營業範圍現在收縮到戰前的程度，資本主們將與一九三九年的情形一樣好過；若保持戰時的生產量，那麼，他們的獲利將不可勝計。而所賺的這些錢，在工人與消費者兩方面，當然能分享到一點好處。

通用電氣公司 (General Electric) 除了在公用事業方面投資得到收入以外，他的生產品要佔全國電氣設備的四分之一；他另外還有大量的塑型體 (Plastics) 的生產（塑型體即今日所稱之化學玻璃代用品——譯者按）。他的贏餘從一九三九年的五千一百萬元增至一九四三年的一萬五千三百萬元，和一九四四年的一萬九千五百萬元。在一九三九年拿來分配紅利的數額為四千一百萬元；而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的四年中，由於抽稅的關係，可用作紅利分派的數額平均只不過五千萬元左右。在一九四三年，單是過分利潤稅一項，已是一萬八千五百萬元，而一九四四年聯邦政府抽的所得稅與過分利潤稅，又是一萬五千萬元。

在付了股息以後，從贏餘中得到的公司公積金，在一九三九年為一萬二千四百萬元，到了一九四四年增為一萬七千二百萬元。在同時期內，公司的折舊與償債基金也自一千萬元增加為二千八百萬元。通用電氣公司的贏餘增加，是說明公司生產量發展的一個最明顯的事實：純粹營業數字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要超過四倍多，即自三萬〇四百萬元增加到十三萬五千三百萬元。假使公司方面在戰後能保持這生產量，不需要去減低成本或增高售價，只要單是一項過分利潤稅的取消，就能使淨贏餘額增加到一萬萬元與二萬萬之間——相當於一九三九年的紀錄的三倍至五倍。

杜邦·納莫公司 (DePont de Nemours Company) 在通用汽車公司方面的投資，可得百分之二十三的利益；此外，牠自己又製造許多各種不同的化學用品與化學代用品。牠的營業收入，在一九三九年為六千七百萬元，到了一九四四年升至一萬六千萬元。牠在通用汽車公司方面的收入，一九三九年還有三千五百萬元，而在戰爭時期內平均每年的收入跌到了二千七百萬元。這一個傾瀉，再加上每年在增加着的七千萬元的所得稅與過分利潤稅，使牠餘下的利潤數額，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四的四年中間，只有七千五百萬元，不及一九三九年的九千三百萬元。

杜邦公司從贏餘中提出的公積金數額，自一九三九年的二萬五千六百萬

元增高到一九四四年三萬六千六百萬元。公司所費的折舊，顯得非常龐大，在一九三九年還只一千九百萬元，到了一九四四年激增到三千四百萬元。公司方面在一九四四年底，除了保有一種擴大的生產能力之外，尚有一萬四千六百萬元的現金。假使我們不顧贏餘額由於課稅而降低，那麼可以說，公司方面絕對不會因受戰事的影響，而使財政拮据，一蹶不振。

現在過分利潤稅已經廢除，公司方面只要維持戰時營業的水準，不需要變更成本或售價，便能得到一萬五千萬元的贏餘——比一九三九年的贏餘要超過百分之六六·七。

錢到那裏去？

從上面的事實裏我們可看出，公司因戰爭而得到的特別贏餘，主要的並不是落到股東的手裏。而大部分却記在公積金的賬目上。雖然有時爲了新設工廠、添置設備，從這裏面支出了一筆龐大的費用，但是主要的還是用在平日的開支方面。因此也可說，政府在購買貨物以後付出貨價的時候，無形中已經替公司付出了切的開支費。

戰時，營業方面的一筆巨額收入，他們的股東是享用不到的。這筆款子

據公司發言人們聲稱：戰時所獲的利潤，和目前的工資物價及僱用問題絲毫沒有關係，這種都是已過去了的狀況，你不能再倚靠着過去的利潤來進行企業。放在目前的問題是：企業界的前途將怎樣？

不錯，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但過去所獲的利潤並不能說和答案沒有關係吧！戰爭將許多重要工業的生產力擴大，同時它也帶來了大量的游資。這些已擴大的生產力和充分可以利用的游資，（該數較一九三九年企業界所流通的約增五百萬萬美元。）無疑地和企業界的前途發生很密切的聯繫。

二 戰後企業界的利潤將有怎樣的龐大？

謝山譯

早已變成了擴大的地產、股票、公債、或銀行裏的存款。製造業、商業、公用事業等非金融機關，在一九四五年七月有三百七十一萬萬元的銀行存款，這個數額，比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記錄要增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他們在二百六十二萬萬的流通貨幣中，握有大部分，這種通貨自一九四一年以來已增加至一百六十六萬萬元。除了銀行和保險公司之外，各種公司和會社，他們在一九四一年底，只有四十三萬萬元的政府公債；到了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却有三百萬萬元。由此，我們可以估計出他們因戰事而收入的數額約爲五百二十四萬萬元現金，或等於一百六十七萬萬元的銀行存款，一百萬萬元的通貨，二百五十七萬萬元的政府公債。

這樣一筆龐大的流動資產，在那些營業主管人員的手裏，將作何用處，倒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他們將怎樣派用場呢？他們或者用於發展生產事業，或者用來分派給股東老闆而不擴張生產。這兩者所得的後果，將截然不同。保留着這樣大量的資金和在戰爭中產生的生產能力，這是一種具有決定性的權力，這種權力就是戰爭利潤的真實意義。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在這筆錢上享受到利益；假使有的話，到底誰去享受這一份利益？又怎樣去享受這一份利益？這是戰後繁榮全部所繫的問題。

的資金，即使它資金的運用偶有拮据時，銀行和金融市場也都很願意供給所需要的。至於勞動力的供給，雖然在復員中因改業而發生混亂，而且在若干職業中還發生短缺，但整個說來，却是完全能够達到這個目的的。當二三百萬的工人從他們的職業退休時，從軍隊的復員中却可有三四倍於此數的產業預備軍，總之，可能雇用的工人至少可使每工作週縮短至四十小時。

自然，船隻飛機坦克槍械軍火等定貨將急銳減少，一切戰爭必需品的生產都將大受打擊，但住宅商屋工廠的建築，以及火車、汽車、電氣用具、衣服、家庭用具等都需要甚急，沒有一個零售商不因存貨的缺乏而大感困難，沒有一個工廠主趕得及製造足夠的日用品來供給他的客戶。

首先我們假定企業界發覺它可能有和戰時同規模的生產和銷售，而且它是願意這樣做的，那麼它握有生產上所必需的廠房和機器，它有着足夠運用

絲毫不含幻想的：在和平後，企業界將與戰爭時期內一樣能接受消費者更多的購買力來製造和推銷大量的貨物。

官方估計一九四四年公司的利潤為九十九萬萬美元，較一九三九年增加兩倍。假使它們每年生產品的推銷額維持原狀，而生產品的成本與限價也不變，那麼它們可占有一九四年的利潤再加上未被政府抽去的過分利潤稅。（過分利潤稅自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起停止施行。）商業部會估計公司利潤在付聯邦各稅前為二百五十萬萬美元。姑粗略地估計一個最高數，通常的所得稅將抽取百分之四十，那麼將可賸下一百五十萬萬美元。如此戰後利潤將較戰末全年增加百分之五十，較戰前全年約可增三四倍，這不是不可能的揣測罷！

物價與勞力成本

物價與成本間的距離，能否如戰時維持不變呢？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不能有一個肯定的答案。不過物價最近總少有下跌的趨勢，因為在各市場中，需要常大大超過供給；而統制物價政策又受到嚴重的攻擊，也許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以後不會再施行了。某些商品的供給量或許可以逐漸增加以滿足需要，但在許多重要部門如房屋、汽車、棉織物、衣着等却並沒有這種趨勢。總之，物價或許不漲，至少它是不會慘跌的。但成本能否上漲呢？

整個工業界，勞力成本當為支出的主要的因素。在特定一營業中，勞力成本和原料相比，也許會僅占少數，但在原料本身中便已包含了大量的勞力成本。甚至生產工具的價格最後也有一部是用來償付勞力的。那麼一般工資的增加能否促使成本上漲呢？

自對日勝利後，勞力成本便因工作時間的縮短而減少了。例如一廠本依每週工作四十小時以標準工資率付給，延長工作時間須付一倍半的工資。假如在戰時工作四十八小時，而現在已回復到四十小時，這樣平均每小時可以節省百分之八的成本。（工人每星期所獲的工資當然較此更為減少）。那麼標準工資率再增加百分之八並不會影響總勞力成本。

但更重要的是每小時的生產量可能再為增加。在固定的工資下，每小時生產量增加，勞力成本便降低了。在戰時，生產力增加抑是降低，會引起激烈的爭辯。這是很難獲得決定，因為沒有方法可以確實決定戰時物質的生產量有否增加。試將一廠在一九三九年製造汽車，在一九四四年製造坦克、飛

機、高射砲等作為例子，同時更注意戰爭進行中武器式樣的時時改變，那麼幾輛六缸汽車等於一輛一九四年的坦克車呢？除了約略的抽象統計數字外，沒有肯定的答案可以答覆。

不過我們確已知道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三九這二十年中每單位生產品的工作小時已減少了百分之五十六，這就是說每小時的工資不改，勞力成本已可減少一大半。在這時期中，因增加生產力而獲的平均利益為每年百分之二。五，假使我們估計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六仍維持原率（僅生產平時用品），在六年後它將增加為百分之十五。如果這估計是可靠的，那麼工資可以提高到百分之十五以上，再加上因取消延長工作時間而節省的百分之八，而不致影響總勞力成本的增加。當然，這是指一般的製造業，並不需將它應用到個別的營業，在那兒生產者的利益也許較此為多，也許較此為少。

此外我們還有理由可說，往後幾年內每小時生產量可能獲得更大的贏利。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九，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幾年，生產品每單位所需的工作時間指數維持不變。這個時期，正因頻遭工人的改善，生產品品質的改進，和各部門發展的不平衡，效率自很難增高。但在戰後，因改善機器及設備，使效率有很快的發展，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二這三年中製造業的效率增加百分之二十七，即每年增加百分之九。

研究這個問題的學者，解釋造成當時龐大贏利的一個理由是因為當時工資的購買力增加甚速。較高的工資促使雇主裝置生產力較高的機器以節省勞力，同時所生產的商品又能儘量為市場所吸收，不致過剩。

戰時生產局（War Production Board）主席克勒（Krug）會從四十二家工業所收集的資料，估計戰後的生產將超過一九三九—四一年均數的百分之八十七，而就業者却祇超過以前的百分之三十三，這就是說，從每個個人的生產品中可獲得百分之三十的贏利。

即使工資是相當的增加，然而成本不但不會上漲，甚至反會下跌。所以最近絕不會因物價下跌或勞力成本增加而減小利潤。假使企業界的生產能同戰時生產量相等，那麼利潤將是龐大而驚人的；即使因增加工資而增加了成本，一面物價又形下跌，各公司仍可與工人及消費者共享一百萬萬美元的賸餘，而牠們獲得之利潤絕不致少於一九三九年。倘將這些賸餘單獨分配給工人，他們儘可增加其收入至超過戰前水準的四分之一。

減少生產量下的利潤

現在讓我們再假定各公司雖然已保有擴大的生產，大量的資金，和充分可以利用的勞力，而他們的生產量和推銷量仍沒有超過戰前，那麼它的利潤將怎樣？

一般人都以為大量投資於生產工具就等於一大筆呆滯的支出，除非銷售額是同樣大大增加，否則這筆支出將吞沒利潤。我們可以這樣說：因戰時擴充而生的固定費用，將是擴大生產的一個強有力的動機。

不，事實不是這樣，許多大公司都不願在戰時擴大其生產力，它們都害怕在戰爭結束後將為這沉重的扭負所束縛，為了獲得大量的軍需品，政府會保障企業界不致因過度擴充而受損失的危險。

政府會用它本身的經費建築了許多軍需工廠廠房而將這些建築物租與私人去經營，現在這許多公司便可自由選擇是否繼續或停止經營，假使他們決定不需這廠房時，他們可以放棄而絲毫不受損失。

政府又直接購買了許多新式戰事生產機器，可是現在它必許趕快被搬走，假使在它所裝置的工廠的廠主說不要它的話；廠主是絲毫不擔經濟上的損失，而且許多這種機器確已在搬運了。

稅律又規定任何工廠機器等凡因戰事而裝置的，可以在五年內全數攤提清楚，過此便可盡量生產而不負任何費用。因戰事而擴充最大的是在一九四一年，每一企業在那年因戰事生產而新建的工廠和新購的機器到了一九四六年便可成為不花成本的了。

工業界很少為軍事工業擴充而借款，所以擴大了的工廠，所付的利息却很少。它們也不會為擴充而發行新股票以取得大量資金，因之，在戰時增加的股息也是微小的。

企業家可以簡單地將其擴充的工廠關閉，回復一九三九年的生產狀況，（造成比一九三九年更大的失業，）而不致因固定費用而大受損失。這就是他們在戰事開始之前準備將來所採取的步驟，而政府也已保障他們這種行為以獲得必要的軍火武器。

政府保障戰前的利潤

企業家對其事業的小心愛護，還不止上列各點呢！假使有某種企業的利

潤在復員中較前確是減少了，或因工資過度增長以致利潤跌至最低點，這種辦法稱為「物歸原主」（"Carryback"），實際上它是政府因為各公司在戰時會付過分利潤稅，現時贏利較戰前為低而付出一種補助金。它的最後意義，就在使私人企業對戰爭沒有擔負。

讓我們來看它是怎樣運用的，用通用汽車公司為例罷！它保證通用汽車公司在一九四六年的利潤不致較一九三六——三九年的平均利潤慘跌至百分之十六·五以上。

詳情當然沒有這樣簡單，不過這裏有一個數字的說明。在一九三六——三九年，該公司未付聯邦各稅以前的利潤為二萬萬五千萬美元，這兒須付百分之四十的所得稅，在付稅後的淨利平均約為一萬萬五千萬美元。它在戰時超過二萬萬五千萬美元以上的收入部分更須付百分之八五·五的過分利潤稅。

現在讓我們假定該公司於一九四六年在付稅前的收益只有二萬萬美元，那麼在付稅後淨利僅存一萬萬二千萬美元。但因它在付稅前的利潤較一九三六——三九少五千萬美元，它可以更正一九四四及四五年的納稅數字，將戰時收益五千萬美元列入本年度，這是不應納過分利潤稅的，那它就可獲得五千萬美元的百分之四五·五的退稅，（百分之八五·五和百分之四十的差額。）政府須還給它二一·七五〇，〇〇〇美元，於是該公司一九四六年納稅後的利潤將為一四一·七五〇，〇〇〇美元。

所以在一九四六年該公司雖實比一九三六——三九年收入減少五千萬美元，因政府的補助使它實際收入祇減少八百二十五萬美元。用這樣方式，它在一九四六年的贏利可回復戰前的狀況，至多每五十元減少八·二五元，即僅遭百分之十六·五的損失。

同樣的保障，在每家會付過分利潤稅的，在不超過它們付稅的範圍內都不能應用。如一公司的過分利潤已很大，那它可在一九四六年停止營業，靜候從政府取得大部戰前的平均利潤，此外它並有已儲存的現金存款債券等資金，在戰時儲有的至少已有五千萬美元，很足以維持企業度過營業停頓的時期。

生產和銷售的受限制本是使企業失敗的，但現在却不成問題了。即使有無法防止的不景氣降臨，公司的主管人員和股東祇感很小的不便而便可繼續

進行。假使他們限制生產以抬高物價，它們仍被保障可得利益。但在一九四六年，政府將担负資方對罷工時關店的大部費用，它幾乎要担负資方因工人罷工所受的損失的十分之九，所以企業界的主管人員儘可不睬工會的要求而讓政府來替他們償還。

通用汽車公司的罷工者大多住在密昔根 (Michigan)，在那兒對罷工的工人是不支付失業保險費的。失業救濟金所規定的水準，比正常收入相當減低，並須經過一「等待時期」再行付給，有時甚至還須再等候數星期方才到手。他們非常當心，不去維持自動停工的工人，並且對於拒絕適當就業機會的工人，是不支付失業救濟金的。但是在現行稅律下，對於商業却有了偏袒。利潤的誘惑在炫耀着，而損失的危險已移去了。企業界可以因某種理由或

三 利潤與工資

少業譯

最近有一個足以代表通用汽車廠之見解的廣告。一個送牛乳的站在門階上與主婦談話。他說他的牛乳要漲價了，因為他聽說她的家庭收入增加了。這話是荒謬而不公平的。牛乳有一般的市價。不論收入如何，人人都付相同的價錢。那個送牛乳的人若要看家庭的賬目那就太無禮了，若要看不同的家庭索取不同的價錢那也太滑稽了。這裏假定：勞動力的價格隨着供求的趨勢及爭議的過程應該要達到一定的市價。每一個工業僱主應該能以相同的價格去購取一特定種類及品質的勞動。至於他購得勞動力之後，可以得到多少盈餘則僅是管理上的事情；管理得有効果就得到多，否則就少。這種程序若被推翻，那末私人企業的基礎也被移去了。

各工會正在要求查看僱主的賬冊，但很少人了解這件事的意義。

工人因為過量的工作等等而蒙受減少工資的損失。他們需要增加工資以恢復其購買力。每一種重要的工業幾乎都有這種要求。因此僱主若爲了增加工資而提高物價，則工會就要乾脆跟着提出增加工資的。他們若爲了多得一塊錢工資而要支付一元以上的更高的生活費用，那末他們的購買力是不會恢復的。因此至少在產業組織工會方面的工人是以增加工資而不提高出品的價格爲增資要求的條件的。

「你做四十小時的工而要求四十八小時的工錢。」但工會也給他一個中肯的回答——「就你的成本與利益而言，你的確是能負擔的。此地就是所根據的數字。如果你有更好的證據，拿出你的賬冊來證明罷。如果你能證明我們是錯的，我們願意撤回我們的要求。」

這時候經理們就拿出私人企業之下的特權來遮掩。或者他們使用口頭的辯護，質問工會是不是想做僱主，並問牠們願意利潤降低的時候工資也減少，還是到營利少的公司去拿更少的工資。當然這不是工會的立場。牠們倒是想全國的購買力增加的；經理們說這是不可能的，而各工會祇要他們拿出證據來證明這一點。關於利潤，祇有當一般僱主堅持他們不能支付勞工們所認爲公正而必需的工資時，才發生問題。

這是不是像通用汽車公司所發表的意見一樣，對於私營企業的一種革命的威脅？要求支付能力的證據，並不是什麼新的事體；作者曾於一九二二年參加過一次工資仲裁，當時會查看紐約印刷工業的賬目，作爲仲裁者的參考。現在各工會並不要求營利多的公司的工資多於營利少的公司；他們是在求取整個工業的加薪。工業組織工會的新立場，就在他們在物價不上漲的條件之下增加工資。

拿上述送牛乳者的那個廣告做類比是和大多數類比的論調同樣容易引出

全無理由的工作停止或縮小它們的活動而仍能繼續生存，它可以從公家財庫中得到援助。

我們可以揣測，國會允許這種情形的存在，是使企業界可以有足够的資金渡過因轉變到平時生產所發生的不穩定，並準備未來的擴充。但由於這樣的政策，國會已給了私有企業一種資源，令他們可以實行財政緊縮，或可以和工會作長期戰鬥。

企業界可以獲得龐大的贏利，假使它能使生產漸趨穩定而繁榮；但是它只受很小的損失，假使它不這樣做的話。這當然不是現行法律的初意。至於不景氣對於政府和私有企業間所造成的影響，那是另一件事了。

錯誤的結論的；牛乳公司不是拿工資的受僱人，而主婦們也不是大公司。但讓我們把它的詞句改換一下，使它可以和工資的爭執更配得起來。送牛乳的說：「爲了要付我的房租，養活我的妻兒，我要收更多的費用。」站在門階上的女人回答道：「我付不起更多的費用。」送牛乳的認爲根據公佈的數字，她以及其他一切由他送牛乳的人家，都增加了收入並且付得起他所需要之費用的。如果她能提出付不起的證據，那末他可以重新考慮一下。爲了要結束這爭論，她道：「無論我是否付得起，這根本與你無關。」

這一點雖不需要仔細研究，但讓我們考慮我們所想到的與產業組織工會正相反的態度罷。例如著名的共和黨員及私人企業的保護者，即礦業聯合會的劉惠士（John L. Lewis）說得好，價格與利益並不是他所關心的。他要廢除物價管理。讓僱主們任意定價儘量賺錢。

劉惠士要求增加礦工的工資，這或許是容易辦到的。若不是他認爲礦工們不懂得在生活費高漲之下，工資的增加是沒有益處的，就是他想加他們一些工錢而阻止其他工會爭取他們的要求。有時他似乎採用着後一政策。無論如何，我們是不願意礦工與礦主間的衝突增加我們的煤價負擔的。

像通用汽車廠之類的僱主們先是認爲他們無力加工資，然而又說他們的價格與利潤無關，這在邏輯上早已碰壁了。這僅是一種時髦而不很穩當的陰謀麼？凡對這種爭執有經驗的人，一看就知道一般工會領袖比一般僱主們的立論聰明得多。但我們不常拿辯護者的技巧來判斷一件事的真相。讓我們放大眼光看看利潤中之公衆利益的問題罷。

隱藏了什麼材料？

從公布的記載中我們知道：

- 一、在一九四四年，所有公司比一九三九年多賺兩倍，捐稅除外。
- 二、如果將來銷量和一九四四年相仿，而成本不增，公司至少將比一九四四年多賺百分之五十，因爲過份利得稅已經廢除了。
- 三、戰時的利潤，大體而言，並不爲股東提去而仍在公司中。公司的流動資金比之戰前至少大五十億元，同時他們的生產能力也已激增。
- 四、縱使銷量及贏利比一九四四年低，但仍可得到和一九三九年一樣的淨利。
- 五、如果一九四六年的利潤比一九三六——三九的平均數低，政府對於

錯誤的結論的；牛乳公司不是拿工資的受僱人，而主婦們也不是大公司。但讓我們把它的詞句改換一下，使它可以和工資的爭執更配得起來。送牛乳的說：「爲了要付我的房租，養活我的妻兒，我要收更多的費用。」站在門階上的女人回答道：「我付不起更多的費用。」送牛乳的認爲根據公佈的數字，她以及其他一切由他送牛乳的人家，都增加了收入並且付得起他所需要之費用的。如果她能提出付不起的證據，那末他可以重新考慮一下。爲了要結束這爭論，她道：「無論我是否付得起，這根本與你無關。」

這一點雖不需要仔細研究，但讓我們考慮我們所想到的與產業組織工會正相反的態度罷。例如著名的共和黨員及私人企業的保護者，即礦業聯合會的劉惠士（John L. Lewis）說得好，價格與利益並不是他所關心的。他要廢除物價管理。讓僱主們任意定價儘量賺錢。

劉惠士要求增加礦工的工資，這或許是容易辦到的。若不是他認爲礦工們不懂得在生活費高漲之下，工資的增加是沒有益處的，就是他想加他們一些工錢而阻止其他工會爭取他們的要求。有時他似乎採用着後一政策。無論如何，我們是不願意礦工與礦主間的衝突增加我們的煤價負擔的。

像通用汽車廠之類的僱主們先是認爲他們無力加工資，然而又說他們的價格與利潤無關，這在邏輯上早已碰壁了。這僅是一種時髦而不很穩當的陰謀麼？凡對這種爭執有經驗的人，一看就知道一般工會領袖比一般僱主們的立論聰明得多。但我們不常拿辯護者的技巧來判斷一件事的真相。讓我們放大眼光看看利潤中之公衆利益的問題罷。

我們不知道近年來各私人公司與工業的單位勞動成本及其他單位的成本實況如何。

我們不知道一九四六年的和平時期生產品的單位成本是什麼，更不知道這是怎樣估計出來的。

我們不知道經理們估計一九四六年和平時期生產的單位成本到底多少，又不知道這些估算是怎樣得出來的。

我們不能詳細知道經理們怎樣估計一九四六年的生產量及行銷量。

因此我們難於估計在繼續限價之下，增加特定工資後對於最低利潤及總利潤的影響。

當然這些估計是不固定的，或許會隨着經驗的進展而變化。但經理對於未來的計劃是以估計爲根據的。在討論未來的工資時，它們爲什麼不被攤出來呢？即使這些估計或許還免不了很大的錯誤，但我們可能在這範圍內計算增加特定工資後對利潤所生之最高及最低的影響，並且就中去找取一定的機會。工業管理上的每一種決定都帶有某種機會。最好的管理的藝術就是儘可能地避免盲目的乘機。

經理之拒絕（至少對政府）公開他的賬目，就表示因爲他是唯一知道上述那些情報的人，所以他要獨自來決定增加工資所可能做的及應該做的一切。

沒有統計的數字，而以談判、調解、仲裁來決定工資，很可能使勞工得到全國總收入中很少很少的一部份。

會計上的關連性

無論工資的決定可以根據被隱藏着的材料，或祇根據大衆所知道的，決定者應該知道公司的利潤與成本的數字並不就是他們所認爲真正的材料。精細的會計師會指出即使在同一營業狀況之下，每年的利潤會特別的高或低。成本也同樣如此。

會付相當過份利得稅的公司會補償其損失。

六、根據戰前的趨勢，很可能勞動成本將因每小時出產之增加而削降。

這一切材料產生一個假設：每小時的工資可以普遍地激增而毋須增加物價。但關於將來支付的能力，並沒有公佈的材料以資參考，那末靠什麼來估計呢？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購買生產設備的各種不同的方法。新的設備可以全部開在購買時那一年的支出賬上。或許因為借錢購買而要付利息或分期償債金。這樣就要使購買那一年的利潤大大減少。或許它可以用贏餘來購買，這樣就更和成本及利潤無關係了。

現在一般的習慣對於新的設備都用折舊來開銷。開銷了一次折舊就像成爲一種支出，因而等量地減少了當時的利潤。折舊的百分比愈大，成本愈大，利潤愈小，直到購買的價格付完爲止。這種辦法可以把現在的利潤移轉到未來去，假定現在買了許多將來要買的設備，而折舊或分期償付的時期也比該設備可以應用的時期短。於是在高度生產及盈利的時候，那公司買了很貴的新設備，不分作十或十二期而逕以五期付清。這五年間的利潤當然要減少了，因爲它的成本包括這一筆費用在內，但期間過去以後它的成本就要跌了許多公司在戰時正就是這樣幹的。

存貨估價的方法是另一種可能的變動。假如一個公司用「先進先出」的方法，它以年底的市價估計其存貨。假如一個公司用「後進先出」的方法，它以年初的市價估計其存貨。如果在漲價期間中，一個公司從前述的第一種方法換用第二種方法，它就減縮了它的利潤，雖然它的實際存貨還是相同，並且還是以同一價格購進的。在十一月一日告終的一九四一年的會計年度中，亞默公司 (Armour and Company) 就因爲這種變動，把四百二十萬元的淨利縮去了。

因爲它用後進先出的方法，在戰後價格傾跌的年份，亞默公司將減少它存貨的損失並增加其利益。（然而價格若繼續傾跌若干年，則兩個方法的結果都相同了。）許多公司在戰時都作這種變動，致使他們自己對於戰時的捐稅付得極少甚至等於不付，更因此免却了戰後物價暴跌的影響。

如果一個公司在它的賬簿上使成本多支出一些以造成一種特殊的準備，它可以提高它成本的數字並減低它的利益，而絲毫不用減少它實際的收入或流動的資金。即使財政當局不准許這種支出，因爲它底目的是逃稅，但若使用成本會計，它就要被暴露了，並且這就可以作爲限價的根據。一旦停止這種準備的製造，並且運用原有準備來應付它所忽視的意外，成本必隨之而跌，利潤則隨之而增。戰爭期間內所造成的那些特殊的準備使賬上利潤減少，但在戰後這些準備的支出縮減，賬上的成本將減低了。

一個公司可以支出年常修理費機械整頓費甚至添置便生產量激增的設備

。這些費用一發生就同時增加成本減低利潤，但使以後幾年中的成本減少了。許多公司在戰時都採用此法所以到了和平時期它的地位也好了。這些技術會計的相關性的例子是與目前的問題絕對有關的。凡戰時有利可贏的公司在過份利得稅存在的期間中都儘量利用一個可能的方法——這些方法確是很多的——去增加成本減低利潤。但大部份的支出在和平到來，過份利得稅取銷的時候，却使成本減低，利潤增加。（一九四六年對於利潤特低者的補助金，可能促使在近年中繼續抬高成本。）

稽查成本賬目之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去估計採用特殊會計法以後的效果。我們可以不看那些統計而猜到成本就要狂跌了，而這與實際上付與勞動及材料的一切支出毫無關係。

利潤與充分生產

大衆對於利潤比對於工資爭執問題更爲注意。薪水階級以及一般民衆最喜歡的就是一個國家時時刻刻都儘量的工作儘量的生產必需品，並且永遠保持這個高的水準。在私營企業的經濟上，利潤大都是靠這樣去得來的。

戰時大量積聚下來的利潤一部份可以用工廠能力之增加來代表，一部份可以用工程方面及技術方面效能大增的改進來代表——其中許多是變化極速的——另一部份可以用巨億的流動資金做代表，這些資金是準備來應付復員的費用及充作擴充生產之用的。戰時的利潤與現時的支付力是有關係的，這不是爲了任何敏感的人想用公司從前的收入來增加工資。戰時利潤的意思就是牠們給予商業以物質上，管理上及金錢上的資源，使它在戰後比戰前有更大的收入，這是爲了他們自己但也爲了一般人。如果工人在這收入中也有他自己的份，那末應該在價格穩定的時候增加工資，或比價格增加得更快，或不與價格同降。

大量的戰時利潤的危險是在於使營業停滯或減少生產。戰時對於利潤的限制，在過份利得稅廢除以後，雖然生產水平低得使數百萬人失業，但業主仍可以獲得具體的滿意的收入。

基本的問題就在於適當的購買力能否分配出去吸收在工人全部受僱時、全力工作所生的產品。私營企業所特有的經濟制度將分配購買力之權完全置於營業當局者之手。

他們關於生產量的決定足以影響僱傭量及收入量。他們關於價格與工資

的決定足以決定生產後之收入的分配範圍。他們關於儲蓄金的決定——大部份直接或間接出自利潤——大致足以決定國家的生產究竟將穩固地膨脹抑或蒙受崩潰。單獨一個公司或許不能違反一般的趨勢，但整個營業上的決定就造成了這個趨勢。

大眾的危險

如果消費者在戰時的儲蓄是可以自由消耗的，則一般的企业在最近的將來或許可以儘量生產儘量銷購，並維持大量勞工之僱傭，即使物價繼續上漲，工資遠落在後面追蹤。但這也只是通貨膨脹及未來崩潰之先兆而已。膨脹的利潤會趨向投機之路，轉而加速證券、不動產、及商品市場的漲價。當遲延的需求已經滿足或竟超過以後，那個汽球就要爆炸了，而我們大部份是沒有降落傘可救的。如果在營業上以低工資及高物價來限制支出，那末也可能得到同樣的結果。

無論消費者現在是否消耗他的儲蓄，但總有一天會來的，祇要銷路足以引起全力生產並擴充投資，而普遍地增加購買力就急不容緩了。如果戰時儲蓄金不會消耗，那末這個日子來得更早。營業方面可以從全力生產中獲得充分的利潤而無害於經濟。但如果它不能適當地增加工資或抑低物價，它遲早會發現它所堆積的金錢比可以用到生產上去贏利的更多，因為現存各重要工業將超過它所能推銷的產量。那個時候，真是要崩潰了。

這一切事情在國家的利益上是最重要。這些事情會令大眾對於利潤發生正當的關切，即使過去及現在，利潤是純然由私人決定的。但政府却用許多方法去影響利潤。它允許在營業上不增加成本而擴充生產量。它設立了巨大的市場，固定了物價抑低了工資。它廢除了過份利得稅，現在還對於某一小水準下的利潤予以保證。留在營業手中的那些資源對於代表民意者，已不再是一種漠不相關的事情了。我們可以以人民的立場，將管理權賦與私人企業，但我們有權知道它是準備怎樣履行它的責任。通用汽車廠認為工資爭執與國家經濟政策無關，這種見解不是對於管理的一種負責的聲明，而是對於大眾的利益不負責任的聲明。

創辦宗旨 本社同人
時評 康君

撲朔迷離之東北問題 孟元
英內閣訪印團與印度問題 韓臯

論五四運動之劃時代的意義 陳人白
△關於民主問題的意見△ 郭紹虞

中國如何民主化 李季
現階段的民主主義 林漢達

民主與特權 胡山源
民主意見 索非

印度尼西亞的命運 竹雲龍
聯合國憲章與殖民地人民 康君譯

古史辨的解毒劑 李季
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 歐伯

論古代希臘羅馬的戲劇 盧寧著·冰夷譯
英國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 英C.考特威爾著·朱維基譯

論社會思想 童止齋
中西文化不同的基礎 唐虞世

戰後世界婦女的動態及其前途 碧雲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 李毓鏞

悲憤的歡笑(小說) 謝少翁
佛拉提爾論中國的民主主義 一封表示憤懣不平的歷史信件
母系氏族怎樣移轉為父系氏族 伊里奇論托爾斯泰思想的矛盾
真與偽 社會的祕密 論實驗科學之生父

本誌創刊號目錄

關於老子孔子思想問題的論爭

自本誌上期發表了老、孔思想問題的兩篇論爭文章李季先生的『行不得也哥哥』，歐伯先生的『同頭是岸』之後，即承蔡尚思先生親自蒞臨敝社暢談，表示願意參加論戰；隨後又接得××××兩位先生來信，亦表示準備參加此一論戰之同樣態度。由此足見老、孔思想問題，極為社會學者所重視。未及旬日，蔡先生果如約惠下『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計萬餘言之大作。差不多同時，李季先生則文下『再論老子與孔子——答歐伯先生』之長篇論著。本誌會將李先生原文送與歐伯先生，請為表示意見。惟近得歐伯先生回信，因限於時間過份促狹，只好留待下期作答。此外，正臨截稿時，却收到本誌讀者陳振維先生之『孔子不會草貴族的命』。茲謹將上列佳作暨歐伯先生寄來短簡，一同揭載於後，尚希讀者注意。（編者）

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

蔡尚思

一 緒言

在今年一月初，《求真雜誌》就來函特約我『經常賜稿』，並徵求『關於中國如何民主化的意見』，我因為教了四個大學，忙得要死，同時來拉稿的報章雜誌又多至二十左右，所以直到求真雜誌第二期出版，我還沒有投稿，這真有點辜負求真雜誌的好意。最近讀了求真雜誌第二期，其中有李季、歐伯兩先生『關於老子孔子思想問題的論爭』，李先生因看見歐伯先生的『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一文而作『行不得也哥哥』一文去駁他；而歐伯先生又因看見李先生的『行不得也哥哥』一文，作『回頭是岸』一文來反駁。我對於雙方的筆戰，覺得很有趣，自己未便『袖手旁觀』，同時又因為求真雜誌的再來信要稿子，所以就來作這篇文章去參加筆戰。

我的看法，和歐伯先生有些接近；和李先生的看法幾乎相反。我的批評李先生對於老莊的看法，並非始於今日。我在十多年前，已草成一篇『用物觀、考據、證明李季觀察道家階級和主張的錯誤』，文長萬多字。到了民國二十八年底，《學術社》要出《學術》雜誌，主編者親來要我寫稿，我便把那篇草稿，略為修正，改名『論道家的社會性』發表於《學術第一輯》，但因為在非常時期中，該雜誌不久就停辦了，已經印出的《學術》，看到的人恐怕不多。我又會把那篇文的『目錄』，附入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一書中（民國二十八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現在既未便複述，只好請讀者把那篇評李先生的文章拿來和本文同時參考。

據我看來，在新派學人中，對於老莊思想的看法，最和李先生相同者，莫如呂振羽先生。李先生的《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一書出版於民國二十年底；呂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出版於二十六年中。二人見解既然非

常接近，所以我的爲許李先生而作的『論道家的社會性』一文，也可移來評呂先生。現在本文，對於李呂兩先生，更多同時加以批評。

我的作本文，雖起因於李先生的『行不得也哥哥』一文，但對於『行不得也哥哥』文中有一部份比較小的問題，或已經歐伯先生批評過的，多不必再說。因爲我已作『孔學總批判』，『民主』第廿二期合刊會登出了一小部份。我最近又有『孔學再批判』之作，不久也可以發表。

二 關於老莊的思想方面

這一方面，姑且歸納爲四點，分述於後：

(一) 只見片面——只根據少數而不注重多數
李先生認老子『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這是愚民政策最露骨的表現，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說話的』(行不得也哥哥)。而呂振羽先生也和李先生同樣的說：老子『爲要使農民能長安於被統治被剝削的地位，在這一點上，他和儒家的意見完全是一致的，在根本原則上同是愚民政策』(中國政治思想史)。其實這是非常片面的，老子是愚人政策，而不是愚民政策，愚人政策是無人不愚的：

第一，是『愚政府』；如老子說：『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這是人民對於政府，既不重它，也不害它。又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太上：下知有之』一句，永樂大典本及吳澄本都作『不知有之』，日本本作『下不知有之』。這是說：最好是有政府等於無政府，既不要人民譽它，也不要人民怕它；不然的話，便不是最好的政府了。這分明是愚政府的。試問一般實行愚民政策的封建政府，人民有這樣把它當作菩薩，而不怕它的嗎？老子又說：『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這是明自主張由『愚上』到『愚下』的。試問一般實行愚民政策的封建政府，有這樣的少私寡欲，以身作則的嗎？老子又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試問一般實行愚民政策的封建政府，有這樣的尊重民意，而不分別善惡的嗎？老子又說：『天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試問一般實行愚民政策的封建政府，有這樣的不忌諱，無法令的嗎？其餘參看後面四節。

第二，才是『愚下民』：如說：『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第三，是『愚聖人』：儒、道兩家在表面上，同說『聖人』；但其內容，却相反：儒家分人爲庸人、士、君子、大賢、聖人五等(詳見荀子哀公篇，而大戴禮亦可參看)。愈有智識，愈多才能，愈明禮義愈高尚，如荀子說：『始於爲士，終於爲聖人』。『聖人者，盡倫者也』。孟子也說：『聖人，人之標準也』。道家反而以爲：愈沒有知識，愈沒有才能，愈沒有禮義，愈高尚，老子根本不要文字語言，如說：『復結繩而用之』，『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行不言之教』。根本不要知識經驗，如說：『絕聖棄智』，『絕學無憂』，『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知慧出有大僞』。『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不出戶，知天下，不闢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善行無輪迹，……善數不用籌策，善閉無鑰鎖而不可開，善結無繩墨而不可解』。根本不要仁義禮樂，如說『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大道廢，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五音令人耳聾』。愚人在道家心目中，是人類最高的標準，最好的模範，老子自己也不例外的說：『我愚人之心也哉！……我獨昏昏，我獨閑閑，……我獨頑似鄙』。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他因爲小孩比較沒有知識，比較昏愚，所以教人去學『嬰兒』『赤子』。如用現在的教育來倣比方，便是：叫大學教授去拜大學生做老師，叫大學生去拜中學生做老師，叫中學生去拜小學生做老師，叫小學生去拜幼稚生做老師。考得全對的，給他不及格；交白卷的，給他一百分。不但如此，甚至教人『法地』、『若水』、『若谷』、『若冰』、『若海』。……到了憤到，便教人若『無知之物』的『土塊』；莊子便教人若『祥金』、若『山木』……(請參看拙作『評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這是道家一貫的平等的愚人主義，和那儒

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根本；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請再參看吳虞禮論）。由此看來，封建社會非『禮』便無法維持。儒家最留戀封建社會，所以最注重『禮』。老子對於禮，却最反對，如說：『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老子的最反對禮，就是最反對封建社會的明證。李先生不先看出封建社會的根本精神，而使以封建社會為老莊等的最高理想，這是多麼好笑的一件事啊！

呂振羽先生說：『老聃的理想政治，無寧是封建社會初期的一副構想圖』（中國政治思想史）。這是完全附和李季先生『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的錯謬觀點的！

呂先生又說：『其次莊周又看到形成當時社會問題的主要內容，是「小人」的抬頭和其對「君子」的反攻。因而在他的沒落貴族的心情中，以為假若社會內沒有「君子」和「小人」這兩者的分別的存在，又何致發生當時那種敵對集團之對抗的惡局勢？他們那一羣沒落者更何致落得窮無所歸的慘局？所以他說「夫至德之世，……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同乎無欲。……」他從這一觀點出發，一面便不免憧憬於原始社會：「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故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前引）試問呂先生：如果「社會內沒有君子和小人這兩者的分別的存在」，還會成爲封建社會嗎？如果老莊等是封建領主，還會不分別君子小人嗎？老莊既然代表封建領主，主張封建社會，爲什麼又要『憧憬於原始社會』？『憧憬於原始社會』就是代表封建領主，主張封建社會的特點嗎？呂先生的解釋，未免太勉強了！又莊子所謂『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正是老子所說『雖有舟車，無所用之』，『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的正式注腳。那會如李季先生所曲解的『不用舟車，是防民遠徙』的封建社會？

據我看來，還是嵇文甫先生『先秦諸子政治社會思想述要』（出版於民

二十一年）所觀察的比較正確，現在節錄其說，以供讀者參考：

老子的理想社會，是自然的，不是文明的；是自由的，不是強權的；是自給的，不是交易的；是靜止的，不是活躍的；是小規模的，不是大規模的。他不像儒法諸家主張大一統，他所謂『小國寡民』，實在還算不得國，算不得民，而正是一種原始的村落社會。他只想有許多小村落，在大地上自然的散布着，並不希望成爲一個有組織的大國家。在這樣的社會中，人人得到充分的自由，無所謂政府

，即有亦等於虛設。……他最痛恨強權，他說：『強梁者不得其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他極力反對戰爭，重稅，和煩苛的法令。這都是當權者所造的罪惡，是一般農民所最感痛苦的。他似乎覺得政府是萬惡的淵藪，他要脫除這樣的強權統治，而代以自由自在的村落社會。……文化却不高，他們生活很簡單，既用不着機械，亦用不着文字。他們不識不知，全聽自然的支配。……交通貿易，殊不發達，他們『老死不相往來』，『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他們自己生產，自己消費，完全是一種自給經濟。……人們都固着在一定的地方，『重死而不遠徙。』生產方式，風俗習慣，都不大起變動。『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居。』各自心滿意足，因襲下去，一切都是靜沉沉的。……

讀者看了嵇先生這一段文，更可知道李、呂兩先生硬認老子所謂『小國寡民』的理想是封建社會，沒有絲毫的合乎事實了！

三 關於老子的時代方面

李先生在『行不得也哥哥』文中說：老子『雖有猶龍之譽，却沒有什麼高深不可測度的地方』。『又做柱下史的老子，絕對沒有意思要人類返到自由平等的原始社會去』。這是從史記的傳說，而明認作老子一書者，是所謂『孔子問禮於老子』的老子，老子是春秋時代的人。但他在從前的『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裏，却最贊成梁啟超先生老子一書出於戰國末年之說，而反對胡適先生的認老子爲中國哲學的始祖，如說：

我以為這些理由都是很充足的，儘可依照梁氏的話，確定老子一書爲戰國末年的作品。因爲除這大批的證據外，我們還可補充幾點：（一）這寥寥五千言的道德經，兩言『不貴難得之貨』，又說：『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身與貨孰多』，所謂貨就是商品，這種再鄙視商品的話，應是針對着商業發達的戰國說的。

（二）所有『民多利器，……人多伎巧，……法令滋彰』等語，應是技術進步，法令繁多的戰國時代的寫照。……由此看來，胡適博士所說的古代哲學的第一胎

，『中國哲學的始祖』，便沒有一點真實性了。

李先生先說老子的書出於戰國末年，後說老子是春秋時人；正和梁先生忽然說墨子是宋人，忽然說墨子是魯人，同樣的無定見。李先生對於老子的時代，明明是前後矛盾的，至少也是已經有所修正的了；可是這在李先生却還不承認的說：現在『覺得我在當時的主張，沒有修正的必要』。（行不得也哥哥）。

意見和李先生對立的歐伯先生，也很信古的說：『梁氏的懷疑理由，經過許多人的批駁（如張煦葉青等）之後，很少能站得住。……孔子會問學於老聃，不僅為史記所大書特書，為老派的莊子所數數稱道，（見莊子天道會子問篇），這證明孔子之親自見過老子，是一無可否認的事實。……』（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其實，歐伯先生的議論，早在梁先生擊破之列。梁先生說：『……三、就令承認孔子會向老聃這個人問過禮，然照禮記會子問篇看，此人是一個拘謹守禮的人，和五千言的精神相反。四、史記關於老子的紀述，什有八九是從莊子中天道、天運，外物三篇雜湊而成，那些故事有些說是屬於老聃，有些屬於老萊子，連主名都沒有確定。假使歐伯先生深信孔子確會問禮於老子，老子是禮教的大師，則像李先生所說老子代表貴族，主張封建社會，也許比較可以成立，歐伯先生似可不必再去反駁了！』

呂先生也硬要認老子為春秋時人，而說：『老子五千言中所說明的時代社會——無論在經濟組織上或意識形態上——以及其所表現的階級性，一方面恰合於春秋末期之封建兼併的時代背景，一方面恰合於春秋末期之沒落貴族的身分言論。』這些空話，怎能攻破梁李諸先生所說明的老子五千言恰合於戰國末年的時代社會？

我以為：老子一書的時代，像梁先生的主張，很可成立，現在再略引古人之說，以供讀者參考：

第一、莊子多寓言而非信史；他當假託孔顏，如宋羅璧說：『莊子一書，多復空寓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託言世之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後之衛道者，皆與孔子分說，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照破莊子之妄爾。』明方鳳說：『莊子凡立一論，必以孔顏問答為名，欲天下後世信其說而行之也。其曰：回益矣！忘仁義矣！忘禮樂矣！坐忘矣！嗚呼！顏子三月不違仁，斯須不去禮樂，使仁義禮樂而忘之，何以為顏子？』

黃帝、堯、舜、孔、顏之類，言足為世重者，又十有其七。』（請再參看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頁一六三至一六七）孔子問學於老子之說出於西漢的禮記史記；而西漢的禮記史記又多根據寓言的莊子。莊子多所假託而不足信，早已被宋明清各代學者看出；想不到現在一般新學人如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馮友蘭（詳見拙作評馮著中國哲學史上冊）、呂振羽（中國政治思

想史）諸先生還一點見及也沒有！現在請在此處附舉一例以見莊子的混各家為一談，莊子天道篇說：孔子解釋『仁義』為『兼愛無私』，兼愛的名辭，創始於墨子，如果對於莊子的話，要信以為真，則孔子豈不在墨子之後？是可信的；春秋時代確有一個老子；但這個禮教大師，也和著五千言最反對禮教的戰國老子，風馬牛不相及。這在古人已有見及：如宋陳師道說：『世謂孔老同時，非也。孟子闡楊墨而不及老，荀子非墨老，……莊子先六經而墨宋慎次之；關老又次之，莊惠終焉。其關楊之後，孟荀之間乎？』（後山集、理究）張載說：『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蕩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為兩老子；猶左丘明，別有作傳者也。』（理窟、義理）宋無名氏本筆雜鈔說：『或謂有二老子，絕滅禮樂之老子，與孔子問禮之老子不同。兼太史公傳多疑詞，……意者有二老子，而太史公不能斷耶？』

呂振羽先生妄認定論語所說的老彭為老子，而後計較史記所說太史儋『生在孔丘六七十年後，與論語所說老彭不符』。這真像賣空買空，等於講鬼！又因莊子說老聃為微藏史，司馬遷『稱老聃為守藏史』，而斷定老聃『無疑是屬於統治層中之一分子。』也是把一部莊子唯珍至寶的當作信史來讀的。呂先生甚至還津津有味的說：『莊子和孝經所列孔子入周見老子的故事』，而怪一般『疑古家』的不同意。這是連我也不會同意的：因為世界上除了呂先生自己創作的孝經以外，是絕對找不到一本『列孔子入周見老子的故事』的孝經來的！

四 關於老莊的階級方面

關於老莊那般道家的階級性，在新派中主張老莊思想帶着革命性者，有郭沫若先生等；主張莊周是『一個革命的代表工商業者』，有葉青先生；主張老子代表小農者，有嵇文甫先生；主張老子是貧農莊子是破產貴族者，有李麥麥先生；主張老莊是最反動的舊貴族、封建主者，有李季（謂老莊是舊貴族舊統治階級即封建地主階級）、呂振羽（謂老莊是沒落的封建領主階級與貴族）諸先生。我以為：李麥麥把老莊分為兩個對立階級，最為胡塗；其次如葉先生以莊子為工商業者，李呂兩先生認老莊為最反動的上階層，也都

很不合事理。比較正確的是：嵇先生老子代表小農之說；但老子如果真可代表小農，何以又會主張『終身不勤』，大談玄學？就這一方面來看，可知他們是有閒者。他們主張共有，虛政府，打破一切，絕對自由，就這一方面來看，又像個無產者。大概道家的階層，是在儒（破產領主）、法（新興地主）上階層之下，在農家（農民）下階層之上，而和墨家比較相近，是中層而偏下層，尚不至於小農的。這是我的看法，請再參看拙作『論道家的社會性』。

呂先生說：『在葉青君他們看來，認為莊周正是一個革命的代表工商業的思想家，其實莊周根本在否定「中世的」「工商業」者的存在為必要。德充符篇說：「聖人不謀，惡用智？不斬，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胠篋篇說：「摘玉毀珠，小盜不起。……搘斗折衡，而民不爭。……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攏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人類史上恐怕不會有這樣「工商業者」的代言人吧！』呂先生的駁斥葉先生，是很正確的；最可惜的是：他有見於人，無見於己；只知責人，不知責己的說：『又有人說：莊周是無政府派的虛無主義者，這完全是只從形式上着眼的「半實驗主義」的魔術式的說教』。我也要做他評葉先生的話而對呂先生說：『人類史上恐怕不會有像德充符、胠篋諸篇所說的那樣封建社會與領主階級的代言人吧！』按莊子至樂篇，託爲飼餵之言：『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縱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這和魏晉間老莊派

的『僞列子』，託爲黃帝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其國無帥長，自然而然』；託爲禹迷而失塗，入終北國，其國『不君不臣』，正是一樣。認莊周爲『無政府派的虛無主義者』，有什麼大不可之處？這怎樣會成爲半實驗主義的說教？呂先生最後又說：『道學到後漢末以至魏晉，一面則分化爲以葛洪爲代表的沒落貴族的哲學，一面則分化爲以鮑敬言爲代表的農民派的政治哲學，後此且演化爲農民派的宗教教義，所以在稱謂上雖皆被名「道學」，而其實則完全各異了！』不知在事實上，鮑敬言思想全本老莊，而無所謂『分化』，例如：第一、鮑敬言『好老莊之書』；第二、莊、鮑同主太古之世，人禽不分，對穿牛之鼻；第三、莊、鮑同主無君，第四、莊、鮑同反對衡量，第五反、老、莊、鮑同反對奢侈，第六、同反對法令，第七、同反對甲兵，第八、同反對交通，第九、同反對重稅，第十、同反對奇物，第十一、同反對禮，第十二、同反對忠孝仁義，第十三、同反對名，第十四、同主張不尚賢，……他們相同之處，真是不勝枚舉。呂先生竟認老莊和鮑敬言的思想，『完全各異』，令人想見呂先生讀書的不小心。看了上面的歸納比較，如果鮑敬言真可代表農民派，則思想和他相同的老莊，當然也是農民派了；反之：如果老莊真可代表舊貴族與封建領主，則思想和他相同的鮑敬言，當然也是舊貴族與封建領主了。呂先生把老莊和鮑敬言分爲兩個對立階級，正和葉青先生把老子和莊子分爲兩個對立階級，同樣的『胡七八道！』

六月十七日

再論老子與孔子——答歐伯先生

李季

一、針鋒不相對的宣傳式論戰法

讀過歐伯先生對於我批評他的『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的反駁後，本不擬作答。因爲他在六千字的短文中，嵌入『不大舒服』，『一飽眼福』，『滿紙虛構曲解，和附和的烟霧』，『割裂』，『誤解』，『成見』，『誣讟』，『玩弄「斷章取義」的把戲』，『太露骨』，『太不高明』，『荒謬主張』，『諷刺』，『極盡了「深文周納」之能事』，『惋惜』，『機械』，『極盡不倫不類之能事』，『哈哈』，『特殊的玄學眼鏡』，

『貿貿然』，『新奇的思想』，『偉大的發明』，『精於詭辯』，『上了他的當』，『滑稽』，『歪曲』，『不見樹林』等大批字眼，充分表見他悻悻然的心理，與求真所標『嚴格的科學態度』，有些兩樣。還有一層，他是根據自己所假設的話來駁我，實與我無關，我沒有回答的必要。例如我說『貴族出身而又做慣柱下史的老子絕對沒有意思要人類返到自由平等的原始社會去』，這明明白白是指老子一個人講的，我並沒有說：凡是貴族出身而又做過官吏的人，一個也不會主張人類達到自由平等的地位。他如否認我對老子的說法，應就老子本人舉出強有力的證據來加以反駁。計不出此，竟

於嘲笑我『更機械的』之後，輕輕變更論點，故意把我所指特殊的事件當作一般的事情，於是反過來問我：『何以貴族出身而又做過沙皇軍官的托爾斯泰也企圖「要人類回到自由平等的原始社會去」呢？』這種偷天換日，自欺欺人的宣傳手段是不應當用在嚴格學術討論中的。他對於我的一篇短文過於張脈賾興，以致連文意還沒有看清楚，就大放厥辭。他說我『在數出老子「遺文」中載有多少天子，侯王，聖人等等之後，毫不加以解釋，即斷定這是「他從四方八面去教育統治者！」難道一提到統治的頭銜，就是為的「教育統治者」嗎？』其實我並沒有數出老子「遺文」中載有多少天子，侯王，我只說老子『有三十一次說到聖人，二次說到君子。聖人和君子是什麼？就是精通治術的人，即帝王之師，甚至於帝王本身。他從四方八面去教育統治者……』（求真二期四二頁）精通治術的人等語就是我的解釋。他竟熟視無覩，於嘲笑我『却連最簡單的解釋，最普通的形式邏輯也不顧及了』之後，硬把『提到統治的頭銜就是為的「教育統治者」』做我的意見！尤其可惜的是，我說老子代表封建地主階級，他引用我的原文，竟輕輕去掉地主兩個字（求真一期四三頁），使之不成爲一種術語。這不是他偶然的粗心，而是他一貫的使用法（求真一期四四頁，二期四四頁）他並且說出『封建貴族階級』（求真一期四四，二期四五和四六頁）的話來！貴族是閥閱或等級而非階級，『封建階級』不成名詞，我在十五年前已說過（『我的生平』五九二和六三四頁），現在也成爲常識了，他却一無所知，仍蹈了胡適之先生的覆轍。我認老子的學說對於辯證法只有一點影子，他大肆譏評，說『光從這一點看來，李先生對於老子思想的認識程度，也就够我們玩味了！』（求真二期四五頁）我現在依照他的語法，破例回敬一句：『光從這一點看來，歐伯先生對於社會科學常識的認識程度，也就够我們玩味了！』

歐伯先生反駁我的文字雖比我的原文長一倍以上，但大都是一種避實就虛，枝節橫生的文字，而又輔之以憤怒的情緒，故不能針鋒相對。雙方如果都作這一類的文章，那可以無窮無盡的爭論下去，而得不到結果。所以我不願作答。不過後來一想，我如果不出馬一次，連這種意思也很少人知道。因此，我無須朋友的慇懃，願平心靜氣地提出全般問題來加以討論。希望歐伯先生以後也採取同一態度，減少宣傳式的說法，否則我自甘緘默，讓高明的讀者去判斷好了。

辯證法的所以可貴，因爲牠是自然界一種活潑激的法則，因牠含有正、反、合、三個局面，代表發展。即以穀爲例：最初是正，把牠種在泥中，發芽生根，將原來的種子否定了，這是反。後來成熟爲穀，便變成合。穀在正的時候是穀，在合的時候仍是穀，前後不是一樣麼？其實在正的時候穀少，在合的時候穀多，這就是更高的發展了。在思想中，辯證法也要有這樣的發展，才可寶貴，否則不成其爲辯證法。我們試看老子的思想是怎樣一回事。歐伯先生說：『在老子的全部著作中充滿了有——無，善——惡，福——禍，盈——虛，剛——柔，曲——直等等對立的公式』（求真一期四〇頁）。但這種對立只是單純的對立，別無所有；如果勉強稱爲正反的話，便沒有合，即沒有發展。

關於這一點，歐伯先生也是親自承認的，所以他說：

『老子的辯證思想之最大缺點，即在於他一方面指出各種事物或現象之對立，但另方面他又異常厭惡這種對立，企圖用消極的方法去取消或調和這種對立』。（同期同頁）

『老子的社會思想……從社會的歷史的觀點看來，却充滿了矛盾，僅僅是各種矛盾的混合體而已。』（同期四二頁）

此外，歐伯先生並宣佈老子爲消極的辯證法家（原文爲『辯證法家（消極的）』求真二期四六頁）。像這樣的辯證法或辯證法家在學術思想上是沒有重量的。我稱之爲『也許還有一點影子』，可算恰如其分。不意歐伯先生竟氣勢洶洶地說：『而辯證思想或矛盾邏輯則又有如「經緯」，差不多交織在全部思想的各個部門之中。假如不是帶的特殊的玄學眼鏡，一定不會看見的』，（同期四五頁）因而笑我對老子思想的認識程度，也就够他們玩味了！其實這種沒有成熟的玩意兒質既低下，單是量多有什麼用處？我希望歐伯先生於『玩味』我對老子思想的認識程度之餘，能够回憶自己對老子辯證思想的評價！

三、老子的理想社會是什麼？

歐伯先生說：

『只要稍微認真研究過老子一書的人，就應當知道：老子的全部思想從他的

哲學到他的社會思想或人生觀，都是建立在根本反對當時的全部文化（即封建制度的文化），而主張回返於『自然』（所謂歸於朴）和『無爲』的狀態之上。』

（求真二期四三頁）

這段話的最後一句是對的，但前面一句說老子根本反對封建制度的文化，便完全不對。歐伯先生舉不出絲毫確切的證據來，只叫人『應當知道』！他把自然和無爲的狀態與封建制度的全部文化對立起來，以為老子要回到這種狀態之上，就是要達到他的『理想社會』的小國寡民，『這是原始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的理想化』。（求真一期四一頁）但自我們看來，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待我詳細分條說明於下。

第一，我從前舉出老子滿口小國鄰國為他要維持階級制的國家組織的證據，歐伯先生加以否定，理由是：

『那只是因為他在那時還找不出別的適當的名詞或術語來表達他的理想社會（因為那時還沒有發明『烏托邦』，『新村』或什麼主義的社會呢），所以權且借用『國』來形容它。』（二期四五頁）

這種理由未免太薄弱了。老子是古代中國第一個會造名詞或術語的人，如『無名天地之始』，『玄之又玄』，『玄牝之門』，『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無名之朴』，『不爭之德』等等，真是精思玄妙，應有盡有。他既有能力造出這許多新奇的術語來表達他的思想，一講到理想社會，難道忽然蠢蠢如豕，只好權且借用『國』字嗎？何況當時雖『還沒有發明『烏托邦』』，老子已經說過『邦之利器』，『修之邦』，『以邦觀邦』（原文見韓非子解老論老兩篇，又老子本義三一和四七章，普通本的老子因避漢諱，此三『邦』字均被改為『國』字。）他如果真要樹立什麼『理想化的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求真一期四五頁），便應當用『小邦寡民』，不應當用『小國寡民』。為什麼？

論語雖邦國不分，周禮天官太宰雖邦國並用（注：『大曰邦，小曰國』，但也有稱小曰邦的，如詩周頌桓『綏萬邦』，疏：『經言萬國』），西漢因避高祖劉邦的諱，雖改邦為國，東漢的說文解字雖說『邦國也』，『國邦也』，但邦字的初意與國不同。邦在甲骨文中作𡇗，從丰從田，象草盛而根下達於田；金文作𡇗，作𡇗，從丰從邑，象人所居場所。舊書的周禮地官小司徒『乃分地邦而辨其守』，杜子春改『邦』為『域』，段玉裁力斥其非，說『地邦謂土界』（說文解字邦段注），可稱精當。老子的書中

國字在甲骨文中作或和國，象以戈守□（□即指區域的範圍），可見一有國即有兵。在原始社會中雖有甲兵，但是因對外作戰，臨時召集的，不像國家成立後須有常設的兵備，作為對內對外之用。即就老子的『小國寡民』一段而論，在他的寥寥數語中仍表見有常設的甲兵，這是統治階級恃以統治的工具。不過他以為統治得法，可以達到『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即所謂備而不用。

說到這裏，歐伯先生一定忍耐不住，要反問我怎樣知道老子的心目中對於邦與國能作出如上所述的分別，而不是視邦國為同義？我的回答是：統觀老子一書，提及『邦』字三次，『國』字二十二次，『國家』二次。凡他講『邦』的兩章，我們從上下文看不出統治關係來，這所謂『邦』僅指一定範圍的疆地。反之，凡他講『國』或『國家』的各章，我們從上下文可以看出統治關係來，如『愛民治國』，『國家昏亂有忠臣』之類，原書俱在，可以覆接。這可以證明老子對於邦國兩個字實懂得牠們本來的意義，不是隨便應用的。這又可以證明我『抓住了老子的一個『國』字』是一針見血，而歐伯先生說他『權且借用』為信口開河。

第二，老子要維持階級制的國家組織，除上面兩種證據（國與甲兵）外，還多得很。我上次已提及『食稅』一點，不知歐伯先生何不加以反駁，而讓牠屹立不動？我們現在再聽老子說：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老子本義五四章）

老子主張『立天子，置三公』，是要推行他的『道』，並統治不善之人。天子三公是統治階級的代表。即依照歐伯先生的意思，『他的根本目的是在於以這種抽象的，擬想的，理想化的天子，侯王，及聖人等去對抗當時實際上嗜戰好殺，貪婪腐化及剝削和壓迫人民的一切統治者』（求真二期四四頁），然無論如何好，統治者的性質是不能變更的。這又可以證明老子始終要維持階級制的國家組織。（歐伯先生以為替老子解脫，便預先開好一張後門，說『老子理想中的統治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是幻想的』。無論『不可能存在』也好，『幻想』也好，他總算是親口供出老子要有一個統治階級和一個

第三，歐伯先生指老子理想中的統治人物爲『這正是農民的樸素觀點』（同期同頁）。這種矯揉造作的說法，完全出乎情理之外。自古至今，自中至外，凡統治階級的代言人爲本階級謀利益的勾當，常裝作爲全民謀利益，這可說是常例；但被壓迫階級的代言人爲本階級謀利益的企圖，謹莫如深地隱藏自己的階級觀點，處處用統治者的口吻宣佈出來，這是從來沒有的，至少我從來沒有看見或聽見過。歐伯先生如笑我少見多怪，就請舉出老子以外的例子來，給我見識見識。在古代中國統治階級的代言人中，老子的階級色彩是最濃厚的，歐伯先生如果認上面所舉的例子還不够顯明的話，可讓老子再來開一次『話匣子』。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老子本義五十章）

自歐伯先生看來，這段話就是老子反對封建制度的全部文化有力的證據，其實不然。凡研究過中外封建制度的人都知道，這種制度自發生至崩潰，經過兩個階段：第一爲自然經濟時代，第二爲交換經濟時代。凡有階級有國家組織的社會總是刻削的，但刻削的程度却大有差別。在自然經濟時代，農民用農產物納賦，一切手工業多限於自給自足，商業雖不能說是沒有，但很不發達。統治階級的生活比較簡樸，因此牠的剝削也比較輕微。因爲牠對於農產物如取得太多，實在沒有多大用處，甚至於反使自己受累。但一到交換經濟時代，情形便大不相同。我們自己雖缺乏這一類有系統的材料，然歐洲有的是，可以供我們的參照。

『當商業貿易與發展的貨幣流通還沒有開始時，地主們對於農民勞動所取的，便沒有超過他們和他們的層級所能消耗的數量以上的必要。因爲他們多取了，也終成廢物，沒有用處。所以在中古時代最初幾百年中，剝削形態的溫和，恰與奴隸制的初期相等。』

『然這種情形沒有延長到中古時代的末年。當商品交易與貨幣經濟一經出現，農民對於各種自然產物的供給，日見增加，不獨是這樣，一切租稅且變成用貨幣繳納了。在另一方面，地主對農民從前的恩惠也一齊消滅了。他們只顧一己的私慾，忘記了他們的義務；他們只是被剝削的羣衆的剝削者，他們將羣衆的擔負無限制的增加了，因爲他們對於金錢的慾望是沒有底止的；……一切種類的貨幣租稅都施行起來了。……墨爾林在他的葉那與提爾細提的小冊子中說：

『一個人如果要將一切流行過的封建的壓迫計算出來，他必定充滿整本的書。當法國的貴族於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晚上在革命的影響中拋棄牠的特權時，那特權的數目不下一百五十種。』（拙譯『社會經濟發展史』一九二至一九三頁，亞東出版。）

綜合以上三項來看，誰也容易明白老子『主張回返於自然和無爲的狀態之上』，絕對不是歐伯先生所了解的什麼『原始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而是一個有階級制有國家組織的社會。這是什麼社會？就是初期的封建社會。怎樣見得呢？

我在『行不得也哥哥』一文中於徵引老子的小國寡民一段話後，曾說『這是理想的典型的封建制度，最合於歐洲封建社會所謂「天高皇帝遠」的情狀』。歐伯先生對此大肆譏評。其實他並沒有了解我的意思。我所指的典型的封建制度是初期的封建制度，再加上一個『理想的』形容詞是指老子不用什伯之器，舟輿，甲兵，文字等等，說牠最合於歐洲的情狀，也正是歐洲初期的封建制度。我且隨手頭方便，引用波卡諾夫等西歐的封建主義一章起首一段話來加以印證。

『在社會的經濟的及政治的生活領域中，新的制度——封建制度的基本諸要素，已經於羅馬帝國時代，後來被在日耳曼諸種族所佔領的州郡中形成了。這些要素如下：自然經濟諸關係的優勢，農業的支配，有領地的經濟組織與從屬住民的大土地所有，各領地的獨立，政治權力的分散。』（『唯物史觀世界史』二冊一頁，神州社出版）

這種情狀就是我引西諺『天高皇帝遠』的意思所在。歐伯先生對於我那段議論既是『莫明其妙』，竟不要求我的解釋，先滔滔不竭地說：

『歐洲封建社會所謂「天高皇帝遠」的情形，我們是多少知道一點的，那就是嚴格的等級制，專橫的教會制，封建諸侯不斷的鬥爭，無情的壓榨農奴或農民——這與我們春秋時代的封建社會是大同小異的。』（求真二期四四至四五頁）他這裏所指的是封建制度已由自然經濟過渡到交換經濟時代的情形，即封建末期的情形，故自行承認和『春秋時代的封建社會是大同小異的。』既是這樣，和我所指的初期情形，自不相同。所以他又在反駁他自己的話，與我無

關。

這是附帶談及的一樁事，我們再回到主要點上來。老子要『回返於自然和無爲的狀態之上』，前面已經證明不是什麼『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他又未嘗標出其牠什麼社會，則其爲自然經濟時代的封建社會，即初期的封建社會（周初小國寡民的社會見第四項），寧復有絲毫疑義？由此可以知道老子所反對的不是封建初期的文化，而是封建崩潰期中士閥和自由地主階級的代言人——儒家和法家——所發展的文化，歐伯先生說他根本反對封建制度的全部文化，是完全不正確的。

四、老子代表封建貴族和封建地主階級

老子的理想社會既是初期的封建社會，則他爲封建貴族和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自不待言。關於這一點，我們應當再花點工夫來考察一下。

中國的封建制度始於周初。呂覽觀世『……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這是老子小國寡民的來源。）至春秋之際僅剩百六十餘國，至戰國僅餘七強和二三小諸侯。當時封建制度已經破敗不堪，奄奄一息了。禮記和史記等書雖明言老子與孔子同時，但我在『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中會參照梁任公的意見，斷定爲戰國末年人。近二十年來馮友蘭，顧頡剛，錢穆諸先生對於老子的論證均有同感。適之先生在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中又加以反駁。雖間有折服他人之處，然終不能使他的老孔同時的主張（歐伯先生也贊成此說）站得住腳。這裏自然不能討論，然僅舉一例，即足破其說。適之先生力言『論語常用「天下」字樣，……老子書中……爲什麼獨不可說「萬乘之主」呢？』（胡適論學近著一二七頁）其實他應當知道：天下是虛名，可大可小，《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盡心上），試問這天下有多大？至於千乘萬乘是實數，不能隨便瞎說。春秋時國土小，故論語只能說『千乘之國』，戰國時國土大，故老子才說『萬乘之主』。因此，我現在相信老子是戰國中年的人物，即史記所稱的『周太史儋』，後於孔子『百二十九年』（老莊申韓列傳），比孟子約早二十多年。他所代表的正是一個垂死的封建貴族和封建地主階級。他眼見儒家以至

法家所代表的士閥和自由地主階級完全抬頭，無力與之競爭，所以主張不爭，無爲，排斥儒家的仁義道德，法家的『法令滋章』；他眼見工商業的發展，毀壞封建制度的根基，所以痛惡工商業，要想回到封建初期自給自足的形態上去，使民不用什伯之器，並老死不相往來。我從前即用這種見解去批評『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所描寫的老子，至今認爲正確。我們持此尺度去測量老子，一切問題，無不迎刃而解。

在另一方面，歐伯先生自稱『完全根據老子原書的全部內容，頗爲詳細地論證了老子的根本思想是「同情於農民的。」』（求真二期四三頁）他的唯一的證據是從老子對統治階級的『小農大幫忙』中反襯出來的。硬說這是反映農民的意識。不錯，他在反駁我的一文中，利用『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的話，十分吃力地證明『這正是天真的好心腸的表同情於人民的觀點。』（同期四四頁）即使真是如此，這種證據也未免有些可憐。何況我們在下面就會指出，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古今中外的歷史昭示我們：統治階級的代言人常打起全民的招牌，替本階級謀利益，但被壓迫階級的代言人絕對不會打起統治階級的招牌來替本階級謀利益的。關於第一點，可以孔子爲例，留待第六項去講；關於第二點，可以許行和墨翟爲例，試略述如下。

許行要代表農民無產者的利益，便公然指摘滕國君主道：

『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者也。賢者與民並肩而食，養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滕文公上）

墨翟要代表小農和平藝工人的利益，也說：

『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則民無饑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墨子尚賢中）

『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同書尚賢上）

許行和墨翟因爲要擁護被壓迫階級的利益，便不能不表明自己階級的立場，有所主張。歐伯先生硬說老子是『表同情於民衆』，或『表同情於人民』，何以他不從『民衆』或『人民』的立場發言呢？這不是一個大謎麼？還有一層，歐伯先生說：

『農民根據自己的簡樸生活與單純頭腦，不但覺得一切戰爭，刑罰，法令，技巧，聲色貨利，馳騁田獵等是多事，是有害的，就是一切知識也是多餘的，騙人的，有害的。所以『無爲』，『無知』，『無欲』，『不爭』和『知足』等，正是農民那種原始的實際生活的反映。最後，農民對於當時社會所加於他們的種不能忍受的痛苦和虐待，深深地感到了失望，同時又看不出他們有任何更好的前途。於是只有根據傳說，根據神話去回憶過去，追念遠古的『黃金時代』來安慰自己。『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便是由這種追念稍加理想化形成起來的。』（求真一期四三頁）

照這段話看來，老子的全部思想和學說都是由農民那種『簡樸生活與單純頭腦』中得來！但他不獨盡情諷刺『衆人熙熙』，『俗人昭昭』並且說『我獨異於人』（老子本義十七章），當時佔絕對大多數的農民即使不在『衆人』，『俗人』之列，總應在『人』之列，老子何以這樣忘本？再就農民講，既能知道『戰爭，刑罰，法令，技巧，聲色貨利，馳騁田獵』這許多事為多事，又懂得便說，神話，能『追念遠古的『黃金時代』』，而且體驗到『一切知識也是多餘的，騙人的，有害的』，那他們都是智識極豐富的大博士，頭腦並不『單純』。他們既是『博古』，總也應當『通今』，這就是說，對於墨翟，許行等的學說應有所聞，即不然，專憑他們那樣的知識和鑒別力，也應當想得出等於或高於墨許等的辦法來，何以像一個垂死的階級一樣，『看不出他們有任何更好的前途』，竟反映『無爲』，『無知』，『無欲』，『不爭』，『知足』這一大串主張來呢？當農民受到『種種不能忍受的痛苦和虐待，深深地感到了失望』的時候，起來暴動，是古今中外的通例，是鐵一般的史實，但不去暴動，却和大思想家一樣，那麼含蓄地去深思苦索，想出或反映出『不爭』，『無爲』等辦法來，真是未之前聞！最奇的是老子從農民的『簡樸生活與單純頭腦』中所學得的廣大知識，所反映的『不爭』，『無爲』等辦法，不從農民的立場傾吐出來，竟站在統治階級的地位，曲曲折折，半吞半吐地予以發洩！

凡不懷成見的讀者將上面所說各點綜合比較一下，馬上會看出：認老子爲封建貴族和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非常切合真相，翻開老子全書，無一處解不通；但如認老子爲反映農民的意識，爲農民的代表，那就沒有一處是解得通的，即像歐伯先生那樣費盡氣力去強解，也終不能自圓其說。何去何從，不難抉擇。

五、老子的『愚』和『殺』的問題

關於老子的根本問題既已明白答覆了，其他枝節問題本可置諸不議不論之列。不過歐伯先生攻擊我最力的一點，是說我『不惜「斷章取義」來誣壞老子』，並且譏笑我『玩弄「斷章取義」的把戲玩弄得太露骨和太不高明了！』（求真二期四四頁）這是指老子的『愚』和『殺』的兩樁事講的。我在提出來加以檢討，用意不在爭勝，而在藉此愈加顯出老子的階級性，愈加表現是非曲直的所在。

第一，歐伯先生指摘我批評老子的愚民政策，是意存『誣餞』。我倒要再寫一段給他和讀者看看：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老子本義三章）

讀了這一段話，不能不使我想起歐洲奴隸制末期的奴隸主對待奴隸和近世資本家對待黑奴，是何等小巫見大巫的勾當！奴隸主爲着要使奴隸們無知無欲，日夜只准他們做兩樁主要的事情：即作工和睡覺。近世資本家爲着要使黑奴有氣力挖礦，只准他們吃黃豆當蔬菜。前者是『虛其心』，『弱其志』，後者是『實其腹』，『彊其骨』，不獨用力多，而且偏而不全。那裏能够像老子純用柔道與權術，一舉兩得？我不相信現在有任何不存成見的人能說老子這段話不是愚民政策！

可是歐伯先生別具高見：

『……以爲老子所主張的『愚』，絕不限於『民』，就是統治者自身也必須『愚』的（所謂『絕智棄聖』）。而老子自己就以『愚人』自命。例如他說『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這顯然不是表示單要『愚民』，即治者本身亦應當『絕聖棄智』，應當『自愚』的。』（求真二期四四頁）

歐伯先生以『絕聖棄智』做『統治者自身也必須『愚』』的證據，是不可靠的。因爲這四個字譯成白話，就是拋棄聖和智，另用其他方法。老子明確宣佈『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換句話來說，即以愚治國國之福。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正是以愚治國，正是一種愚民政策，但他並沒有『自愚』。統治階級爲保持牠的階級利益和統治權力起見，決不會自愚的。老子如爲這個階級

的保鏢，即使在外表上叫牠『自愚』，在骨子裏決不會叫牠『自愚』的，否則牠難於維持牠的統治地位。反之，老子如爲民衆的保鏢，便絕對不能使統治者相信他的話，『自愚』起來，這等於癡人說夢。至於『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是句問話，即反話，老子本義釋爲『豈真愚而如此沌沌然哉？』（十七章）與所謂老子以『愚人』自命，沒有關係。觀於他接着說『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闇闇』，最後一轉，『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就可以看出他自命還是比俗人或人高明，他並沒有以『愚人』自命，也沒有『自愚』的意思。歐伯先生不看前後文意，僅拿一句話做老子以愚人自命（他在求真一期四二頁解釋這句話，還不過說『他彷彿以身作則地形容自己是無知無識的』，在二期即去掉『彷彿』以求取勝了！）的證據，才是十足的『斷章取義』！

不過歐伯先生有一種脾氣，凡前人對於老子的解釋於他有不利的地方，他不用絲毫說明，一律斥爲『曲解』或『歪曲的『解釋』』，如蘇轍，如朱熹，都被宣佈不附理由的罪狀（求真二期四四和四六頁）。現在爲預防著老子本義的魏源再被斥責起見，我們即退一步，承認老子心目中的統治階級真有什麼『自愚』的把戲（老子本人也包括在內），結果又怎樣？待我們來考慮一下。

古代社會既因生產力的發展而分出貧富，形成階級，即有國家的出現。孟子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大體說明了統治階級和被治階級的情狀。勞心的人和勞力的人的智識程度是大不相同的。現在假定這兩個階級都依老子的主張，以正比例向愚的一途前進，然愚的程度仍有大小之別。小愚統治大愚，被剝削的仍是大愚。試問統治階級的『自愚』對於被治階級又有什麼好處？

還有一層，統治階級無論怎樣『自愚』，牠的統治地位是要盡力保持的，牠的食於人的習慣和志願是不會改變的。總說一句，牠的『自愚』不外是達到易於統治人民這個終極目的的一種手段，歸根到底，不仍是一種愚民政策麼？這樣看來，即依照歐伯先生的意旨，把統治階級的『自愚』算在裏面，也改變不了愚民政策的性質，可見我始終沒有『斷章取義』，更沒有『誣讐』老子。

第二，歐伯先生指摘我前文引老子『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

殺之，孰敢？』不够分量，特於上面補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下面補足『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斬；夫代大匠斬者，希有不傷其手矣』後，說道：

『這意思就是說，用死刑恐嚇人民，是沒有什麼用處的。而且『殺人』自有『天道』（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代替『天道』來殺人的人，自己也一定要受到傷害的。老子在這裏顯然表示根本反對用死刑來處罰作壞事的人。這正是天真的好心腸的表同情於人民的觀點。』（求真二期四四頁）

歐伯先生這種解釋是經不起分析的。『殺人』本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實實在在的事件，他把『常有司殺者殺』解作『殺人自有天道』，解作『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那便變成一種虛無飄渺的東西了。天道如果真要殺人的話，豈非『殺人不見血』？我們不願聽他故弄虛玄，還要引用蘇轍的一段解釋：

『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詭思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老子本義六一章）

歐伯先生看見這幾句話，一定又要罵我『借用主張嚴刑酷罰的蘇轍的曲解來武裝自己，來替自己的荒謬主張辯護。』（求真二期四四頁）但他應當知道，『常有司殺者殺』是指時常有殺人的事，如一律委諸『天道』或『天網』，精通人君南面之術的老子沒有那麼傻。他的『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不獨代表他的主張，同時也指出統治者替天行道的事實。

然而最妙的是歐伯先生從老子『夫代大匠斬者，必有不傷其手矣』一句反對濫殺的話來證明老子『根本反對用死刑來處罰作壞事的人。』真是這樣麼？請先聽老子說：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老子本義二六章）

老子既是帝王之師，自然懂得甲兵的必要。所以無論他怎樣講無爲，講不爭，講柔勝剛，弱勝強，終不能不老老實實承認應當用兵，應當殺人，不過用兵出於不得已，殺人衆多的時候，仍應慈悲爲懷，不要自鳴得意罷了。

歐伯先生看見我將用兵和死刑相提並論，也許又要斥我爲『極盡『不倫不類』之能事！……只好暫時向之打聲「哈哈」吧了。』（求真二期四五頁）

但用兵是五刑之一，國語魯語上所謂『大刑用甲兵』是。老子既然主張用大刑，當然不反對用大刑以下的斧鉞刀鋸等等，何況他親自說過『而爲者吾得執而殺之。』這是根本反對用死刑來處罰作壞事的人麼？歐伯先生不從老子全部著作去考察他對於『殺』的態度，僅摭拾他一句指摘溫殺的話來做他根本反對死刑的證據，並且由此推出他『表同情於人民』，這才是百分之百的『斷章取義』，這才是『走得太遠了！』

關於老子的問題，我們已經盡量回答了，現在應當總結一下。老子代表戰國中年破敗的貴族和垂死的封建地主階級，所以他的言論反動，消極，軟弱，但有時又非常憤激。他在本階級江河日下之際，死命作最後的掙扎，故書中充滿了人君南面之術，甚至於有不少精思玄妙的地方，但有時也昏頭昏腦，自相矛盾。例如他一方面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本義四九章），另一方面却大著其五千言的道德經，一方面要『絕學無憂』（十七章），另一方面又抱怨『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五九章），這才真正反映着一個在死亡線上掙扎的階級和閑閑狼狽不堪的情形。

關於老子對後世的影響，我們將把他和孔子作對比的研究，現在且先檢討孔子。

六、孔子代表士和自由地主階級

『封建制度最重閥閱，不得互相超越。孔子及其弟子都是士閥或庶人閥出身，並非貴族。（《尸子勸學篇》子路，子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顏淵聚盜也，顓孫師驥也，孔子教之，皆爲顯士。）就閥閱講，他們應本「思不出其位」的主張，始終安於士閥，不得有非分的希冀。然在事實上，孔子對於「千乘之國，……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以及赤也「願爲小相焉」的說法，不獨沒有貶詞，自己且公然宣言「雍也可使南面」。啊，不僅如此，孔子做過魯國的司空和司寇，子貢爲齊魯聘吳越，職居卿位，宰予仕齊也是卿，他們師弟簡直闖入貴族閭第了。』（《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九二至九三頁）

這是我從前批評孔子的話，現在看來仍是對的。不過在此須加以補充，才充分顯明。

一、封建制度中的等級是多而且嚴的，如莘尹無字所說：

『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

上，上所以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僕，僕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左傳昭公七年）

二、士是封建社會中的一個閥閱，極其量可以做到現今所謂『事務官』。故古稱：

『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也。』（白虎通德論，爵）

同時士也是小地主。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禮記王制）

『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士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管子問篇）

『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自然是武士。這種武士在周初已經不少，所謂『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文王），他們一定佔重要的部分。而『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孟子梁惠王下）也就是他們有土地的證據。不過在封建地主中，文士武士都無足輕重。到了戰國，這種武土地主更多，觀於韓非子所謂『大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詭使）。『夫上所以陳良田大澤，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顯學）管子所謂『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八觀）就可以知道。這正是新興的自由地主階級的一種大來源，（自貨幣經濟發展，土地自由賣買，凡富有金錢的人都可變成自由地主。）與周初的封建地主階級是不相同的。

三、孔子爲士的代表，這是誰也承認，不會有爭執的。不過孔子時代的士，數量大增，多是未仕之士。單就孔子一人講，據說有弟子三千。（至戰國更是士多如鯉，如齊的孟嘗君，趙的平原君，楚的春申君，魏的信陵君各養士數千，其中大都是些窮光蛋。）士的量既增，而士的質也變了。孔門把士看做社會和國家唯一無二的中堅人物。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

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士的責任。這正是孔子要以士閥去代替貴族閥，起來掌握政權的明證。在事實上，他們師弟也多少如願相償了。

孔子代表士閥並提高士閥的地位，既經弄清楚了，現在要進而考察他代表新興的自由地主階級一點。關於這一方面所遺留下來的材料，實在太少，不容易看出來。不過也並不是全無跡象可尋的。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旣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同書子路）

治理一個大國，節財用，便不致橫征暴斂，使民以時，就是孟子所謂『不違農時。』『富之』雖使農民也得到利益，但地主的利益更大。『教之』

當然是教育地主階級的子弟。因爲在當時尚未發明紙筆墨書的狀況之下，一般平民絕對談不到受文字教育。孔子雖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論語述而），可是非有閒的地主或有產者的子弟，誰能送十挺乾肉去做贊見禮讀書呢？荀子說：『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荀子富國）這不是對受過教育的人和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差別待遇的說明麼？

人們如果嫌上面所舉例子的解釋尚欠顯明，我們可以拿法國十八世紀的重農學派和孔門來做一個對比。這一派是地主階級的代表，却注意農民的利益，並認農民和漁業礦業者爲唯一生產階級。牠的格言是：『農民貧則國貧，國貧則王貧。』（Poor Peasants, Poor Kingdom; Poor King, Poor King）這和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荀子所謂『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荀子富國）不是異口同聲麼？可見口頭上儘管說什麼農民，人民，百姓或下，在實際上所代表的仍是地主階級的利益。無中無外，如出一轍。

關於孔子的階級性既經說明，我們可以答覆歐伯先生的詰難了。

七、孔子反封建貴族的學說體系

一、孔子生於封建制度日趨崩潰的春秋時代，所見的封建貴族大概不出二類：一、衰老腐化，庸愚暗弱，二、放僻邪侈，犯上作亂。他曾慨歎於『……三桓之子孫微矣。』（論語季氏）而晉國的貴族『樂，郤，胥，原，狐，續，慶，伯，叔，降在，早隸。』（左傳昭公三年）這是前者的一些顯例。春

秋譏世卿，是後者的一些顯例。現在應將第二種例子寫在下面，藉以答覆歐伯先生所詢的『根據』，至於『究竟是否可靠』（求真二期四五頁）一點，我且請他先提出不可靠的理由來。

『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公羊隱公三年）

『齊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同書宣公十年）

同書隱公三年注云：

『世卿者，父死子繼也。』

『禮：公卿大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

同年疏云：

『詩序云：古之仕者世祿也，於賢者言之也。』

從封建貴族的觀點看來，世卿世祿，禮也。穆叔口中的世祿就是『……

保姓受氏，以守宗族，世不絕祀，無國無之。』（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但從士閥的觀點看來，『世卿，非禮也，』世祿，『於賢者言之也。』因爲『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尚書畢命）更明白些說：所有卿相大夫不當世襲，應以人才爲前提。時至春秋，士閥的人才遠優於貴族，於是士閥奪取貴族的權位，便變成名正言順了。這就是作春秋的孔子譏世卿的用意所在。

二、歐伯先生說：『孔子說：「吾從周，」始終尊崇周天子。』（求真二期四六頁）他想由此證明孔子始終擁護封建制度。這又是牛頭不對馬嘴的。『吾從周』的全文爲『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尹氏注云：

『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我想這總不能視爲『曲解』。所謂『吾從周』是指從周的文物，並不是什麼周的文化比夏商二代高，他要創造一種新文化，即以周爲藍本。

在另一方面，孔門是始終不尊崇周天子的。孔子本人雖不公然反對周天子，但一有可能，他是想自己或士閥中的仁者來做天子的。證據呢？前文所

舉他稱智者宮這縣『預穆躬移而有天下』法比擬他的話，固是鐵證（歐伯先生雖斥此爲『曲解』，但自己並沒有提出『直解』或正解來，我們還是要以此爲證），即下面一段話又何嘗不將他的心思和盤托出：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同書爲政）

孔子如果『始終尊崇周天子』，擁護封建制度，何能說出『繼周者』的話來？我們從帝制時代生長出來的人都知道，在當朝統治之下講改朝換帝的事，是大逆不道，腦袋要擰場的。孔子居然如此說，可見他有滿肚子的變更周代封建制度的心事，自中久已無周天子其人！這種態度至我們的亞聖愈加顯著。所後來有人嘲笑孟子道：

「齊人那有許多妻，鄰人那有許多雞，而今尙有周天子，口口聲聲說王齊！」

老實說，『王齊』還是孟子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辦法。我重說一遍：依孔孟的本意，是由士閥中的仁者來做天子。前面已經說過，孔門的士是以仁爲己任。子貢問爲仁，子曰：『居是邦也，……友其士之仁者。』（論語衛靈公）至孟子即明白宣佈：

『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孟子離婁上）試問這是根本推翻周天子，因而推翻封建貴族？還是『始終尊崇周天子』，因而擁護封建貴族？

歐伯先生不能從這些微妙處去理解孔孟的用心，對於前文所舉鐵一般的證據，無法反駁，便大玩其宣傳手段，斥朱注爲『歪曲的解釋』，指『雍也可使南面』，『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一類話爲『閑談』，爲『閑話』！我讀書三四年，第一次從歐伯先生學到孔門的『閑談』，『閑話』原來是不負責任的瞎談，原來是可以和他們的非閒談非閒話正正反對的。多謝你的『新奇的思想，偉大的發明！』（求真二期四六頁）

三、我在前文中已經鄭重聲明：『孔子的道德學說是根據當時新興的自由地主階級的利益作成的，內中即或有一部分仍爲封建地主階級所歡迎，也不能牽扯到他擁護這個階級上去。』（求真二期四三頁）歐伯先生故意不理會這一點，提出大批問題來問。我如果一一回答，實近於無聊，如全不回答，他一定以爲我是辭窮理屈了。因此，我只好就其中比較重要的來解答一下。他說：

『實際上，孔子不但不會反對封建貴族的世襲特權，而且相反地他是更有『理論

地』更有『系統地』在維護這一特權。孔子的『正名』主義及『禮』治主義，就是最明顯的表現。不過在孔子看來，世襲特權是與等級制度或『名分』制度緊相聯繫着的。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這一名分制度的具體表現。……因為只有等級嚴，名分定，封建制度才能穩固，封建貴族的世襲特權，也才能有『合理』（即所謂『禮』）的保證而不致受人侵犯。』（求真同期四五頁）關於正名這段話的源委是：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爲正？』子曰：『野哉由也！……』（論語子路）

歐伯先生會笑我『上了自己的當』，把孔門的『閑談』，『閑話』當作正經話。這裏不僅是『閑談』，『閑話』，而且是誇謬的孔門空前絕後的吵嘴談，何以他不怕『上了自己的當』，而大談其孔子的正名主義呢？他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正名的具體表現，但尤應當知道：這不是封建制度中的『等級嚴』，恰恰相反，這是適合於前資本主義時代士閥和自由地主階級的一種體系。怎樣見得？

我在第六項已經介紹過的『人有十等』是正規的封建制度中的等級制，到了春秋時代已因新興閥閱和階級的抬頭而滯礙難行，故孔子毅然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張來，將那嚴格的十等的等級制，一掃而光。這就是使國與家直接聯繫起來，使國直接建立在家的基礎上，以便機構靈活，好實行他的主張，所以他提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同書李氏）這是第一點。

第二，當周代的封建初期，所封的國達一千上下（文獻通考封建考一載『周千八百諸侯』，未必可靠）。政治權力既經分散，自然是『天高皇帝遠』，天下的共主僅擁虛名，管蔡的叛亂，周召的分治，都是明證。至春秋時更是天子守府，踐土之會，晉文公將周天子叫去，連『守府』都守不住了。但孔子却要極力提高君權，一方面不准諸侯橫行，另一方面不准百姓開口，所以他說：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不識。』（論語季氏）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中央集權，與封建時代的各國分權，完全是一樣的。『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然明謂子產曰：『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

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當封建末期，士閥（決不是人民）對於執政，大發議論，孔子因而大大地贊頌子產不毀鄉校的賢明措置。但他爲着提高君權，便藉口『天下有道』，叫『庶人不可以譴』。歐伯先生問我這『作何解釋？』（求真二期四六頁）我可以明白答覆他，這只和孔子的君權運動有關係，和封建制度沒有關係。

第三，歐伯先生又問『孔子之譴責「八佾舞於庭」和「三家者以雍徹」等，其含意何在？』（同期同頁）我的答覆仍如前。因爲八佾是天子之樂，共用六十四人，季氏不過魯大夫，本只能用十六人，以大夫僭用天子之樂，故加以譴責。同樣，天子宗廟之祭，歌雍以徹，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均魯大夫，僭用天子之祭儀，故又加以譴責。試問這怎能『證明孔子會嚴密維護着封建的整個制度，保護着封建貴族的特權？』（求真二期四五頁）

胡適之先生在二十八年前大談其孔子『却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封建階級』（中國哲學史大綱）一〇〇頁），我會加以嚴厲的批評，不意時至今日，歐伯先生『根據有關於孔子思想的全部材料研究出來的總結論』（求真二期四五頁）仍不外孔子維護封建制度這一套。我爲擁護真理起見，出來加以辯論，是非姑置不論，這值得歐伯先生『深文周納』，斷爲『心裏感到不大舒服』（同期四三頁）嗎？然這也不去管牠，我們且進一步討論老子和孔子對於後世所發生的影響，藉資結束。

八、老子對於後世所發生的影響的檢討

末了，歐伯先生將老子的思想和所代表的階級關係，總括爲四條，前三條不是我們在前面已經回答過，就是無關重要，不用提及，惟第四條應當加以檢討，特先徵引於下：

「從對於後世的影響說，信奉老子之道（所謂道教）者多爲下層貧民，尤以農民爲甚。中國自東漢末千餘年來許多次的大小農民暴動，多以道教爲其思想上之旗幟（不僅東漢末張角之『太平道』，「五斗米道」，純粹信奉老子。即後來元末之白蓮教，清末義和團之八卦教等，亦多以道教爲中心）。但崇奉孔子者則多爲上層階級，尤其是君主（漢武帝後）及官僚貴族（所謂士大夫）。……至於農民對於孔子平常是冷淡的，到了他們進行暴動的時期，則多半是根本反對他的

說：

（例如太平暴動中，農民常將孔廟焚燬。）】（求真二期四六頁）
凡一種學說或宗教流傳下去，是容易因環境的關係而變質的。舉例來說：『普通都承認基督教會所原始包含之份子是無產階級，差不多全無例外。牠並且是一種無產階級的組織。而且這種情形就在基督教早代開始之後一個長久的時間，仍然是正確的。』（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礎神州社譯本四〇四頁）

在路加福音的山上垂訓說：『你們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爲上帝之國是你们的。你們餓渴的人有福了，因爲你們將要飽足。』（同書四一〇頁）可是馬太福音書的山上垂訓便被修改爲『心中貧乏的人有福了，因爲天國是他們的。……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爲必得飽足。』（同書四一三頁）

基督教初爲無產階級的宗教，過了三世紀，因爲變質的關係，便變成羅馬帝國的國教。到了中世紀，牠擁護封建地主階級，到了近代，牠又擁護資產階級。

反觀老子的所謂道教和孔子的儒教，也在不斷地發展與變質，而道教尤甚。戰國末治道家的學者，以黃帝與老子相傳會，至漢初遂有黃老之名，而帝王卿相率趨向黃老術，於是老子又繼續爲帝王師了。

『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爲。』（風俗通義孝文帝）

『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寶不得不談黃帝老子，尊其術。』（史記外戚世家竇太后）

『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卒歸高帝，嘗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同書陳丞相世家贊）

『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蓋公爲言治道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遷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同書曹相國世家）

至魏晉南北朝，老莊之學盛極一時，士人多向清談。至李唐更稱老子爲『國祖』，立老子廟，奉爲太上玄元皇帝，更設崇玄館，置崇玄博士，於是道教成爲國家的正教。宋至真宗，也加老子尊號，道教又盛，徽宗且被道士們尊爲『教主道君皇帝。』

歐伯先生於老子對後世統治階級的巨大影響，不知是一無所知，還是作不知，一字不提，竟極力主張『自東漢末千餘年來許多的大小農民暴動，多以道教為其思想上之旗幟』，希望以此和他的老子同情於農民的說法相印證，真是極東搬西扯的能事。人們應當知道，漢初的文景和陳參等雖沒有實行老子的全部學說，但至少是採取了他的無爲，甚至於他的權數，所謂『談者多以老聃為任權數，其流為范蠡，張良』（國故論衡原道上），是完全正確的。即晉之清談又何嘗不是老子學說所產生的後果。至於東漢張陵所創造的什麼道教，完全是假借名義的勾當，與老子無關。試讀下面兩段話，就可以知道：

「及張陵受道於鵠鳴，因傳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刲數，頌類佛經。」（魏書釋老志）

「……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五斗米，故謂之米賊。」（後漢書劉焉傳）

基督教的變質，把『貧窮』改作『心中貧乏』，把『饑餓』改作『饑渴』，慕義，還算是有點影子，至於由老子的人君南面之術變為『齋祠跪拜』，或『造作符書以惑百姓』的道教，真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了。如果要找些微影子的話，那就是張陵自稱得受老君秘錄行符水禁咒之法，講長生之術。其實他的來源是神仙家，和老子風馬牛不相及。何況奉行道教的不止平民或農民，還有唐宋的統治者。試問這怎能幫助歐伯先生去證明老子同情於民眾的艱巨工作？

再看孔子的儒教，自孟子經漢至唐宋明清，雖一路發展下來，但並沒有大變質（如漢儒以讞緯說經，以及宋儒陰陽怪氣的理學雖不免使儒教變質，到底是輕微的）。因為牠是代表士閥和自由地主階級，而兩千年來掌握政權的正是這個閥閱和階級，自然無根本變質的必要。漢初的帝王卿相本盛行黃

老之術，至武帝終於罷黜百家，表彰六經，正不是一樁偶然的事。董仲舒將牠的原因告訴我們了：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

這就是因漢於利用老子的權謀術數和無爲，使國家休養生息之後，感覺不足，感覺『上無以持一統』，『下不知所守』，尤其是經過七國之亂，深深感覺須尊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和『庶人不議』的孔子之道，『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這正證明老子的學說因情過境遷，已不適於生存，而孔子的學說却極富於生活力，變成時代的寵兒，一直到清末為止。

至於農民的信奉道教（注意：並非老子之道）而對孔子冷淡，是因道教有符錄鬼神之術去哄騙他們。孔子不事鬼神，自然引不起他們的興趣。這和老子的階級性是沒有關係的。又『太平暴動中，農民常將孔廟焚燬』，是由『拜邪神』犯了天條第一款（賊情彙纂九卷僞天條）所促成的，無分鑄道，也同樣和老子的階級性是沒有關係的。

現在總說一句：凡不懷成見而又具有思考力的讀者，看了我上面對於老子思想和學術的分析，階級性的鑿定，以及道儒二教影響後世各不相同的檢討，當不致同意於歐伯先生的說法，以為我『對於老孔所代表的階級性的「主張」是和歷史事實完全違背，是虛構的，曲解的，附會的。』（求真二期四六頁）反之，將這些話回敬給他做自我批評，是再切當也沒有了。我深信十五年前所開闢的道路，至今儘可放步走去。歐伯先生雖滿懷好意，向我招呼『回頭是岸』，但我遨遊真理之城，海闊天空，那肯回去鑽牛角尖，惹我掉頭不顧了！

三五年六月十六日

孔子不會革貴族的命

陳振維

拜讀了李季先生及歐伯先生關於老子孔子思想問題的論爭的大作，又受了編者先生歡迎讀者參加討論和批評的鼓勵，我也不揣冒昧的想說幾句話。

李季先生認為老子是站在統治階級說話，而孔子是要革貴族的命，孔子的道德學說是根據當時新興的自由地主階級的利益作成，而非擁護封建地主

階級。這點鄙人却不敢贊同。鄙意孔子只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說話，絕對擁護封建地主階級的。

李季先生說：『吾少也賤』的孔二先生竟想登九五之尊，帝制自爲，是從根本上傾覆封建貴族階級的統治與特權。這里，我真要代孔二先生大呼冤枉不已。孔二先生在天有知亦要連聲呼屈。因為二千年來歷代帝王尊崇爲萬世師表，至聖先師的孔二先生，是最忠實於封建貴族階級的。不料到了世風日下的今天，竟有人污穢他反封建，想皇帝做，這是多麼大逆而違背夫子之道』！

說孔二先生擁護封建貴族階級，也非瞎捧場，自有孔二先生的學說足資根據。現在我們先弄清孔子的身份。他決非布衣而列身貴族，雖然，他少時貧且賤，但後來在封建統治層中取得了貴族的身分（爲魯司寇）。當他一旦成了貴族以後，他對平民不僅不會寄予同情，反之把平民和貴族劃成兩個對立的身分階級，把平民看作天生的一類壞人。例如他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而不仁有之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論語）他把生產勞動看作小人做的下賤事。他的所謂君子與小人，便是貴族與平民之分，勞心與勞力之分。試看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這顯然是把勞動看作小人所作之賤事。他老子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君子，他的學生，也該如此才對，問農問圃，不啻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

孔子不僅是貴族，而且是維護貴族統治階級的最力者，因而他非常珍惜他的貴族身份，從自身利益觀點出發，時時企圖挽救這個漸趨沒落的封建社會。在初期封建制度發展到『春秋』末期時，由於內在的矛盾而暴露了空前的混亂現象，例如『世衰道微，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孟子）陳成子弑簡公（論語）孔子自擊當時天子政權旁落，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諸侯，庶人議政，諸侯的兼併，農民和封建主間矛盾的發展，和封建統治者地位的搖動，宗法制度的破壞，他認爲這是統治階級大大的危機，他不會了解這是封建制度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不肯從社會

發展之自身運動上去把握，只從抽象的心理學的範疇上去覓取觀念論的解釋，從而想挽救正在崩潰的當時社會制度，回復西周時的封建社會，『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文王既沒，文在不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孔子以爲周朝的禮樂制度比夏商二代都完備，遂毅然以傳佈禮樂制度爲己任，自以爲文王的繼承者，因而大倡其『禮』和『正名』作爲維護等級制度的基本原理，從而奠定封建社會的政治機構。他以爲要消弭當時社會的混亂現象，只有恢復封建社會的秩序，要恢復封建社會的秩序，只有正名，把等級名分重新確定，恢復封建最高領主——天子——的威權；而諸侯，大夫，各退守自己的名分，如此，庶人才不至議政。但以什麼作爲名分的尺度呢？那便是『禮』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左莊十八年傳）天子有天子的禮，諸侯，大夫各有其一定的禮（禮不下庶人），不得僭越，於是，社會秩序井然，天下有道矣！『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因而他對於僭名分禮數的人是痛心疾首的。『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無非是魯大夫季桓子僭用了天子之樂，他老子便十分憤慨。何況季氏，便是管仲，會受到他老人家的贊賞，認爲輔助桓公霸諸侯，匡天下，人民受其賜，否則連他老人家都不免於披髮左衽，淪爲夷狄了。但對於他的僭越行動，仍大不以爲然，『管氏之器小哉。』『邦君樹寒門，管氏亦樹寒門，邦君爲西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論語）所以當陳成子弑了簡公（齊），孔子便慎重其事的沐浴而朝，告於哀公（魯）：『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論語）雖討了一場沒趣，但他對反封建的行動不能緘默，是爲人所知的了。

我們再從一些小事上也可看出他是何等重視名分等級以及他的貴族身份：『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論語）他是極愛顏淵的，顏淵死了，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但要他犧牲一部車子時，他便權衡師生情誼和階級制度，終至說：『我兒子死了

沒有樽我都不肯賣掉車子，因爲我忝位大夫，不是小人，不可以徒步呀！」
顏淵死了，同學們要厚葬他，孔子以爲不可，因爲回雖賢，但終究是平民，平民怎可僭用富厚的葬禮？

李季先生引用了他們的一段對話，『千乘之國，由也爲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宗廟同會，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說是平民出身的子路，冉求，公西華，要做卿相，而爲孔子所首肯。其實孔子聲明只是各言其志，某人有某種才幹，至於他自己，只想和曾晳一樣，『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實在算不得是孔子反對貴族特權的一證。

孔子，這位被封建統治階級尊崇了二千年的封建貴族階級維護者，到現在，並沒有新的評價，我們從他的君貴民輕的學說里，實在不能免強附會的嗅出絲毫革命的反封建的氣氛，他只清晰的呈現着濃厚的保守色彩，改良主義，明顯的昭示着他承襲了文王的封建制度而加以發揚光大！

附歐伯先生來函

編輯先生：

來信贊李季先生『再論老子與孔子——答歐伯先生』大作原稿，昨經收到，并已閱讀一過。承囑對李先生此次二萬餘言之論文，表示意見，因所限時間過於迫促，一時礙難作答。具體意見，祇好留待貴刊第四期發表。但必須預先聲明者，李先生對本人原作，即『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一文（載求真創刊號），從未認真將其仔細分析，僅從枝節上加以批駁（見『行不得也哥哥』）；最近李先生的長論，對於本人『回頭是岸』一文，乃仍不改前態，且避重就輕，離題發揮，愈論愈遠，這證明李先生對於老孔根本思想及其體系，認識未免過於膚淺，因而行文繁瑣，論據支離，大有誘導讀者走入迷途之勢！故本人對於李先生的近作，必須作有系統的以及比之『回頭是岸』（載求真第二期）更爲詳盡的批判。俟稿成後，自當如期寄上。專此奉答！并頌

撰安！

李先生大作原稿附還。

歐伯 六月廿三日

利通行
LEE TONG & COMPANY
專營手工業製成品出口
代理歐美名廠產品入口

— MANUFACTURERS & EXPORTERS OF CHINESE THINGS —

行址：上海漢口路四五五弄廿七號

HOUSE 27, 455 HANKOW ROAD, SHANGHAI.

電報掛號 三 LEETONGCO. 三 電話 九六五四六
CABLE ADDRESS SHANGHAI — PHONE 96546

維新運動底階級基礎和解放意義

唐虞世

康有爲是以復辟黨資格死去的。現在青年人聽到『康黨』二字，也許以為這是守舊的，落伍的，反動的人物罷？可是當時的人對於『康黨』，猶如一九二一年前後對於革命黨一樣，一九二五年前後對於共產黨一樣，都是視為洪水猛獸的。事實是十九世紀末幾年做『康黨』的人，比較後來做革命黨或共產黨的人，需要更大的勇氣，因為從桐城謬種或選學妖孽到『康黨』的距离，是比從『康黨』到革命黨或從革命黨到共產黨的距離，更遠得多的。

康有爲梁啟超諸人所發起和領導的運動，在中國歷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其影響的深遠是秦以後中國歷史所未會見的。這話並不是說，秦以後中國沒有維新運動。

維新運動是有過幾次的。康梁自己就常常稱道王安石，替他作新傳，替『熙寧新法』做翻案文章。我們對於中國歷代的改革家，維新家，變法家，都表示敬意，尤其對於敢說：『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的王安石。可是無論王莽，王安石或其他改革家如何勇敢倡言和實行改革，他們仍是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仍是在地主統治基礎之上改革那些有害於此統治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康梁底維新運動，就其本質說，則是代表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利益，則是企圖將政權從士族或地主階級基礎移植於資產階級基礎之上。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的資產階級運動。

『商會』底『商』字是廣義的，牠兼含有金融家和工業家在內；總之，牠含有一切資本家，一切依賴資本獲取利潤的人。這一切人大多是從狹義的商人出身的。商業資本本來容易變為金融資本。為仿造洋貨或為輸出土產，商人們也不能不干涉手工業，以至於興辦機器工業。舊式手工業生產固然競爭不過廉價的舶來品而破產了，但有若干部門反因之發展起來。資本主義愈發展，市民階級鬥爭愈得到勝利，『商人』地位也愈抬高了，以前商為四民之末，士族中人看不起他們，現在則『官』『商』並稱了。商人既有經濟

方資產階級的。我們會說過『中國缺乏西方意義的城市，因之缺乏『市民階級』。』（見『中西文化不同的基礎』——載求真雜誌創刊號）中國久已有商人，有手工業主人，但他們大多是地主階級兼營的，是地主階級底附屬品，除了若干特殊的時代，若干特殊的事實，商人們未曾形成一個自覺的階級，與地主階級對抗，與士族競奪政權。中國社會出現一個資產階級，認真說來，是帝國主義侵入以後的事情。帝國主義將前資本主義的中國轉變為資本主義的中國時，首先在中國造成一個資產階級，其中成分是：海外華僑富商及其

國內家族，通商口岸直接與外國人交易的商人（買辦），大小城市販賣洋貨的商人，舊式商業資本家（此時不依附於士族而依附於新興階級），官僚資本下發財的人，士族自身改營商業者，等等。從此以後，因通商而新興的城市不用說，連舊式城市也漸漸改變其為政治和軍事中心的性質而成為商業和手工業中心的性質了。大小城市商人和手工業主人都組織起來，成為『市民階級』，即資產階級。他們的組織就是各地的『商會』。清朝末年和民國初年，各地的商會其實就是歐洲中古和近世的『市政局』（Municipalite），商會會長就是『市長』（Maire）。各城市市民階級以商會為其鬥爭機關，以抗捐，抗稅，罷市，為其鬥爭武器，反對當時佔統治地位的當地士族及其中央政權底代理人。至少從太平天國滅亡起，這種鬥爭漸漸發生，這種新興力量漸漸強大了。士族英雄們撲滅了農民暴動火災以後，看見身旁又興起一個敵人，比農民更可怕，更無法對付。

牌，後來中國人自己出面。報紙之外還出新雜誌，新書，新小說等等。執筆者，如龍橙，王韜，吳沃堯，李伯元等，老實不客氣嘲笑那些官，那些紳士，那些世家舊族，攻擊政府外交失敗和內政錯誤，非難舊禮教，懷疑傳統思想。報章文獻本是與資產階級有密切聯繫的。在中國則報章文獻一開始就是資產階級的文獻，這初期文獻，即使現在還有存留的，普通的人也很難見到。可是廿年目觀之怪現狀和官場現形記則是易得的書，上海繁華夢一類的書也不難尋覓，——這些書無論是著作於維新運動以前或以後，我們總可以從中看出十九世紀末葉中國通商口岸資本主義發展概況及其對於各方面社會生活的影響，也可以看出中國資產階級力量如何大，野心如何高，需求政權如何迫切了。這就是康梁底運動底基礎。無論王莽王安石或其他改革家，都未曾有這種基礎。

運動底兩大領袖都是廣東人，——這也有象徵的意義。梁啟超在他的南海康先生傳中說道：

『吾粵之在中國為邊徼地，五嶺障之，文化常後於中原，故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之地開化既久，人物屢起，而吾粵無聞焉。數千年無論學術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能動全國之關係者。惟禪宗六祖慧能為佛家鉅子，風靡天下，然所及乃在世界外之世界耳。次則明代陳白沙湛甘泉以講學鳴於時，然其學系之組織完善不及姚江，故王學出而陳學衰。逮於近世，洪秀全李秀成驟倡革命，躊躇天下之半，實為吾粵人物最有關係於全國者，然其才略不敵湘淮，故曾軍興而洪軍亡。微乎渺哉，專人之在中國也！然則其關係之所及最大而最遠者，故不得不謂自先君始。』

維新運動底領袖是廣東人，而廣東人在全國佔據政治運動領袖的地位又是自康有為，梁啟超，及後來的孫文開始，——這是偶然的呢，還是有因果關係？此點，梁啟超沒有解釋。其實，歷史上沒有特出人物的廣東，此時突然能產生幾個人物為全國運動領袖，這乃是食帝國主義侵略之賜。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廣東首當其衝，華僑世家又多在廣東，因此廣東比其他各省更早發展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更早成立，也更早暴露其野心，難怪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人物首先產生於廣東，甚至廣州及其鄰近諸縣了。洪秀全和李秀成底運動，在某種限度下，也是應當如此解釋的。

狹義的維新運動，即戊戌年的新政，是失敗了。中國資產階級圖謀改變滿州皇帝戴清為奧蘭治·威廉，為路易·菲力，為睦仁，要他戴着皇冠替資產階級服務，結果未能成功。皇帝自己成了囚徒，運動領袖或被殺或亡命，

各地凡直接參加的人都受了打擊。然而我們這裏注意的還不在這狹義的政治運動本身，而在做這運動基礎的思想革命以及這運動失敗所產生的影響。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確實發動了一個思想革命；這思想革命本質上是出於新興資產階級底利益和野心，但形式上則是聯繫於並繼續着舊制度下思想發展過程的。

舊制度下的中國本有一個合適的完整的思想體系，一個意德沃洛基(Ideologie)，——即是孔子主義。孔子主義既包含着桐城謬種和選學沃寧，也包含着義理和訓詁，程朱和陸王，今文學和古文學，先秦經典和後代注疏。這個主義在政治上早已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以致無論保守黨或改革黨，無論皇帝或小臣，凡有所主張的都須徵引這個主義以為論據，都須注意如何使得自己主張和這個主義之間能互相調和，至少形式上的調和。皇帝朝代可以來更變，但是孔子權威不能動搖。秦漢以後，除了老莊和禪釋有時獲得發言權外，中國一切思想鬥爭和發展都是在孔子主義內部鬥爭形式下進行的。現在新興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有所主張了，牠首先必須同這個孔子主義發生交涉。

康有為首先擔任了這個工作。資產階級思想家康有為經歷了孔子主義中間各種派別和傾向。他少時從朱次琦學理學，研究過程朱和陸王，後又從事於漢學的研究。無論理學或漢學，他都不能滿意，於是走出孔子主義以外去學佛典，去讀基督教經典，去研究新譯的西書等等。他又隱居在南海縣西樵山上四年之久，離開人羣，『常徹數日夜不臥，或打坐，或遊行，仰觀月星，俯聽溪泉，坐對林莽，塊然無儔，內觀意根，外察物相，舉天下之事無得以擾其心者，殆如世尊起於菩提樹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概。先生一生學力實在於是。』(見梁啟超底南海康先生傳)這不很像聖人之徒了。所以梁啟超接着說：『其結果也大有得於佛為一大事出世之旨。』康有為另一個弟子張伯楨寫的南海康先生傳中更明顯說出康有為如此冥想結果已經拋棄孔子主義而接受佛家哲學了。然而他從西樵山下來，『出世而入世，縱橫四顧有澄清天下之志』，卻首先以孔教教皇自命。他要恢復孔子主義底『真面目』。

這是離奇的事情：一個内心拋棄了孔子主義的人反而以保衛這個主義的門士姿態與世人相見。但其實這事情也是不難索解的。那時中國資產階級雖然已有政治野心，仍必須利用舊的政權機構以達到自己的目的；牠還不敢

提出『民主共和國』口號，提出『革命』口號；牠當然更加不敢公開排斥孔子主義而代之以『德先生』和『賽先生』了。牠祇能藉偷天換日手段拿自己的理論或思想輸入於孔子主義之中。牠需要一種替自己利益服務的孔子主義。

牠製造一個合乎自己理想的孔子。

康有爲下山之後立即加入當時孔子主義內部的爭論。他站在新發生的『今文學』方面而反對傳統的『古文學』方面，一下就把這個爭論提高了和擴大了，而自己成了今文學運動集大成的人物。這是偶然湊合的麼？不是！這是有機的聯繫的。近三百年來以孔子主義內部鬥爭形式表現出來的中國思想發展，約略言之經過如下幾個階段：宋明理學流於空疏之後讓位於經世實踐的學問，這種學問發展不下去便讓位於裝賓補苴的漢學，這個漢學盛行一個長時期之後又讓位於講求微言大義的今文學，最後整個孔子主義就讓位於來自西方的資產階級思想了。這幾個階段的思想發展，就其本身來看，好像是自然而然的，是依照發展邏輯不得不然的。我們並不否認思想發展有其本身的邏輯，然而我們認定各階段思想底變化，最後非拿政治和經濟變化因素去解釋就不能解釋的。以前的且丟開不管，今文學研究即使是最漢學研究發展下來不得不然的結果（如梁啟超說的：從東漢回到西漢），但其如此興盛，其成為一種大運動，則不得不說是受當時中國局勢所影響的。今文學底提倡恰與帝國主義侵入差不多同時，——這決不是偶然的事情。第一代大師固然將這研究限制於純學問範圍內，但第二代大師，如龔自珍，如魏源，就借公羊經義來議論朝政了。正統的孔子主義者，古文學家，一開始就視今文學為離經叛道，為危險的革命的事物。今文學不知不覺代表了當時陷於動搖的尋求出路的士族底思想。中國國家和士族政權面對着如此嚴重的局勢眼看就是滅亡和崩潰了，理學和漢學都無濟於事，明清之際那種經世實踐的學問也因時勢不同不能合用，那麼祖宗傳下的舊思想中還有甚麼失傳的事物可以解救這個嚴重局勢麼？中國舊制度大體創立於秦漢，這創立初期有一種『國家哲學』與後來諸守成時期底哲學不同；在後來的哲學看來，這初期哲學中頗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因此漸漸湮沒不彰了。這便是西漢十四博士底經說。這種經說不過是替漢朝新創的制度做理論根據罷了。可是傳至後代的十三經注疏祇有何休底公羊解詁屬於這種經說，其餘都是屬於所謂古文經說。難怪到此時期人們特別注意那被忽略了將近二千年的公羊傳；發掘了公羊傳，人們自然繼續發掘下去，直至一切所謂今文經說。這種開創時期的哲學確有許多

點與將近二千年來守成時期的哲學不同，例如前者是把黃金時代置於未來的，後者則把黃金時代置於過去，前者是注重創作的（六經乃孔子所作），後者則注重述成（六經乃孔子所述）。在我們說的這個時代，社會基礎發生動搖，需要變更制度，重要創作，需要寄託希望於未來，——所以孔子主義若是仍能作為國家哲學的話，則其中今文學部分當然是比其餘一切部分更能適用的。

所以康有爲抓着這部分孔子主義而徹底發揮下去。他的代表著作是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這兩本書表面上是推尊孔子和他的學說的。康有爲認為孔子是改制者，是『素王』，六經都是孔子底著作，雖經秦火並不亡失，西漢諸博士對於所傳經書的解釋是最符合孔子本意的，至於現在流行的經書，則大部分是古文學，即新朝劉歆所僞造的東西，與孔子本身絕不相涉。事實上，康有爲不僅把以前視為神聖的經典說成爲偽造的，他連其中保留着的今文部分也說成爲一個人底著作，把孔子說成爲與先秦著書立說的諸子差不多。大家都是託古改制，不過有好壞罷了。

這是有很大的思想解放意義。同夢魘似地壓在中國思想者心頭上的孔子主義，於是失去牠的魔力了。大家鬆了呼吸，醒悟過來，能够自由地思想了。思想，不再等於『在孔子主義範圍內思想』了。思想，不必定須同孔子主義相調和了。這個解放意義，除了中國思想者或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民族底思想者以外，人們是不會明白的。後代的中國思想者也將不會明白。如果要找一個歷史類比，那就是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德國的『聖經批評』。基督教聖經權威，與當時普魯士專制政治相結託，也是同夢魘似地壓在德國那些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少年思想者心頭上。他們當時不能也不敢批評政治。於是聖經批評者出來了。這些批評者指出：四福音書都是二世紀三世紀或更後的作品，並非那撒勒人耶穌底門徒所記；書中含有的哲學是二三世紀間流行的新柏拉圖派學說，并非耶穌及其門徒底學說；歷史上是否有那撒勒人耶穌其人，也是成爲疑問的。於是聖經，乃至基督教本身，權威墜地；人們儘可以批評政治，不必顧慮是否違反聖經教訓了。德國聖經批評著作，現在都很難得，但中文有法國文人雷南（Ernest Renan）底耶穌傳譯本，此書大部分剽竊德國聖經批評，並無新見，其中雖不否認歷史上有耶穌其人，但把耶穌看作一個人，同我們一樣的人，並不是上帝的兒子。祇要耶穌是一個人，不是超

對於我們就沒有甚麼神秘的意義和夢魘的作用了。

聖經批評是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底理論先驅，同樣中國經書批評也是以後一連串的維新和革命理論先驅的。做過這經書批評以後，康有爲和梁啟超底一切政治主張就都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了。李贊以後，中國恐怕沒有一種著作能像新學爲經考那般轟動一時又那般觸犯忌諱的。這書出版未久就風行海內，上海及各省立即翻印了五版。不久就有御史上書請焚這書，戊戌政變後朝旨又禁毀書版。康有爲民國六年重印此書感歎道：『夫古今一書之成寡有忤朝意歷三焚者！』

我們上面指出新學爲經考底意義乃在於思想解放，乃在替當時的中國思想解除了孔子主義夢魘底重壓，——可是這個解放意義，康有爲自己并不懂得。他不以推翻新學爲經和證明孔子託古改制爲限，他還要進一步託孔子以改制，他要創立一個『孔教』，自爲第一任教皇，或者，如嗣同說的，他要做孔教底『路得』。那就過分了。那就是另造一個孔子主義夢魘來重壓思想。在這方面，他的『建設性的』理論自始就含有反動的意義。

經書批評之解放的意義，康有爲自己雖不懂得，別人卻很懂得。首先，他的大弟子和助手梁啟超就放棄經書批評工作，就反對孔教運動，而把那從孔子主義解出來的思想完全應用於政治批評和社會批評。戊戌以前，他在上海編時務報，在長沙教時務學堂，戊戌以後，他在日本編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等，又設大同學堂，講授中國文史學等等。辛亥革命前印行的飲冰室文集類編已有一百多萬字了。就量來說，中國近代著作家沒有一個趕上他；就影響的廣闊來說，也沒有一個趕上他，連他的老師也不及他。當時以及後一代的思想者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受梁啟超底影響。人們大部分是經過梁啟超去受康有爲影響的，不是直接受康有爲影響的。經書批評本不能引起廣大讀衆底興趣。康有爲并非沒有政治批評和社會批評，可是比梁啟超少得多，而且爲孔教運動所累。沒有康有爲就沒有梁啟超。雖然如此，但梁啟超懂得及時離開他的老師底道路，放棄經書批評，而專力於政治和社會批評；譚嗣同亦然。梁譚尙且如此，其他有志於改革的思想者更可知了。康有爲及其經書批評是中國資產階級得魚的筌，得兔的蹄。得後，就把空蹄拋棄了。

維新派不僅有消極的破壞性的批評，而且有積極的建設性的理論；不過這些理論本質上并非從公羊傳及十四博士經說得來，而是出於舶來的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僅在形式上聯繫於今文學罷了。資產階級思想發生於西方而不發生

於中國及一般東方，既然是因爲東方本來沒有那種城市和那種資產階級，那麼現在資本主義侵入以後，中國也發生和長成那種城市和資產階級了，所以最前進的思想家就接受了舶來的資產階級思想。至於這些思想家是士族出身的，是將被這種思想所推翻的階級出身的，——那也是不難索解的事情；因爲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雖然代表資產階級利益，但初期大多出身於那趨於沒落的貴族階級。資產階級在其初期的鬥爭中是代表歷史進步力量的，牠的思想者因此不以一階級思想者自居，而以全人類思想者自居，不認爲自己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而認爲自己是代表一切被壓迫的人類利益的。這就產生了熱情，犧牲精神，英雄主義。戊戌前後，全中國的社會棟樑，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主持者幾乎都是從『康黨』出身的，即直接或間接接受過康有爲梁啟超影響的。

本誌第一卷第二期目錄

- | | | |
|--|---|---|
| 時事評論 | 從吉田內閣觀測日本政局的發展
印度問題之僵局
巴黎外長會議之又一幕喜劇
滿庫黃金遍地工潮 | 康君
明海
鶴臯
君譯 |
| 民主的內容與怎樣實現民主 | 密勒氏評論報論中國農民騷動 | 唐虞世
康君
譯 |
| 維新與革命 | 戰後蘇聯之經濟
彼得F·戴勒喀著·劉少嚴譯 | 陳人白
李雲龍 |
| 波茨坦會議與德國問題 | 戰後世界經濟特徵 | 西
唐虞世
康君
譯 |
| 關於老子孔子思想問題的論爭 | 回頭是岸
不得也哥哥 | 李
季
伯 |
| 『旅途隨筆(自重慶到上海)』
勝利』在珠江(廣州通訊)
補白：失掉『紳士風度』的舌戰 | 英國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
英國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續)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續) | 冰夷編譯
E.C.考特威爾著·朱維基譯
李毓鏞
謝少翁
蘇閑
劉朝真 |
| 編輯餘談 | 大時代的小船(小說) | |

論文藝復興時代西班牙的戲劇

冰夷編譯

一 西班牙的「黃金時代」

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之間的西班牙戲劇，在歐洲戲劇史上，尤其是巴洛哥時代的歐洲戲劇史上，曾經起過很重大的作用。假使說，文藝復興時代戲劇的基本形式是在意大利形成的（古典主義的喜劇和悲劇，*commedia dell'arte* 假面喜劇），那末形成巴洛哥時代戲劇的過程在英吉利和西班牙所達到的成就特別興盛。巴洛哥時代歐洲最偉大的劇作家是卡爾德龍（P. Calderon de la Barca 1600—61）和莎士比亞。

西班牙戲劇之開始興盛，是和西班牙國內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極度高漲的時期相一致的。絕對專制主義在西班牙之發生和鞏固，比了歐洲其他各國要早，這個過程是在西班牙人向摩爾人（Moors 或 Moors）進行奪取比利牛斯半島（Pyrenees）霸權的長期鬥爭中形成的。大封建主拒絕把政權集中到漫無限制的專制君主的手掌中去，新的政權就和這些大封建主進行殘酷的鬥爭。新政權公開地站在下層貴族（hidalgo）、市民、有時候甚至於農民方面去。他們竭力利用農民和手藝工人的暴動來對抗大地主和有錢的市民。不過，專制君主政府剝奪了封建領主們的政權，却沒有剝奪去他們的許多社會經濟特權；所以在封建制度破滅之後，他們在國內經濟和文化方面仍舊繼續表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絕對專制主義的凱旋是表示那在商品經濟形式的社會生活的發展中有着利害關係的社會階層的勝利。的確，絕對專制主義增強的時代正是西班牙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光輝燦爛的時代。這都可以把國內工業的高漲和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地理上的發現等來作明證。當時的地理上的發現正是比利牛斯半島各國擴展貿易的結果。西班牙佔領了美洲的大部份（幾乎南美洲全部，中美洲大部），這些新地方成爲西班牙在十六世紀下半葉中擴展得特別廣大的掠奪榨取的目標，而且也成爲那由於出現新的廣大市場而感到顯著繁榮的祖國工業產品的銷售地。但是最主要的是——美洲本是取用不竭的貴金屬的

泉源，十六世紀初葉，美洲的金屬就已經大量流到本國去。這一切都使國內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力量得到了極大的擴張。

在增強絕對專制主義的過程中，教會所起的作用很大。國王的政府是把教會當作官僚政治機構那樣的倚重的，它建立了脫離國王而獨斷獨行的政治司法機關——『最神聖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ción）。宗教裁判所向社會和專制政治制度的一切敵人鬥爭，有力地促進了國王政權的力量。

西班牙，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上半葉，發展了光芒萬丈的藝術，在歐洲的文藝和繪畫的歷史上平添了許多傑出的名字。這就是那因塞萬提斯（Cervantes ●），羅普·德·魏伽（Lope de Vega），卡爾德龍，穆里利奧（Murillo ●），葛萊阿（El Greco ●）和維拉斯格斯（Velasquez ●）等人文作品而著的所謂『黃金時代』的西班牙藝術。不過這種繁榮沒有能够維持多久。源源不斷地流來的金銀使西班牙成爲多得不可思議的財富的蓄水池，同時一方面却也摧折着國家的經濟力。過多的貴金屬促成了價格的革命。黃金的價格暴落，商品的價格激漲。這種局勢對於西班牙工業的反映頗爲悽慘，西班牙的工業受着外來的比較便宜的商品的壓迫而不可抗拒地停滯起來。資金大量流到國外去，國家和這種走漏鬥爭也毫無結果。十七世紀時，西班牙的工業幾乎完全破產，而荷蘭，英吉利和法蘭西等國的工業，由於受了西班牙黃金的孕育而激急發展了。然而西班牙仍舊繼續不斷的鑄造貴金屬，使國家的危機更其迫切。西班牙向和她競爭的鄰國頻作讓步，逐漸逐漸地失去自衛和報復。

● 就是現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所在的地方。

● 加特力教會中所設立的警察裁判機關，專以極度殘酷的手段向教會的敵人進行鬥爭和報復。

● (1547—1616) 西班牙小說家，以『唐·吉訶德』(Don Quixote) 一書著名。

● (1613—82) 西班牙畫家。

● (1550—1614) 西班牙畫家。

● (1599—1660) 西班牙畫家。

己的殖民地，因此她的政治和經濟的力量受到了澈底的損害。到十七世紀末葉，西班牙成爲一個二等國家，他在歐洲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壽終正寢了。

一 西班牙戲劇的內容

這一個時代西班牙的社會關係之最好的表現，無疑地是『黃金時代』西班牙文學的戲劇作品。「黃金時代」的最初十年，正是國家經濟力量高漲的時代，而最後十年則是和不斷增長的不景氣時期相結合的。爲了理解那向羣衆表明國家境遇的全部意義的戲劇所起的作用之大，必需了解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上半葉時的西班牙。一方面是萬花筒似變幻無窮的緊張有力的生活，黃金從新殖民地源源而來，像是變化萬千的賭博，影響所及，不可能的成爲可能，做不到的成爲做得到，另外一方面是限制個人活動和事業之堅不可摧的國家和宗教的制度，——這一切都需要在相應的文學形式中得到表現。欺詐小說和戲劇([comedia])——那總是由三幕([Jornadas])組成和以韻文寫的西班牙劇本的總稱，在表現西班牙這種狂暴的、充滿着矛盾的社會生活方面是具有同等價值的，西班牙戲劇的特點乃是（複雜到極點的糾紛），非常有力的發展，而且傾向於激烈的對比。

西班牙戲劇的主人公是 hidalgo，貧窮而高傲的貴族，他們的基本的資產是披肩和劍，他們願意爲了自己的榮譽而鬥爭到流盡最後一滴血，他們是在一幅五花八門的景象的舞台上，祇有他們——hidalgo——可以在戲劇鬥爭的過程中展開自己的精神財產。是的，劇中有一種平行的糾紛好像作爲是對於人民的讓步，參加這種糾紛的有：gracioso（僕人）——丑角([harlequin]),通常是描寫成怯懦而貪欲的傢伙來和那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 hidalgo 相對照的），還有是市民，也常常有農民。這糾紛差不多完全是拷貝那祇有貴族參加的主要的糾紛的。因爲兩種糾紛幾乎是按着同一個計劃展開和得到完全相同的解決，所以那一個平行的糾紛，由於把人民和貴族的個人的命運放在同等的地位之上的緣故，使下層觀眾得到相當的滿足。不過不能忽視這一點，第二個平行的糾紛是從屬於第一個糾紛和處在另外一個貶低的地位之上的，所以階級制度的社會關係沒有受到破壞，而且是保全着，絲毫沒有受到損害。以農民爲劇中主要人物的劇本的基本目的是要表示人民和國王之間的諸和一致（羅普·德·魏伽的『羊泉』和『最好的法官是國王』是這種戲

劇的最鮮明的模範）。Hidalgo 非但是西班牙俗生活戲劇的主人公（就是所謂『袍劍喜劇』([Comedia de capa y espada])——這是因該種戲劇的主人公——貴族——的服裝而得名。）而且也是歷史劇，英雄劇和宗教劇（autos sacramentales）的主人公。凡是以貴族爲劇中人物的地方，他們總是西班牙 hidalgo 的準確的拷貝，他們有着 hidalgo 所有的一切特性——榮譽的崇拜，宗教信仰的熱狂和對於國王的忠心。在小貴族的形象中，曝露了『黃金時代』西班牙戲劇的社會本質，所以十六——十七世紀戲劇文學中的主人公之會落在 hidalgo 身上，我們是不必驚奇的。十六世紀末葉，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已經趨向衰微，小貴族和資產階級在西班牙社會中佔據着同樣顯要的地位。專制政治在向封建領主或者和那不止一次地企圖破壞國家政治制度的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時候，是把小貴族作爲依憑的力量的。小貴族在西班牙擴展殖民地的事業中的地位很重大，他們是人力資源的主要的供應者，那些使新大陸的最富庶的地域歸屬西班牙統治的 conquistador 和大胆的侵略者的民兵是從小貴族中募集起來的。Hidalgo 寧願從事（與公開的掠奪有着非常密切關係的）戰爭而不願從事定居的農作（有時候小貴族由於沒有自己的領地而無法從事農作），所以他們非但能够成爲王位和教會的武裝支柱，而且也成爲國家經濟威力的創造者。他們的廣大的聲望是由此而來的，十六——十五世紀西班牙戲劇之所以把 hidalgo 拾得這樣高，也是由此而來的。

二 初期的西班牙戲劇

1. 西班牙宮廷戲劇

十六世紀時，在和摩爾人進行的鬥爭之外，添上了向新教（Protestantism）及那秘密傳佈到西班牙來的路德的作品進行的鬥爭。宗教裁判所對付戲劇的態度很嚴厲，它阻止民間表演的發展。像別處一樣，教會也竭力消滅殘餘的古代戲劇和利用愛看表演的熱情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它先把戲劇的成分放進宗教的禮拜儀式中去，後來則在教會領域之外去推進神秘劇的發展。

世俗的戲劇表演是在十五世紀出現的。

當時有一部叫『賽萊斯丁娜』的戲曲得到了很大的成功。這幾乎是一部對

話形式的小說，全劇分為二十齣。內容是戀愛故事：貴族青年卡里斯多愛上了少女梅麗貝，但是梅麗貝不愛他。有一個可怕的老太婆叫賽萊斯丁娜的，能配合秘密的愛液，他就靠了她的幫助，得到了梅麗貝。這一部戲曲充滿着血腥氣的罪行和恐怖，結局幾乎所有的劇中人物全部死亡。這一個劇本後來曾經引起過許多人的摹倣。

十五世紀末葉和十六世紀初葉，出現了恩西那的幾部宗教性和世俗性的劇本，於一四九二年開始在卡斯蒂里亞（Castilla）公開演出。這些劇本，形式粗陋，內容乏味，登場人物很少（有時不到二三人），但是頗風行。劇中含有當時非常流行的民間表演的成分。這些劇本是供宮廷貴族觀看取樂的。戲劇當時是一種娛樂，從這些早期的戲劇作品的內容上看來，觀眾的趣味並不怎麼講究。

這一型宮廷戲劇的作家中，除了恩西那之外，還有維生特和那哈羅也是很出名的。這種戲劇沒有在西班牙發展成像法蘭西和意大利兩國那樣華麗燦爛的藝術，不久它讓位給了真正的民間的西班牙戲劇。宗教裁判所促使宮廷世俗戲劇衰落的力量頗為不少（當時曾經頒布過一個禁演劇目，有大量的劇本都被歸入這一個目錄中去）。這種戲劇藝術完全沒有受到廣大人民羣衆的注意。

2. 羅普·德·盧埃達

真正的西班牙戲劇史應該從羅普·德·盧埃達出現的時候開始。羅普·德·盧埃達（十六世紀初葉時生）是塞維里亞（Sevilla）地方的一個手藝工人，他活動的時代是在十六世紀中葉。他不是在宮廷裏，而是在廣場上人民中間表演他那些取材於日常生活的渾樸而大胆的小戲的。他戲中所描寫的是些饕餮、騙子之類的人物的冒險事業和詭計狡謀。

盧埃達是從一個城市到一個城市地浪遊的；他在他自己的小戲班子裏一人身兼班主、編劇和優伶等職。這一類流浪戲班子，有時候是由二三個優伶組成的，他們在各城市村鎮流浪表演，所取甚微。但是其中有許多優伶對於自己的事業非常熱心，他們爲了藝術，情願忍受一切艱苦。他們常常挨餓，有時露天泊宿，可是其中却也不乏偉大的戲劇藝術巨匠。羅普·德·盧埃達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藝術曾經爲塞萬提斯擊節稱賞。塞萬提斯在他的劇本集的序言中描寫過他的戲班子。這些戲班子中，後來產生了比較大的戲劇企業

組織，就在各大城市停留下來不流浪了。

這些戲班子的劇目的特點怎樣呢？德·盧埃達的劇本在他死後出版，還是很成功，從他的劇本上看來，初期西班牙戲劇的特徵是複雜的糾紛，聰明的布局，改裝易眼和頂替冒名的冒險事業，拐騙掠奪，忍俊不禁的暢快的歡樂之情——這就是西班牙戲劇在它初步的發展中的特徵。



西班牙戲劇的奠基者要算是托萊斯·那阿洛（一五三一年死）和羅普·德·盧埃達。羅普·德·魏伽論德·盧埃達時曾說：『喜劇是由盧埃達開始的。他的名字，許多現在活着的人也都聽見過的。』羅普·德·盧埃達是一個流浪戲班子的領袖，而且自己也是有天分的優伶。照當時的習俗，他是被稱爲喜劇的『作者』的（autor de comedias，本來是要在戲班子裏一人身兼班主、戲子和編劇三職的人才能有這種稱謂。後來，autor這一個字却一變而成為編劇一人專門稱呼了）。他的Pasos（一種描寫世俗生活的小戲）曾經在西班牙戲劇史上起過很大的作用，參加Pasos的人物完全是下層民衆。Pasos的基本人物是 bobo——這是古代牧歌（eclogue）中牧人的進化的形象和十七世紀喜劇之gracioso（僕人）的先驅者。從Pasos中產生了entre-meses（插戲，即intermedium），塞萬提斯後來把它提高發展成戲劇的形式（『薩拉孟的大學生』等等）。

四 羅普·德·魏伽

假使說，那阿洛和盧埃達是奠定西班牙民族戲劇的基礎的，那末按時間說，第一個把這戲劇提高到非常的高度的是西班牙的偉大劇作家羅普·德·魏伽（Lope de Vega）（五六二——一六三五）。

羅普·德·魏伽的生世的開始總是那在當時認爲非常重要的資料：生身過千辛萬苦的生活試煉和白手成家的人物的形象。他經歷過許多冒險的生活、命運的打擊、糾紛和曲折，最後才達到空前的榮譽。他於十一歲時開始寫作，他是世界上最產的作家，寫過劇本不下兩千部之多，其中有幾百部沒作有流傳下來。

羅普·德·魏伽是以非常多樣的風格寫作的；他善於以自己的劇本去取

悅貴族，假使宗教裁判所要求的話，他就寫宗教風格的東西。但是無論在什麼地方他總管仍舊還是他自己。他沒有給地主貴族的世界觀和宗教的情感所浸淫過。這是一個能巧妙地利用一切力量來服從自己目的的征服者。羅普·德·魏伽是曝露貴族特權的偉大作家龐馬舍（P. de Beaumarchais 1732—1799）的先驅者，他最早表現那種主動、才智和狡謀的精神，這種一切都需要的精神。把一切事實和現象當作應該重視，應該克服和有時應該迴避的現實。他描寫一切社會階層，從國王貴族起，直到下層社會為止。所以至今學術界還不能確切斷定他的劇本應該歸入那一類。

不過假使要在羅普·德·魏伽的劇本中探究他的創作的世界觀，最正確是應該從分析他那一部份所謂『袍劍』喜劇開始。這種樣式，它可以讓作者把崇高性去和庸俗性結合在一起，把悽涼性與恐怖性去和滑稽性結合在一起，可以讓他在宮廷貴族之旁同時放下層社會的人物登場。

這些喜劇的主題普通總是貴族的戀愛故事、糾紛、決鬥、謀殺等等。由於在主要的劇情中插入僕人和丫鬟們的糾紛，還有常常是諷刺貴族們的冒險事蹟的平行的戲劇，所以上述種種主題是千頭萬緒地繁複糾纏到極點的。這些劇本充滿着行動和生活，包羅着完全而質樸的人的關係，羅普·德·魏伽的才華在這裏得到了極大的表現。

然而假使爲了適應需要而寫作的話，這位有名的劇作家也不畏縮。我們上面已經指出，歷史的事件促成了絕對專制主義的勝利和獨立封建領主的破滅。在這一個鬥爭中，布爾喬亞是站在王政方面的，在把王政理想化這一方面，羅普·德·魏伽也是那一個向上的階級的情緒的表現者。

羅普·德·魏伽的英雄悲劇的傑作之一——『塞維里亞之星』——把那種擁護王政的崇拜觀念表現得非常透澈。

國王桑卓愛上塔貝拉的妹妹愛斯苔拉。但是愛斯苔拉却已是那以出征摩爾人的軍功享盛名的奧蒂斯的未婚妻。國王賄賂愛斯苔拉的女僕，企圖接近她，因此受到了塔貝拉的一頓侮辱。於是國王把奧蒂斯召來，命令他去殺死他的敵人。奧蒂斯的心中起了兩種感情之間的鬥爭——一方面是對於他的未婚妻的愛情和對於塔貝拉的友誼，另一方面是效忠國王的觀念。結果後者佔了上風，奧蒂斯完成了國王的命令。當塔貝拉受了致命傷倒下的時候，奧蒂斯撲在他的胸上。塔貝拉猜到了致他死命的真正的敵人。在法庭上，奧蒂斯倔強地沒有說出教唆殺人的主謀犯的名字，而那怯懦的國王却保持着緘默。

奧蒂斯被判處死刑，到這一個時候，國王才揭露真相；但是擁護王政的效忠觀念之深入人心一至於此，甚至於在這種場合，塞維里亞地方的人民也不責備國王：他的意志是神聖的，既然他要塔貝拉死，塔貝拉就不得不死。奧蒂斯獲釋了，但是愛斯苔拉不願意嫁給她弟兄的兇手，雖然她還是很愛他。在王政向摩爾人和封建領主們鬥爭時發揚的崇拜絕對專制主義的觀念就是如此的。

布爾喬亞和跟隨着它的各階級的情緒在羅普·德·魏伽的另外一個有名

的悲劇『福恩特·奧維洪那』中表現得還要鮮明。這一個悲劇描寫的是農民反抗暴虐而荒淫的封建地主的暴動。末了，暴動以迫害者被殺和他的財產被毀作結。但是反抗封建領主的狂怒的農民忠誠地迎接那來裁判他們的國王：他們祇要一個主人——君主，他們不要任何別的主人。他們請求驅逐一切的貴族，由國王親自來統治人民。

在這兩個劇本中，反映着生長中的專制君主的歷史過程，封建領主和布爾喬亞都成爲他的馴順的忠僕，由於上述歷史事蹟的過程，各種不同的社會階級都同樣的歸依於他了。

但是就是在英雄主義的劇本中，甚至於像這比別的更使人想起高乃依（P. Corneille 1638—1684）的古典主義悲劇的『塞維里亞之星』的劇本中，羅普·德·魏伽仍舊是一個自由的作家，他常常破壞規律，而最主要的，是他加用丑角，破壞總的崇高的悲劇形式，他在各種人物的口中加進插科打渾之類的諷刺，髮髻是在曝露那崇高的騎士風的情感的虛偽性，髮髻以健全的思想、謹嚴的見解、粗鄙的唯物論等等的特點來和這種情感對壘，而這些特點就是那些力量逐漸增強的大小布爾喬亞們帶來更替那奄奄欲斃的騎士的光榮和貴族的高傲等等的觀念的。

羅普·德·魏伽對於那一個機警聰明足智多謀的壞蛋賦予了特別深遠的意義，這就是在西班牙喜劇中稱做『gracioso』（僕人）的那一個人物。這個人物在他手裏是一個廣大人民羣衆的世界觀的獨特的表現者。譬如說，在『塞維里亞之星』中，這一個『gracioso』的腳色是由奧蒂斯的僕人克拉林陀担任的。當他的主人受難的時候，在最悽慘的場面中，爲了討好，他摹倣主人的行爲，取悅觀眾。所以，甚至於在反映宮廷社會的世界和絕對專制主義的光華的劇本中，羅普·德·魏伽，——也許他自己也沒有覺得，——他同時也是封建主義專制君主權威所依賴的那種觀念的破壞者。

控制各階級的國王倒底仍舊是地主貴族的國王，所以羅普·德·魏伽雖然在宮廷裏很得寵，但是菲里普二世(Philip II)却並不贊許他的劇本，他的看法很公允，他說，他的劇本會貶低王政的威望。從這一個事實中，可以看出戲劇的煽動力量之强大。爲國王假目舉行優美的戲劇表演的宮廷詩人，在他的創作的本質中，也不免要露出別的階級負着歷史使命來摧毀那接近於國王的封建主義文化的深遠的志向。所以那狡滑而有遠見的政治家菲里普一世的嗅覺使他在西班牙戲劇中辨別出一種外來的、甚至於敵對的成分。因爲西班牙戲劇剛和法蘭西古典主義相反，它不是有機地從宮廷圈子中生長起來，而是從廣大民衆的需要中產生出來的。

但是，西班牙戲劇，除了絕對專制主義之外，必需還要估計到另外一個強大的力量——這就教會。我們知道，西班牙教會的偏執，由於向『異端』進行殘酷鬥爭之故，達到了非同小可的力量。教會對於戲劇抱着非常懷疑的態度，尤其是對於羅普·德·魏伽的劇本。因爲他的劇本的內容儘是些戀愛故事，決鬥，糾紛和不雅的說笑，這對於基督教的教義頗不適宜。一五八八年，國王頒布了一個禁演世俗劇本的法令。因此瑪德里地方的公共劇場幾乎關閉了近兩年。

在這種地方，羅普·德·魏伽也顯出是一個善於適應時勢的不屈不撓的藝術家。他開始埋頭寫作宗教劇，材料完全取自聖經。他的宗教劇，假使說不大富有詩意和不像他自己的喜劇，那末可以當做是古老的神祕劇，糾紛這樣的複雜，假使除去了宗教性的部份，這些劇本簡直可以歸入那剛剛遭禁的時髦的俗劇一類。當他描寫托拜阿的故事或者雅各的女兒狄娜被誘拐等事蹟的時候，這些場面中所表現的西班牙的習俗和觀念比了古代猶太人的要多。聖徒們的神蹟和受難事蹟變成爲迷人的故事，令人想到像是西班牙情侶的糾紛，或者是古代西班牙英雄的功業，有時候這種神蹟和受難事蹟描寫成頗爲輕佻的形式。聖·哲羅姆起初出場時是一個愉快的貴族青年，後來成爲出色地戰勝撒旦的聖徒。這些劇本都是得到教會的保護的，非但公開演出，而且甚至於也在修道院和別的教堂裏演出。

羅普·德·魏伽時代西班牙戲劇觀眾之間的趣味很不一致。羅普·德·

魏伽是感覺到自己和他的觀眾之間的這種關係的，正像當時大多數劇作家一樣。他的力量是在於布局的藝術。一切都服從於吸引人的目的。劇中人物非常類似意大利的民間喜劇，建立在永久典型化的人物形象之上。Primer

galan——男主人公——一切都有，戀愛、榮譽和妒忌；Dama或者女主人公——也充滿着不少戀愛和妬忌的成分，不過比較多的是大胆而不小心的女子，還有弟兄，或者假使不是弟兄，那末是Barba，即老人和父親，這兩種人物在女主人公的房子裏發現男情人的時候是要血流滿台的，——這些人物非但可以在俗劇中經常看見，而且也常常可以在宗教劇中遇到。這些人物是當作一種固定的人物，形形色色的劇情和它的形形色色的激變(peripecteia)就在這些固定人物的四周活動。

羅普·德·魏伽是規律的敵人。他着手寫劇本時，據他自己所說，他鎖閉一切規律，把特倫西趕出房間。他是追隨着『那些追求羣衆的擁護的人們』而走的，『應該附和羣衆的無知，因爲他們對此是付代價的。』他雖然尊重古典作家，然而一面却也維護着獨特的西班牙戲劇的思想。他認爲，無論古代作家的優點怎麼多，他們對於西班牙可能會成爲格格不入和沒有用處的，西班牙的歷史才是最可感謝的戲劇材料。

但是，在一切偉大劇作家中最接近民衆的羅普·德·魏伽的創作中，也可以捉摸到兩種戲劇形式的要素的衝突。這兩種形式是封建主義和布爾喬亞這兩種階級文化的鬥爭的反映，這在宮廷劇場中和在城市的公共劇場中都有得表現。這兩大支流幾乎一直可以追蹤到我們這一個時代，雖然在新歷史的過程中，它們常常合流在一起，城市劇場在它的建築方面和劇目方面從宮廷劇場方面接受過來的東西很多，同時街頭的市聲也侵入到宮廷劇場的空氣中去。宮廷劇場是和古典主義的復興和人文主義者們的創作有關的，那時候，城市公共劇場却向民衆的表演和中世紀神祕劇方面發展。羅普·德·魏伽的一切創作都和新的城市觀衆保持着有機的聯繫，但是像我們所看見，他對於宗教和封建主義的文化、宮廷的趣味和甚至於古典主義都有着貢獻。

在所謂文藝復興時代，幾乎一切傑出的劇作家，我們都可以看見他們有這兩種迥不相同的風格相結合在一起。劇作家們所創作的劇本中，有時候自覺地，有時候不自覺地，總有着同時想供給『高貴的』觀衆和塞滿在院子裏的平民羣衆的材料。



★

★

羅普·德·魏伽的創作力非常旺盛，除了插戲不算，他寫過近一千八百部『喜劇』和四百部 autos(即act，起初時候，任何戲劇作品都用這個名稱，在羅普·德·魏伽和在他之後的時代，autos 是當作宗教劇性質的劇本來理解)

解的。這一類劇本的人物有馬利亞、約瑟、東方的博士、聖徒等等）。但是羅普·德·魏伽非但是出色的劇作家，而且也是西班牙戲劇的理論家，是那具有重大的戲劇宣言性質的『我們時代喜劇創作的新藝術』(*Arte nuevo de hacer comedias en este tiempo*)的作者。

在這一篇論文中，羅普·德·魏伽創立了他『黃金時代』西班牙文學所特有的戲劇藝術的觀點。他認為，戲劇的目的是『重現人世間的衆生相和描繪時代的風習』，這種話出諸於西班牙俗生活戲劇的代表作家之口，那是很自然的。他逗留於那在文藝復興時代曾經是非常現實的問題——關於當時劇作家對於古代戲劇理論的態度問題。羅普·德·魏伽一面敬重亞里斯多德，但是一面却主張創作要有民族的獨立性，而且創作應該由民族和時代的世界觀來決定。他創立巴洛哥時代所特有的理論：把喜劇性和悲劇性，高級性和低級性混合在一起。這就是他在寫作實踐中所奉行的理論。在這一點上，正像在其他許多地方一樣，他是十六——十七世紀西班牙戲劇的典型代表。譬如說，他認為，劇作家應該把自己的主要的注意力集中於展開和結局部份，結局決不要放在最後一場戲之前，它應該儘力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去打動觀眾。『糾紛的結』，他說，『應該展延下去，應該從劇本開始的時候一直緊密地展延到最最末了。』西班牙的劇作家們正就是這樣做的：他們的糾紛非常複雜，複雜到常常使觀眾無法理清楚各個線索，但是却很巧妙地在結束的最後一場戲中解決了。

至於選擇題材，羅普·德·魏伽仍舊是忠於他自己的小貴族的本質的。他引人注意那以榮譽事業和英雄行為爲中心的歷史。在羅普·德·魏伽及其同時代人的作品中，英雄行為常常是傾向着那爲國王和教會服役的河床的，西班牙的偉大豪傑就是集中在這一個形象之中似的（羅普·德·魏伽的『亞美利加的發現』和路易斯·德·葛華拉(1579—1644)的〔*Mas peso el Rey que la sangre*〕等等）。他們堅決地制立道德的法度，單獨的個人的行為假使是受着制定的道德法度的約束的，那末就不讓他滅亡，假使他想損毀這種約束，就給他註定不可避免的滅亡的命運。羅普·德·魏伽的 *hidalgo* 無論在什麼場合，總是維護那幫他們克服周圍障礙所必需的道德觀念的。碰到描寫這種情形的地方，就顯出羅普·德·魏伽的技巧功夫之不可及。環繞在劇中人物周圍的環境愈複雜，愈糾纏，證明道德法度之堅固的安然的結束就愈可貴，愈有價值；道德法度的勝利似乎就是表示絕對專制主義西班牙的鞏固和

強大。這就是爲什麼西班牙喜劇的特點是糾紛的要素而極少人物個性的要素的道理。所以劇作家們特別愛好傳統的假面人物；*galón*——男情人，*dama*——女情人，*vejete* 丑，或老人，*barba*——中老年人，*gracioso*——小丑腳色的僕人等等。

羅普·德·魏伽以及和他同時代的作家們的戲劇題材的軸心大多是戀愛故事。在戀愛故事的基礎上，劇作家們最容易表現出他們所描寫的人物的鬥爭和成就。一對情侶的戀愛，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是在一定的家族和社會的禮教所給予他們的鎖閉的領域之中展開的。家門的榮譽——封建時代保留下來的地主貴族的這種最偉大的精神珍寶，還有效忠國王的觀念和狂熱的宗教信仰等等，——這就是那企圖親手建立自己個人福祉的各個個人所包圍着的這一齒形城堡。以引導主人公實現這種任務爲目的的戲劇性的鬥爭，創造出許許多多不同的境遇 (*situation*)。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吉利戲劇也是以這許多境遇爲基礎，造成許多悲劇性的衝突，這種種衝突結果大多使主人公走上毀滅之路。

西班牙戲劇巧妙地把個人的志向導入合法性和道德法度的河床：在戀愛中獲得最高表現的像海一樣動盪不安的人漸漸安靜下來，爲封建宗教的道德所救平。交織的糾紛結果最後收集成兩家庭的難解的結。假使說，主人公的高度的情慾也正就表現在這種地方，那末也並不是表現在戀愛之中，而是表現在外在的範疇之中，表現在榮譽和騎士風的忠誠的範疇之中。戀愛和個人幸福，如果去和那支配一切的宗教觀念和絕對主義向個人所提出的最高要求作一比較，那就不足道了。*Hidalgo* 是能驅使自己的意志去服從這種宗教觀念和絕對主義的，不過這並不是出於外界環境的逼迫，而完全是出之於內心的自覺，他們認爲這是必需而應當的。所以命運會對他們如此寬大：他們這樣辛苦苦苦努力爭取的幸福，命運竟會給他們這末些，這原來是酬報他們自覺地抑平自己個人的地位的。這樣解決個人問題，就是小貴族文學的顯著的特點，因爲小貴族在他們的一切表現中都把自己的命運去和西班牙絕對主義的命運相連結在一起，所以他們是關心那維護新制度的道德之穩定和鞏固的。

這種思想，在這一個時代的第一個偉大劇作家卡爾德龍的劇作中達到了最完全的表現。

五 卡爾德龍

羅普·德·魏伽以及他的學生和同輩們，是在比較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中生活和創作的。在這一個時候，各式各樣的社會階層正在上下一致地協力參加鞏固絕對主義政權的基本的工作。所以他們是為人民羣衆的觀眾創造寫實主義的戲劇。西班牙戲劇的基本傾向是在廣大的社會背景上展開的，個人站在鬥爭的中心，個人的命運構成為劇情的基礎。這是充滿血液的戲劇，它在舞台上向人民說，什麼是他們最要緊和最有意義；這是向廣大社會階層說話的戲劇。宮廷中是不承認俗生活喜劇的，他們喜歡以神話為題材的盛大演出（所謂 *fiestas*），這種演出的主要的趣味是華麗的舞台面——漂亮的舞台裝置和音樂的伴奏使這種演出賦有了歌劇的形式。教會對於俗生活喜劇頗具戒心，它懼怕階級色彩龐雜的觀眾因之所產生的影響。

卡爾德龍對於戲劇的看法不同，他把抑制個性的原則拚命提高。在他從事創作的時候，正當四面八方有敵人來威脅西班牙所爭奪到的地位，王政和教會肩馳肩地向敵人進行堅決的搏鬥。卡爾德龍時代的西班牙宗教的專制性正恰好在意識上表現出絕對主義無力阻止西班牙經濟所蒙受的難以遏止的瓦解過程。阻止的企圖都沒有結果，因為政府當局以及依賴於它的教會無力消滅那產生經濟危機的原因。在無意義的壓制的路上找尋解救辦法之際，絕對主義收縮自己的社會根據地，以便能够向滋長不已的危機徹底進行順利的鬥爭。在這一個時候，在那和絕對主義有關係的地主貴族階層中，形成一種綜合的思想。這種綜合的思想，在巴洛哥時代，通過那含有這種思想特別多的卡爾德龍的創作，在歐洲許多國家中傳佈得非常廣泛。輕視現世和地上生活的觀念成為主導的思想。生活本身是由人類最大的罪孽所決定的（例如：卡爾德龍的《堅毅的親王》和《浮生若夢》），地上一切之所註定要滅亡，那不過是因為它是地上的緣故；人類唯一的解救之道是宗教，是那作為大赦的象徵的十字架（卡爾德龍的《十字架崇拜》，《靈異的聖徒》等等）。那祈求上帝拯救於污穢之中的親王的形象（卡爾德龍的《堅毅的親王》）成為這種揀棄人世間一切東西的感覺之最高表現。

像他的先驅者一樣，卡爾德龍繼續掘取民間的和歷史的題材，同時還有世俗生活的材料，但是他用另外一種方法把這些題材組織起來，使它們發出另外一種聲音。他努力在實生活旁邊並排築造理想化的生命，這種生活是建

立在那為了教會和國王的光榮而作嚴肅的自我犧牲的原則之上的。因此，忠於教會和國王的貴族的形象，在卡爾德龍的作品中，進化成不怕爲了『真實的』宗教和道德承受任何苦難的貴族殉難者（《堅毅的親王》）。這種構成卡爾德龍許多劇本的特殊形相的犧牲精神上升爲十七世紀 *hidalgo* 的世界觀，他們那時候願意在可怕的危機時代以任何代價來支持絕對主義國家的基礎，因爲假使這基礎崩潰，就要威脅到他們的安逸的生活了。

和戲劇題材一樣，卡爾德龍戲劇的舞台形式和羅普·德·魏伽及其同輩的寫實主義戲劇很少有共通點。劇場不再是給羣衆觀看表演的地方，它成爲聚集在國王宮廷周圍的狹隘的貴族階層的設備了。聖經題材的劇本（autos sacramentales）是這劇場的最出色的表現，而這一類劇本的最偉大的巨匠仍舊是卡爾德龍（他寫過一百多部 autos）。寫實主義戲劇的作家們同時也寫作宗教劇，不過他們這些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是加特力教會上演戲劇作品時的客觀條件的結果。在卡爾德龍戲劇中，autos 是以有機的要素的地位參加進去的，不過有時候，在作爲通常所了解的意義來解釋的 *comedia*（喜劇）和宗教的表演很難分清楚：兩者所取的題材是相同的，而且在宗教劇中出現的一的寓意人物和卡爾德龍寓意劇中所充滿的人物的象徵有着密切的關係。比方說，在『毒與抗毒』一劇中出場的人物有：以王女的形象來表現的人性，還有死神，四季之神——戴着花冠的春，帶着穗冠的夏，帶着一籃果子的秋，帶着一杯水的冬——等等。『浮生若夢』這一類劇本的名稱使人會想起卡爾德龍對此另外一個比較有名的劇本，浮生若夢中的人物有撒旦（惡魔），罪孽，理性，都有着朝聖香客風貌的智慧，自然界的四原素：水，土，風，火等等。對於這一類人物，同時對於那可以讓劇中加進靈異成份的舞台面，卡爾德龍對此都有著特殊的癖好，巴洛哥時代的劇作家們對於這一點的評價是很高的；以寫作戲劇來頌揚加特力教會的神蹟的卡爾德龍，他自己對於這種舞台面也認爲是有着重大意義的。

與羅普·德·魏伽同時代而敵對的偉大劇作家卡爾德龍，比羅普·德·魏伽更接近宮廷，而且更技巧。他善作高雅的宮廷風格的劇本，他把君主理想化，表現的是當時絕對主義思想所鼓勵的那種虔敬情感。

但是和羅普·德·魏伽一樣，卡爾德龍自己也是嘲笑這種風格的，他不自覺地或者自覺地參加完成那形成新的布爾喬亞意識和破壞封建觀念的西班牙

牙戲劇的歷史使命。

在卡爾德龍的創作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顧及『高貴』觀眾的格調和那時常不顧一切規矩法則來遷就羣衆的輕佻的打趣相結合在一起。——這種結合也就是莎士比亞所有的特點，而且凡是在兩種文化鬥爭之中，宮廷戲劇沒有像在法蘭西和意大利那樣戰勝而把霸權讓渡給城市布爾喬亞戲劇的地方的劇作家都有這種特徵。

卡爾德龍的宗教劇是追隨可愛的民間表演的傳統的，它保留着崇高性和輕佻性，悲劇性和趣劇性等結合在一起的傳統，保留着那在中世紀神秘劇中所特具的宗教性和趣劇性的混合。

卡爾德龍的出色的宗教劇中有一部叫『聖·巴特里克的煉獄』的，描寫的是殉教者聖·巴特里克的神蹟。他使行為不檢的罪人改宗基督教，把以國王爲首的整個宮廷完全打入陰世中去。這一個以宗教爲題材的劇本結合着戀愛的糾紛和許多挑撥教徒的情節。其中有一個以 gracioso 脚色的地位出場的愛尼奧。便是那被聖·巴特里克搭救了帶進煉獄的不信耶教的罪人的僕人。這僕人拒絕跟主人去。『我看』，他說，『沒有人會在僕人護送之下進地獄的吧？我情願回到自己鄉下去，那邊我過的日子並不寂寞。假使我得救必須有鬼，那末我有我的老婆就够了。』諸如此類的對白之破壞卡爾德龍在自己宗教劇中企圖建立的宗教情緒，是不難明白的。世俗的原素，輕佻而不雅的場面勝過於聖像和神蹟，勝過於神話和英雄的主題，而這些主題却就是卡爾德龍爲之發揚的。

六 羅普·德·魏伽與卡爾德龍的後繼者 及他們的影響

這兩個最偉大的西班牙劇作家，在他們的祖國，都有着無數的後繼者和模倣者。羅普·德·魏伽派的最大的代表作家是紀里英·德·卡斯特羅 (Guillen de Castro, 1569-1631)，蒂爾索·德·莫林那 (Tirso de Molina, 1571-1648)，阿拉爾貢 (Juan Ruiz de Alarcón y Mendaza, 1581?-1639) 和葛華拉，卡爾德龍派的代表作家是羅哈斯·索里利亞 (Francisco de Rojas Zorrilla, 1607-1648) 和莫萊托·伊·卡巴尼亞 (Agustín Moreto y Cabana, 1618-1669)。

1. 羅普·德·魏伽的後繼者

紀里英·德·卡斯特羅的最大傑作是一部歷史劇。該劇描寫民間羅曼斯所歌頌的傳說中的西德的青年時代和他的豐功偉業。這作品分兩部，第一部是『西德的青年時代』(Las mocedades del Cid)，第二部是(Hazanas del Cid)。蒂爾索·德·莫里那是因他那描寫唐璜 (Don Juan) 的喜劇(El burlador de Sevilla)而享盛名的。他在處理非常複雜的糾紛中顯露出了他的特殊的技能（這可以看他的有名的喜劇『綠椅子唐·希爾』），這劇本是用易服化裝和誤認等等西班牙劇作家們愛用的方法寫的）。蒂爾索·德·莫里那在許多地方是接近羅普·德·魏伽的，雖然在他那些充滿緊張情緒的宗教劇（描寫一連串的靈異等等的戲劇）中，他是代表卡爾德龍的觀念形態的。阿拉爾貢所作的許多喜劇是帶着純倫理的觀點的，後來高乃依和莫里哀很喜歡倣這一點（『慳吝人』，『厭世者』，『塔邱夫』[一譯『偽君子』]）。他那些描寫人物性格的喜劇是以一定的道德的主題來寫的（例如：[La verdad scspec hesa] 之反對撒謊，[Las paredes oyen] 之反對誹謗，[La prueba de los promesas] 之反對忘恩負義）。

2. 卡爾德龍的後繼者

代表從羅普·德·魏伽戲劇轉移到卡爾德龍戲劇的過渡的是羅哈斯·索里利亞的創作。他的作品的根源還是走向羅普·德·魏伽寫實主義戲劇的光明樂天的世界觀的，但是悲劇性的萌芽已經開始突出來，這使他和卡爾德龍的戲劇接近了。羅哈斯的最重要的作品是喜劇『國王之外——沒有人』(Del'reyabajo, ninguno)，他在其中巧妙地發揮了貴族的榮譽和效忠國王等的主題，證明貴族在任何情形之下應該向自己的君主盡忠。莫萊托·伊·卡巴尼亞在描寫人物性格和人類情慾這方面是超過於他的先生卡爾德龍的。他的喜劇『以蔑視答覆蔑視』(El desdén con el desdén)引起了許多的摹倣（郭齊的[Laprincipessa filosofa]，莫里哀的[Princesse d'Elide]）。西

●西班牙民間傳統中的好色而善戰的英雄，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之間，常常爲各國作家取作文藝作品的題材。

西班牙戲劇藝術之光輝燦爛的時期，是以上述各作家以及他們無量數的巨匠的創作結束的，這一個時代的西班牙戲劇跟着西班牙政治經濟威力之完全消滅而完全凋落了。

3. 西班牙戲劇的影響

非常豐富的戲劇題材，有一個很長久的時期，使西班牙戲劇成爲取之不竭的寶藏，許多歐洲劇作家後來都從這寶藏之中汲取主題和題材。西班牙戲劇在五花八門的舞台形式中加強了那依憑在廣大社會基礎之上的節節勝利的絕對主義的思想。當絕對主義在文學形式中找尋自己表現的機會的時代，或者當那些關心於擁護和加強專制政權的各社會階層努力想表現他們反動傾向或者王政復古傾向的時代，西班牙戲劇是名副其實的模範。在王政復古時代，當莫萊托和羅普·德·魏伽與卡爾龍一樣地功成名遂的時候，西班牙戲劇在英吉利的影響表現得特別有力。有許多地方倣效西班牙宮廷風俗的法蘭西的專制政治，在它最繁榮的時代，爲了確定效忠國王和貴族榮譽的基礎，是利用西班牙戲劇的題材的。在伽爾第，梅萊，羅特魯，萊薩扎等等的倣效和改作之後，西班牙戲劇在庇埃·高乃依的身上找到了它的當之無愧的承繼人，因爲他根據紀里英·德·卡斯特洛的喜劇『希德的青年時代』創作了『西德』(Le Cid)。

七 「黃金時代」西班牙的劇場

至於西班牙劇場的組織史，那就是流浪優伶的劇場漸漸爲固定的劇場所排擠，同時舞台技術漸漸繁複，在宮廷舞台出現的時代達到了極度興隆的地步。奧格斯丁，羅哈斯在他一六〇一年作的小說『有趣的旅行』(El Viaje entretido) 中，根據參加的人數和移動的設備之不同，指出西班牙有七種不同的流浪戲班子。Bululu——這是獨個兒步行流浪的優伶。他知道一部戲和幾部 Loas(獨白的小戲)。他到一處地方，就召集當地的村民，站在覆轉合着的箱子上，獨個兒表演好幾個個人物，同時一面讀出註脚——『現在這一個，或者那一個上場，』『現在旦角道白如下』等等。得到一盆湯，四個銅元，那優伶就動身到別處去。Naque——這是由兩個流浪優伶組成的戲班子，他們能够表演幾部 autos sacramentales，兩三部 Loas，讀些 octavas (詩)。這種戲班子已經有了些舞台道具的影子：羊毛的鬍鬚，羯鼓(tambourine) 等等。Gangarilla——這是由三四個優伶組成的流浪戲班子，他們也會演些 autos，或者幾部 extremes(插戲)。以下漸漸比較複雜的是：embaleo——這是由五個優伶和一個歌女組成的戲班子，他們已經有一包

戲衣；garnacha——這是由五六個優伶組成的，貼配的且角由女伶和童伶擔任；biganga——就差不多有七個男伶，二個女伶，劇目有幾部喜劇，道具是裝成幾個箱子，由驛子搬運的；farandula 和 compaña——這已經是整整一個大戲班子了，劇目有十八部喜劇，行頭由車子搬運，出現的地點是富庶之區和市集所在了。

這些戲班子中最最大的班子，在十六世紀中葉，開始停在一處地方不動了；這些戲班子是由那稱爲 autor (作者) 的票主領導的。塞萬提斯在他一六一五年出版的劇本集的序言中，對於當時這些早期 [autors] 時代的舞台技術有着這樣的描寫：『在這一個時候，還沒有劇場的機關，還沒有描寫到摩爾人和基督教徒之間的決鬥。還沒有出現那種依靠了窗洞等方法從天而降的天使和聖徒之類的突然而來的人物。舞台是由四塊到六塊木板擋在四條放在四點角的四尺高的長樑之上搭成的。台上裝着毛絨的幕帷，用兩根繩子張着，幕後是優伶更衣之處；歌手也站在幕後，不用吉塔(guitar) 伴奏而歌唱古代的羅曼斯曲。』西班牙之開始有永久的劇場是在十六世紀下半葉的瑪德里(Madrid) 地方。這些劇場也是有院子而沒有觀眾廳的。平常總是利用後面那些堆木柴用的院子(patio) 來做劇場，塞萬提斯所講的原始的舞台就是建造在這地方。觀眾一部份站在院子裏，一部份在鄰接的小屋子裏和擋樓上的窗裏看下來。起初的時候，觀眾和優伶都沒有遮禦太陽和風雨的設備。後來舞台開始用頂蓋起來，而觀眾用的 Patio 則張着帆布。再後來，沿牆的地方開始設立半圓形劇場似的坐位，舞台附近開始放置長櫈。監視秩序的警察 (alcalde) 則坐在台上。表演的時間，和莎士比亞劇場一樣，普通總在下午兩點鐘開始。舞台，和莎士比亞劇場一樣，也是二重的：下面用幕帷隔開而成的兩個台(前部和後部)，上面一個台。

這幾部份舞台的運用方法和戲劇的表演形式，基礎上和莎士比亞劇場中的情形相彷彿。十七世紀初葉，一六〇七年，瑪德里地方，除了那些表演羅普·德·魏伽劇本的公共劇場，同時也已經有了照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劇場形式興建的專門的宮廷劇場建築了。西班牙這些宮廷劇場的舞台上所表演的

雜的機構和豐富的道具見長的。



十六世紀六十年代末了，第一所永久的劇場在瑪德里出現。照當時的法令，優伶們祇准在兩個宗教團體所指定的地點演戲。這兩個宗教團體有向戲班子徵收租費以供已用的專利權。委託給上述宗教團體經營謀利的這些初期的永久的劇場是非常原始的。這實際上是庭院（corral）而已，起初甚至於沒有屋頂和沒有觀眾席，後來開始為觀眾們設置櫈椅，並且給舞台和樓座或者整個劇場加蓋屋頂。到十七世紀時，已經有了佈置得富麗堂皇的劇場，裝着大理石圓柱和設着包廂的座位。這些劇場出現於西班牙各大城市，因此除了王宮中的宮廷劇場之外，又產生了這些城市的劇場。這些設立在庭院裏的劇場祇能在天氣晴和的日子演戲。收入起初非常少，兩個宗教團體每場戲的收入不到四五十法郎。觀眾都擠在庭院裏，婦人和男子是站開的，有些比較幸運的觀眾躲在鄰近屋子的窗裏看，好像坐在包廂裏一樣。而未來的戲劇却並不是在國王的金碧輝煌的宮殿中創造出來而是在這些後庭中生長起來的。

到後來，像上面所說過，演戲的地方已經有了各種改善。（patio（本來是『院子』，現在是『正廳』的意思）後部，本來是下層觀眾站立的地方，現在設立了些的花樓和包廂。專門給婦女坐的座位直接設在正廳的上面，稱為cazuella（鍋子）或者jaula（籠子）。這一個『籠子』裏所發出來的喧鬧聲也不下於正廳。和正廳一樣，這裏也發出噓噓聲和呼喊聲，鈴聲和爆竹聲。當時有一個本劇的引子中，作者稱頌那些給僧侶和『有教養的』人們佔據着的花樓和包廂裏的觀眾，而和這些觀眾們的優雅的批評相對的是正廳和『籠子』裏那種洶湧難過的示威。正廳中的觀眾們不滿意劇本的反應有時很狂暴：瓜葉向台上齊飛。觀眾中間有許多小販來來去去兜售食品，飲料，硬殼菓和香料。羅普·德·魏伽會在他的劇本『沒有愛情的情侶』的引子中謾罵觀眾們的這種粗暴的行為，而且對於那以逐出劇場的懲戒來限制劇本的敵人的時代之過去，表示惋惜。

這種劇場裏的景象指出，當時所設下層觀眾所佔的地位很重大，同時也指出一個事實：下層觀眾和上層觀眾之間的趣味自然是不會吻合的，所以正廳經常和包廂與花樓處在敵對的情況之中。

本誌優待閱戶啟事

本誌創刊以來，遠近各地讀者，來函徵詢長期訂閱辦法。祇因物價起跌不定，影響成本每期不同，致本誌全年定閱辦法，暫難訂定。茲為酬答各方雅意起見，特別訂出優待閱戶辦法如下：

一、請先匯付三千元或五千元，開立『訂戶』；款盡，再行通知。

二、照每期定價七折優待。
三、郵寄分『普通』『航快』兩種，訂閱時請為註明。所需寄費，照實列入『訂戶』項下。

四、訂閱函件或匯款，俱請寄上海南京路六六號本誌發行部收。

附註：如因匯款不便，郵票代替，十足通用。

編輯餘談

求真雜誌社啟

為本誌執筆的朋友、學者、作家，一天天多起來了，這是我們求之不得的好現象。但也因此使我們逐漸感到篇幅有擴充的必要。祇因擴充篇幅，在出版條件極端困難的今日，難免提高售價，這就影響讀者的負擔。本期將準備發表的兩篇佳作——碧雲先生的『社會形式發展史中婦女地位之變遷』和謝少翁先生的『小甲長的舊夢』——臨時抽出，也就是為在現有的篇幅所限，只得留待下期刊登，併此致歉！
同樣，為了篇幅問題，迫使我們邀請各學者、作家、朋友，來稿最好在一萬字以內，讓這塊『自由園地』，達到足以發揮多種不同意見的條件。

英國詩歌發展的二個階段

(續完)

英·C·考特威爾著
朱維基譯

三 資本主義衰落時期

但尼生的『自然』的那種無意識的殘暴，在事實上只是反映了資本家不斷地把同道的資本家拋到無產階級的深淵裏去的一種社會的殘暴而已：『這麼地留意着典型？』可是不。

從懸崖和山石的上面

她叫道：『一千種典型是完了：
我什麼都不留意，一切都要完結』。

阿諾爾持，史文朋，但尼生和勃朗寧各以自己的樣式，證明了資產階級的幻覺在牠的歷史的這個『悲劇的』階段中的運動。

但尼生的克萊式的世界，一等到他在美的世界和不讓他休息的悲慘的現實世界之間讓步的時候，就被粉碎了。只有那挽歌 *In Memoriam* 帶着牠那深邃的悲觀主義，到今日為止在英文中最純正的悲觀主義的詩，在任何方面成功地用當代的字句反映了當代的問題。

像達爾文一樣，而且更甚於達爾文的弟子，他把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投射到『自然裏面去』(個人的生存競爭)，然後把這為自己的本能的故而是不能改變的盲目性所加深了的競爭反映到社會裏面去，所以『上帝』(社會的內在力量的象徵)似乎為『自然』(社會的外在環境的象徵)所俘虜。

『上帝』和『自然』是在鬥爭麼？
哦一樣無效，所以是一樣脆弱的人生！
哦，但願你的聲音來撫慰和祝福我們！
有什麼回答或是補救的希望？

在那帷幕的背後，在那帷幕的背後？

勃朗寧從卑賤的現在中反叛，並不是向着將來，却是向着資產階級的勇壯的意大利的春天的光榮。這種活力在英國詩歌中從來沒有染上過這麼深的一種色彩。但是他的語彙有一種模糊冗贅，這反映了他在處置現實的當代問題的那種理知上的不誠實。對於但尼生是克萊式的傳奇的世界，對於勃朗寧是意大利的春天；他們兩人都是向後反叛的，試着逃避開那他們為牠說話的階級的矛盾。勃朗寧在處置當代問題時，不能產生比『斯勒琪先生』或『勃洛格拉姆主教的罪言』更高的詩歌。可是他在懇切的年青時代也能够指責一個較老的資產階級詩人走那熟悉的反動的圈子。

莎士比亞是屬於我們的，彌爾敦是為我們的，
我就在堅穩地走着的地方躊躇了……

她似乎這麼地留意着典型，
却發見了在五十粒種子中
她往往只使一粒種子結實，
甚至於我在到處搜索着

她在她的事蹟中的秘密，

只有離開先鋒和自由人的隊伍，
只有他加入到後衛和奴隸的隊伍中！

爲克萊的世界的那種物質性和催眠術般的沉重性所僵硬化了。命運，不論是赫莎或是『卡萊頓的阿泰朗泰』裏的南姆雪斯，不再是悲劇的，却是憂鬱的，像波特爾爾的死那樣地憂鬱。史文朋是爲發生於全歐洲的當代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所感動，可是他那反應的純粹冗贅而淺薄的性質，反映了在這晚遲的時代中的一切像這樣的運動的那種主要的淺薄性，在這時代中，由於無產階級的發展，他們幾乎立刻否定了自己。

阿諾爾特的詩發現在成爲資產階級幻覺的特性的那種「悲觀主義」的氣息，這階級現在正在造成自己的最終的而且對於自己是悲劇的階段。阿諾爾特和非力司丁人鬥爭，可是他有一種他命定要失敗的不安的懷疑，當他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範疇內行動的時候，他自己的行動就產生了非力司丁人；他把詩人和社會分開，這樣他就推進了那產生非力司丁人和詩人的運動。

二

資產階級詩歌的第一種形態是『商品崇拜主義』——或是『爲藝術而藝術』——而在資產階級詩人作爲市場的生產者的那種虛偽的地位，一種爲資產階級經濟的發展硬加在他上面的地位上，表現了出來。一等到阿諾爾特和年輕的但尼生的悲觀主義，以及在處置當代環境時的勃朗寧，史文朋和老年的但尼生的甚至於更爲憂鬱的樂觀主義，使詩人不可避免地離開當代的環境時，詩人變爲商品崇拜主義的一個犧牲者，是同樣地不可避免的。這意味著是一個要把藝術的世界完全和現實的世界分開的運動，而在這樣做時，把藝術的世界和藝術本身的源泉分開，所以那作品正在看來好像極度安穩的時候，却像一個泡沫般地爆破了。

恩格爾斯在『反杜林論』裏面，十分清楚地說明了每個根據於商品生產上的社會的特質：

（牠有這樣的特性，就是生產者在牠裏面失去了對於自己的社會關係的控制。各個生產者用那恰巧在他手中的而且爲了要通過交換的媒介滿足他個人需要的生產手段，替他自己生產。沒有人知道他所生產的物品有多少到市場上來，或者對於這物品有多少要求；沒有人知道他的個人的生產物會不

會適應一種真正的需要，他會不會收支相抵，或者甚至於前不能售出。無政府狀態統治了社會的生產。但是商品生產，像一切其他的生產形式，有牠自己的法則，爲牠所固有的而且不能和自己分開；而且這些法則不管無政府狀態，却在無政府狀態裏面主張自己的地位……所以牠們離開生產者而且反對生產者，主張自己是他們的目的的生產形式的自然的法則。生產物支配了生產者。

恩格斯把這種生產方法和那較古舊而較普遍的爲使用却不爲交換的生產方法來對比。生產的起源和目的在這裏可以清楚地看出。一切都是一个社會行動的一部分，生產品只是以牠對於生產牠出來的社會的使用價值來估價。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裏，這樣的詩從牠的集體的形貌，從牠在聽者的心上所發生的效果以及在部落的生活上所施加的直接而明顯的壓力中，獲得牠的價值。

在極度的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生產中，這一切都改變了。每個盲目地爲一個市場生產，這市場的法則是不可探測的，雖然以鐵一般的剛硬保持自己的存在。商品加在社會生活上的壓力不能被計量也不能被看到。『人失去了對於自己的社會關係的控制力。』資本主義的整個精妙的經緯，一張用無政府狀態織成的錯綜複雜的網，使這無能爲力的狀態成爲不可避免的。

資產階級的市場對於詩人顯得是『大衆』。印刷和出版的發明和發展是普遍的資產階級自由市場的發展的一部分。正好像這個市場的發展（由於殖民，運輸和交換工具的擴張）使一個人可能爲名字爲他所不知，地點更爲他所不知的地方生產那樣，現在詩人爲那種人寫作，他們的存在他是不知道的，他們的社會生活，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態對於他也是陌生的。那市場對於他就是『大衆』——盲目的，奇異的，消極的。

這引到馬克斯所稱的『商品崇拜』去。在集體祝典中那麼明顯的藝術過程的社會性質，現在消滅了。『一件商品所以是一件神祕的東西，只因爲在牠裏面，人的勞動的社會性質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印在這勞動物上的一種客觀性質……同樣地，從一個對象上射出的光，我們並不把牠當作我們的視神經的主觀的激動，却把牠當作在眼睛本身之外的一些東西的客觀的形式。同樣地，藝術作品一等到牠社會的心裏的實現爲『市場』或『大衆』所掩住的時候，對於詩人就顯得是一些客觀的東西了。藝術的從視覺上倚賴於集合的

人們的形式——即舞蹈，歌唱，音樂，自發的戲和藝術的喜劇——轉變到視覺上並不倚賴於社會的藝術過程的結晶紀錄——即寫出的詩，樂譜，寫出的劇本，圖畫或影刻——這也助成了這趨勢。藝術的刺激變成了客觀的——一種商品了。

資本主義的生產爲自己的運動需要——資本。不變資本是資本總和的不斷增加着的一部分。這種不變資本取了精妙的工廠的那種可以看到的形式，間接地取了對於使用這工廠是必要的那種更高度發展的技術和組織形式。這種不變資本的生長，因此是由於勞動的增長的生產性所起的社會組織的生長，是和那由於私人資本家的增長的財富而起的私有和佔奪上的個人主義的生長成爲對照。同樣地，資產階級的詩歌顯出傳統和技巧的一種不斷增長的總和，詩人感到了牠的壓力，所以在體現於詩里面的巨大的社會經驗和詩人的個人主義的和反社會的態度之間，有着一種不斷的矛盾。傳統像一種可憎而巨大的東西一般聳起在詩人的面前，作爲一個自我的他一定要和這傳統清算一下。

但是詩人並不是一個資本家。他並不剝削勞動。商品崇拜對於資本家取了一切商品的共通的市場籌碼——貨幣的形式。貨幣替他獲得了一種高的，神祕的，精神的價值。但是作家，他自身是受到剝削的。

在他『爲金錢而寫作』的時候，他當然獲得一種純粹資本主義的心理狀態。他甚至於可以用替他做『繁重工作』的秘書和受僱文士的方法來剝削勞動。但是爲錢而寫作的人不是藝術家，因爲藝術家的特色是他的產品是適應的，藝術的幻覺是要從本能和意識，生產力量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緊張，就是把全社會向着將來的現實推進的那種緊張中產生的。在資產階級的社會中，這種緊張是生產力量（工廠中的資本主義技術的社會組織力量）和生產關係（爲私人利潤的生產以及因此而起的整個市場上的無政府狀態；貨幣或『交換』關係成爲普遍化，而不是直接或『使用』關係成爲普遍化，是這無政府狀態的特點）之間的那種緊張，因爲這是根本的矛盾，詩人就『反抗』獲取利潤和爲交換價值的生產的制度，說牠是殺害藝術的意義和重要性的。但是當他在資產階級的思想範疇內反抗的時候——那就是說，當他不能拋棄那基本的資產階級的幻覺的時候——他的反抗總是取着一種爲商品生產的制度做成必然的形式。

詩人這樣地變爲其中的一個的被剝削者，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有兩種。這兩種，即勞動者和匠人，可視爲中世紀時代的農奴和工匠的後裔。可是，這血系並不是直接的。在資本主義的革命中，農奴變成了資本家，而工匠是被投擲在無產階級裏面。被剝削者可視爲一種工匠階級的後裔。勞動者是徹底地無產階級化了；工匠爲了特別的原因，依舊在資本主義生產中保持了某種數量的特權，這給他屬於『中間階級』，一個不感染到而且超越於整個階級鬥爭的階級的那種幻覺。雖然無產階級的深淵老是在他的脚下張開大口。他的特權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個特殊階段的偶然的事情，而且老是要從他的手掌中奪去。可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變化往往產生這個階級的新的成員，因此往往顯出某種穩固性和獨立的存在，雖然牠的實在的組成是在一種極度變動的狀態中。資本主義的最後諸階段甚至於顯出這種空幻的獨立也是虛僞的，小資產階級發見自己的特權從手中給人奪去。

讓我們考査這兩種人在英國的主要的歷史。

(一) 勞動者。——他是下賤地，單調地並且拿着最苛刻的工資而工作的人，機器上的一隻僅僅的輪齒。他是無產階級本身，資本主義的唯一的創造物。他和資本家的鬥爭是最劇烈而且孤單的，因爲他的工作由於其本質，是不可能喜歡的，因此他的反抗是表現爲一種爲餘暇的鬥爭，一種要從他的雇主不願的手中奪取工廠之外的合理的人類生存的每個額外鐘點的企圖。這個鬥爭和較高的工資的鬥爭相輔而行，以使這些餘暇的鐘點盡可能地充實而自由。

這是他的爲自由的鬥爭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範疇中所能取的唯一的形式，因爲在他的沉悶的工作中，自由表現爲社會活動或『工作』的對立物。因爲他構成資本家從他們的勞動力的剩餘價值中獲取利潤的那些人的大多數，所以這兩個階級之間的對立是赤裸裸的而且直接的。這種對立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爭的真正的核心。他的餘暇的每分鐘以及他的工資的每分鐘都是從資本家的利潤中拿來的。他的自由正是資本家的不自由，反之亦然。

(二) 匠人。——這個工頭，監工或機器，或者在職業上當律師，醫生，工程師或建築師的階級，由於他的個人熟練，技術或是『主要』工作，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佔着一個特殊的地位。因爲他的優越的地位，他的愛好自己的熟練，以及他的較高的工資，匠人往往發見自己和真正的無產者對立着。工作對於他並不像勞動者那樣和餘暇尖銳地對立着，他的自由也並不和資

本家的自由尖銳地對立着。有的時候他甚至於自己也在做着『小規模的』生意，不是像一個資本家那樣，却是雇了兩三個學徒式的夥計，把產品出賣給大資本家。這種利益的顯然的分裂是表現在這些工人的組織上。那些早年由朋·鐵萊脫（Ben Tillett），湯姆·曼（Tom Mann）和約翰·崩斯（John Burns）領導的總工會——T.&G.W.N.U.G.& M.W.以及類似的總工會——發現自己和舊的A.S.E.那樣的『聯合』公會對立着並且作着鬥爭，而後者是承繼着那在早年排斥了本來的婦女參政派和組織不良的秘密結社的『議會』（Junta）的『自由黨』傳統的。

可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毫無惁惁心地把匠人變成一個勞動者。機器和他的熟練的手在一切部門中的生產物競爭而且把牠排斥，逼他加入失業者的『工業預備軍』中。

那最先的結果是，使他把自己的熟練作為和社會的使用脫離的一種本身的價值，以反抗一種『商業化了的』市場的要求。例如，你會聽到這樣的一個匠人會把一輛舊的納比爾（Napier）汽車讚為熟練的匠人的超等的出品，而且把牠和一輛扮着同樣的社會角色而且價錢較廉的近代的大量出品的福特汽車比較。舊的技藝縱然消耗較多的人類的勞動，却獲得了一種對於匠人的特殊的價值，因為牠是使匠人能成為一個和無產階級判然不同的階級的條件，而且和那有着自己的利潤標準的市場對立，而這市場正是使匠人的技藝成爲過時的原因。結果，被雇爲一個廠中的工人的他仍能以製造模型，從事於個人的『嗜好』以及能運用自己的本領的對於社會無意義的活動而沾沾自喜於自己的過時的技藝。

他在這上面的態度是在基本上相類於作家的態度。作家和資本主義的關係也是有着特權的，還有他的技藝，雖然牠的『理想的』內容在一個階級的區別把『想』和『做』分開來的時代中給他比手藝更高的特權。作家是上層的資產階級社會的一部份，好像醫生，律師，建築師，教員或是科學家一樣，他們的工作有着相同的理論的內容——手工的匠人決不超出於『下層的中等階級』。雖然，作家和匠人都發見他們自己表現出小資產階級的特殊的企望和幻想。

正好像資本主義的成長逐漸傾向於把一切的工業生產淹沒在大量生產中，榨取成千的工匠，而且把匠人無產階級化到一個勞動者和看管機器者的水準，這種成長在藝術領域內也發生同樣的效果。大量生產的藝術實行出一種

致命的庸俗性的水準。好的藝術逐漸變得不能出售了。因為藝術所扮的角色現在是要使大眾去適應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機械生活，在這裏面工作把他們的生命力吸乾却不把他們的本能喚醒，在這裏面餘暇變成了一種用電影的容易的幻想，用簡單的滿足願望的寫作，用僅僅是情緒的按摩的音樂來麻木心靈的時間——因為這個緣故出錢雇用的作家的技藝變得像看管機器者的一樣地退化中有分。龐大的技術才能以及人類精神的逐步降低和刻板化同樣地是資本主義的這一階段中的工廠出品和工廠藝術的特色。讓任何一個不得不靠報章文學和寫作『刺激小說』爲生的藝術家來證明他的藝術的無產階級化。近代的『刺激小說』，『愛情小說』，美國的牧夫的傳奇，廉價的電影，爵士音樂或是星期日的黃色版形成了今日的無產階級的文學——那就是說，這種文學是由近代的資本主義生產在大多數的人民中間所產生的那種悲慘和本能貧乏的特殊的伴奏。這是使作家成爲無產階級的文學，牠是真正的悲慘的一個表現，也是對於這真正的悲慘的一個抗議，這種普遍的，不變的，荒謬的，充滿着爲近代資本主義所餓瘦的本能的容易的滿足，有着熱情的愛人，英勇的牧夫和驚人的偵探這類人物的藝術，是今日的宗教，牠獨特地表現了無產階級特有的藝術，表現出資產階級幻覺的真正的而不是自己鑑定的內容。『裝作聰穎的』資產階級的藝術在資產階級的自由上面生長。『不智的』無產階級的藝術在無產階級的不自由上面生長，也靠着用按摩那些飢餓的反叛的本能的方法來維持這種不自由的存在的那種幫助而生長。因為牠是僅僅的按摩術，因爲牠幫助維持人在不自由中却並不表現出他的自發的創造，因爲這個緣故，牠是壞的藝術。可是這種藝術是要真正獨特得多，而且在資產階級社會裏扮着一個（譬如說）比詹姆斯·喬埃斯（James Joyce）的藝術更重要和更普遍的角色。

詩人是作家中最講求技藝的。他的藝術需要任何藝術家的最高度的技術上的熟練；而這種技術上的熟練正是爲一種發達的資本主義中的大多數的人民所不需要的。他的過時好像一個中世紀的石匠在一個石膏模型的時代中一樣的過時。當社會的質實上的無產階級化增長的時候，被剝奪了自發性的人的工作條件逐漸使他們要求一種大量生產的『不智的』藝術，這種藝術的平

凡和淺薄使他們和他們的不自由適應起來。詩人變爲一個『假作聰穎者』，一個他的熟練不爲人所需要的人。一般的人覺得讀詩太麻煩了。

由於他的生活的條件，詩人的反動是和匠人的反動相似。他開始把技藝上的熟練和社會的職能對立起來，『藝術』和『人生』對立起來。匠人的商品拜物主義的特殊形式是熟練拜物主義（Skill-fetishism）。現在熟練似乎是一種和社會價値對立的客觀的東西。因此藝術作品是依據的本身而且爲牠的本身而被估價。

但是一件藝術作品是生存在一個社會的世界裏的。藝術作品總是由那些有着一種社會聯繫的對象組成的。構成藝術的材料的不是僅僅的噪音而是語彙中的字眼，不是偶然的聲音而是爲社會所承認的音階中的音符，不是僅僅的泡沫而是有着一種意義的形式。這一切東西都有社會的情緒上的聯想。

可是一件藝術作品若是爲牠自己的緣故被估價，而以挑戰和反叛的態度和一個現在用不到熟練的社會對立，那末這在事實上是爲藝術家的緣故被估價。一個人不能單單作沒有目的的詩。假使這些詩的聯想不是社會的，那末便是個人的，而且藝術作品越是和社會對立，越是挑戰似地選取沒有社會性的個人的聯想——古怪，奇異，縹渺。因此在資產階級幻覺的這一個階段中，詩歌展示出從藝術的社會的世界到私人幻想的個人的世界去的一個迅速的運動。這引向個人主義去。詩人在反抗資本主義時，因爲仍舊留在資產階級的範疇內，單單前進到一種極端的個人主義，完全的『失去對於他的社會關係的控制』，和絕對的商品生產——在事實上，前進到爲他所斥責的資本主義的猜謠去。他是完全的『鏡子革命家』。

而他太得意洋洋地宣布終於十足獲得了自由的時候，也正是自由完全從他的多中滑脫掉的一剎那。

四

這個到『爲藝術而藝術』，那就是說『爲自我而藝術』的世界中去的運動，在英國當然是由羅薩蒂（Rossetti），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之前的莫理思（Morris），王爾德（Wilde）以及到某個程度爲止的霍波金斯（Hopkins）清楚地代表着。但是在這個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時代中，這運動在其他的國家裏變得最爲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方法最快的英國，衰落得最慢。資產階級藝術裏的最後的運動在其他的國家裏完成得最爲完全。

這運動在法國看到牠的純粹性。開端的是波特萊爾：『Il ne peut être l'individu lui-même』。瓦爾倫（V.vraine）和朗博（Rimbaud）繼續了這運動，雖然和巴黎公社聯盟的朗博在這第一次無產階級專政崩潰的時候脫離了詩歌。

從那時以後，這運動經過巴爾那斯派（Parnassians）和象徵主義派，在超現實主義派裏發展到牠的最高峯。對於巴爾那斯派，字眼是以其大理石的技藝本質來估價的；對於象徵主義派，是以那在字眼之外的模糊而半陰影的情緒的聯想——那就是說，以字眼的社會之外的聯想來估價的；對於超現實主義派，是直接以字眼的私人的，無意識的意義來估價的。從赫勒狄亞（Heredia）經過拉福格（Laforge）而到愛普里納爾（Apollinaire）去的那種變遷是驚人地迅速而且明晰。

詩歌在英國起初似乎是枯竭了。使一切的藝術降低，或是使藝術向超現實主義進行的那種資產階級經濟的普遍運動，在英國是由許多『庇護所』阻止住了：這表示出英國資產階級的前途還有長長的夏天。富有的工業資本家覺得還是向殖民『國家』無情地奪取原料而在自己周圍保持一種田園式的關係的痕跡，他就去保存和庇護鄉間——這就是像這樣的一種庇護所；牠給了我們哈代（Hardy）以及一連串的像湯姆斯（Thomas）和大衛斯（Davies）那樣的較不蒼勁的鄉間詩人。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又是像這樣的庇護所；他們給了我們霍斯曼（Housman），弗萊苟（Flecker），勃洛克（Brooke）和許多其他『喬治』王朝的詩人。大戰結束了這個時期。在一九二九年，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甚至於影響到英國，英國的詩歌也迅速地進向象徵主義以及詩藝反叛的最合邏輯地一貫的表現——超現實主義。

超現實主義派是多少等於匠人在他空的時候製造小巧的模型和玩具來運用自己的熟練。他就像這樣地表現他的反叛並且爲他的技藝獲得自由的宣洩，故意使他的技藝的本質的某部份變得無用，因此和大量生產的卑俗的笨拙對立起來。我們以後有時要來研討本能和無意識在藝術中的真正的職能時，要講到超現實主義的美學上的理論以及牠給與無意識的那種重要性。現在我們只需指出，那作爲超現實主義技巧的基礎的自由聯想決不是真正自由的，却如弗洛依德（Freud），傑恩（Jung）和麥克翁代（Mac Curdy）清楚地顯出的，比日常的合理的聯想要強制得多。在合理的聯想中，意象是爲一

種對於現實的社會經驗——即必然性的意識——所控制。在自由的聯想中，意象是為無意識的本能的鐵黨所控制——所以並不比螞蟻的『思想』更為自由。人並不是和社會對立把自己實現出來，而是通過社會把自己實現出來，才能變得自由，並且聯想本身的性質也設下某種共通的形式和慣例，這些形式和慣例却正是自由的標記。但是因為超現實主義者是一個資產者而且失去了對於他的社會關係的控制，他相信自由就在於向這些在過去把自由實現出來的形式反叛。社會的活動，即自由的手段，——因為這活動愈是變得社會的，那末牠的產物愈是完全地為個人所享用，——是和一種堅決地非社會的活動對立着，大家感到這種活動構成自由，因為牠的產物對於社會無用，因此不能為個人所享用。當然這是這過程的一個外面的觀察。在主觀上藝術家相信自己在實現一種從藝術作品的『魔術』性和藝術家的心炙的無比性中生出來的理想自由。

在每個階段，資產階級的矛盾以展開自己來變革自己的基礎並且獲得一種技術上的新的發展，因此從『為藝術而藝術』到超現實主義的運動獲得詩的技巧上的一個發展，在英國由於前面說過的遲鈍，愛略脫（Eliot）是這運動的最好的例子。但是這運動不能無限地繼續下去。技術和內容之間的衝突達到一個極度，到了這極度牠就爆炸而且開始變為牠的對立面。一個僅僅僅僅的技術的運動相對立的內容的革命就此開始，這革命在社會領域內相同於和僅僅生產力的改進相對立的生產關係上的一種變化。結果，字眼的社會聯想要重新改變一下，詩歌的全部的題材要變得不同，因為語言現在是在一個不同的社會裏產生了。一個從資產階級詩歌的範疇到共產主義詩歌的範疇去的真正，命的運動就此發生。

因此超現實主義者是最後的資產階級革命者。超過他——超過彌爾敦，超過哥德文（Godwin），超過不德（Pater），最後超過達達（Dada）和達里（Dali）——就是超過資產階級思想的範疇。在政治上，這個最後的資產階級革命者是什麼？他乃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無政府主義者是一個這麼地憎厭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甚至於最本質地主張資產階級信條的資產階級：完全的『個人的』自由，一切社會關係的完全的破壞。無政府主義者還是革命的，因為他代表一切資產階級社會的破壞的成分和完全的否定。但是他不能真正超過資產階級社會，因為他仍舊保持著的圈套中。在資產階級經濟的無政府的組織中，某種組織的原則仍舊保持着

，所以只能為一種更高的組織，即一個新的階級的組織所粉碎。
無政府主義者是工業資本主義在那裏於『暖室』條件底下晚期發展而結果使巨數的匠人或小資產階級工匠迅速無產階級化的那種國家的典型的革命產物。這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信條。因此牠在像意大利，西班牙，俄羅斯和法蘭西那樣的『晚期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顯出了力量——正在這些國家中，藝術上的超現實主義的傾向也最為顯著。

但是這也是超現實主義的特性，正好像是作為一種政治哲學的無政府主義一樣，就是牠在實踐上否定自己。作為一種政治哲學的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不同點就在於共產主義相信只有用一種有組織的運動才能成功地把資產階級的統治推翻。這種用蘇維埃和職工會表現出來的組織乃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條件迫切在無產階級上面的那種組織的直接結果。可是，無政府主義者最近是一個小資產者，一個農夫或是一個匠人。他不會在一個對於資本階級的工業和政治的鬥爭中經過長期的組織。因此他把革命看做一種對於權威階級的個人的破壞，這就足夠恢復他在裏面享受了自己的小規模勞動之果的諸條件。

但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實踐時發現了，僅僅破壞一個破舊的社會，姑且不要說建設一個新的社會也是需要組織的。這工程的僅僅的必然性光把他驅入了職工會，然後迫使他去創造蘇維埃。這可以在俄羅斯革命中看到，在那時候誠懇的社會革命家大多數因事件的邏輯不得不取布爾塞維克的觀點，這在西班牙又可以看到，在那裏無政府主義者在巴塞羅納（Barcelona）不得不支持一個有力的中央政府，幫助組織人民軍，防禦以及供應，在各方面否定了自己的信條。因此關於無政府主義的法典的那個舊有的笑話顯得多麼真確：

〔第一條。不能有秩序。〕

〔第二條。無人須遵守上項規定。〕

而且那條在西班牙法西斯反叛之後的報上的消息：『無政府主義者在巴塞羅納維持秩序』是多麼富有趣味！

同樣地，當一種革命的形勢發展時，不退到反動和法西斯主義裏面（好像許多人在意大利所做的那樣），就是投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好像法國的亞拉岡（Aragon）。

在一個像英國那樣的國家中，工匠的最後的反叛往往取一個不同的形式。那裏的工匠並不是一個第一次嘗到無產階級化的味道使他憎恨『組織』的

匠人或是小資產者。匠人的無產階級化在英國發生於十八世紀末葉，而且因爲革命的可能性較爲無望，他的反叛取了機械破壞主義（Luddism）的形式——搗毀那些榨取他們的機器。匠人第二次大規模的無產階級化是由總工會的崛起顯著出來，和公會對立，而且那時的鬥爭是一個發展着的無產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鬥爭，公會却置身事外。

這樣在英國的最後危機中，工匠由於英國資本主義長期的發展，變成了一个在生產中佔據特殊地位的人。他形成了那著名的勞動貴族階級，使英國似乎不以一個資產階級的貴族政體和一個資產階級的君主政體爲滿足，目的在於求一種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在那最後的危機中不久就顯出，這種有利的地位不過表現了英國在世界資本主義中的霸權，却和競爭與關稅的成長一起消滅。由於合理化而起的失業，不穩，工資的減低以及草職，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六年毀壞了英國的各階級的『技術』和『職業』分子，正好像早年在德國一樣。可是，無產階級化在各個場合上並不使這些類型人物發生一種無政府的精神狀態，却對於那些到處深入於工業心臟中，在工廠的機器間中作監工，工頭，技師，專門技師，經理和顧問的『關鍵』人物，發生一種相反的效果。在這些位置中，他們發見自己的熟練是耗費了，不是由於把人們組織到工廠裏去，却是因爲這種組織的進步——他那邏輯地推進到人類生產率巨量的增加——是爲資本主義生產所特有的無政府狀態——各個工廠的私有和互相競爭——所擊敗。

因此他們對於那在把他們損毀的制度的革命，並不像匠人的革命那樣地在內容是反動的，這是因爲牠要求更廣大的組織——把那已經在工廠中所獲得的組織推廣到全部的工廠生產上面去。

但是在內容上縱然是進步的，並不就是說這要求會變爲一個進步的行動。即使在這革命的階段，工匠停止在兩條路的面前。一條路引到資產階級去，他的負有責任的地位以及較高的薪水往往把他和這階級聯在一起——醫生，建築師，和藝術家由於他們的『理想的』內容，確實是資產階級的真正的部分。另一條路向下引到無產階級去，他的特殊地位往往把他和這階級分開——因爲無產階級化由於牠所包含着的生活條件的惡劣化，是要用任何的代價來避開的一種東西。因此他對於和無產階級聯盟有一種極深的憎惡。在過去，他用他從無產階級爬到資產階級上去的那種距離來計算他的成功和自由——那著名的小資產階級的市儈氣和排斥性，可是牠只是無情地反映了

人的不斷的渴求自由。

假使他選取那向上的路，那末他選取爲資產階級從上面加上來的組織——換句話說，就是法西斯主義。當然這種組織是一個僅僅的偽造品——這是一件要再行合理化的外套，以穩固資本家階級的最反動部分的權力。結果並不增加生產的組織化，却產生了更廣泛的無政府狀態和更劇烈的競爭。合理化在事實上變爲不合理化。牠引到一個無政府狀態在外部和內部上的增長——在內部上由於一種經濟上的深刻的混亂，這混亂起於軍備和奢侈品工業犧牲了必需品工業以及減低一般的工資所得到的發達，在外部上由於關稅和帝國主義的增長以及一般的向戰爭的推進。唯一真正的組織却是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反對革命的軍事組織化以及工人階級團體的搗毀。

但是工匠可以同樣地選取那條向下的路，而且他大概會這樣做，因爲工業危機和外國法西斯主義的客觀的例子顯示出這個運動的不可避免性。這條路是在自己和無產階級聯盟起來而且把工廠內的工人組織，以消除那些成爲障礙的權利——即生產手段的私有——的方法，擴大到全部生產的組織上面。因爲這個權利是既存社會的真正的權力，這意思是工人的權力代替了資本家的權力。當他作這個選擇時，工匠由於他在生產中的『樞紐』地位，他的特殊的進步（給他更多的空閑和修養的機會），以及他的責任的經驗，變爲無產階級的一個自然的領袖，並不像他和資產階級聯盟的時候那樣地變爲他們的最靠不住的敵人。

爲了這個原因，在過去三年中，這些英國的技藝和小資產階級的典型——『勞動貴族階級』——顯著出一種革命態度的發展，他們以前會展示一切的反動的本質，使一個匠人公會在這個國家裏變得盡人皆知，而且使他們在德國的代言人變爲法西斯政權的真正的支持者。任何熟悉職業工會的事情的人都知道，正好像從前匠人公會以及那些含有強烈的匠人成分的工業公會反對總工會太好戰鬥而且太爲『社會主義』，現在像A.E.U., E.T.U., A.S.L., E&F., N.A.U.S.W. & C. 和 N.U.C. 那樣的匠人和半職業的公會在職業公會大會上，並且通過牠們的市議會和地方委員會推進戰鬥行動，而且被總工資產階級本身中取得一種特殊地位的匠人——醫生，科學家，建築師和教師——現在左傾了起來。

在英國的詩歌中。這是反映在這個事實上，就是英國的詩人並不完全趨

向超現實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却從一個近乎超現實主義的地位變到牠的對立物——一種像奧鄧（Auden），魯威斯（Lewis），司班特（Spender）和萊曼（Lehmann）所取的那樣的共產主義革命的地位。這種共產主義的地位真實到什麼程度以及牠代表什麼藝術的水準，要留到最後一章討論，因為有了這個運動，資產階級的矛盾就進到牠的統一。牠現在開始不僅要改革自己們的生產而且要改革自己的範疇，這些範疇現在不可能限制那些為牠的緊張狀態所產生的生產力。這運動在法國為季特（Gide），羅蘭（Rolland），瑪爾洛（Marlowe）和亞拉岡所推進，他們穿起了會為大家所嗤笑過的制服。在這裏只是剛剛開始。

我們已簡略地檢討了影響英國資產階級詩歌的最重要的一般的決定力量。現在必須要從檢討那決定詩人的狀態而且產生那只能由詩歌來解決的緊張狀態的社會和歷史運動，轉而去檢討個人創造的運動——個人反應這外界的壓力以及用辯證的過程從他自己的本能力量中給牠一種推動的那種特殊方法。我們能够這樣做之前，我們一定要檢討決定他的工作的那些詩歌的一般的技巧上的特質。

資產階級詩歌的運動

一般的特質

原始積累時期，**一五五〇年—一六〇〇年**。依里薩白時代——瑪洛甫，莎士比亞。以搗毀一切外界的形式而實現自己的個性的動力，在詩歌中表現了出來。牠所特有的英雄是絕對的帝王，以及他的堂皇的公共生活，這種生活是集體的，因此其他的個性都能通過他把自己實現出來，却並不否定他的個性。

(甲) 用古代的術語來表現資產階級幻覺的英雄性質的抑揚格的節奏，得以自然地盛行；牠表示個人意志的自由而無止境的發展。牠是集體的——適合於朗誦：高貴的——宜於用富麗的辭藻：柔軟的——因為帝王的整個生活，甚至於他的私生活，是在公然的安樂中度過的。(乙) 抒情詩宜於集團的歌唱（簡單的格律），却是宮廷式的（裝飾的詩節）而且是彌琢的（蔚麗的思想。）

雅各王朝時代——敦恩，赫立克，甫漢，赫勃脫，克拉孝。絕對的帝王現在變為一種產生腐敗的力量。從宮廷的富麗的公共生活退休到私人的書齋和鄉間去。

過渡時期。清教徒拿來了抒情的詩節，使牠們變得精妙而且帶有學者氣。宮廷詩歌變成含有一種書齋式的語彙的博學的詩歌。無韻詩（草白斯脫）描繪王權的衰落而失却牠的崇高的低音調。抒情詩不再能歌唱，思想變得複雜而繁縝。

資產階級的反叛，一六二五年—一六五〇年。**反清教徒的反動，一六二五年—一六五〇年**。清教徒的革命——彌爾敦。資產階級覺得自己強壯得足以反叛君主政體，而且得到『人民』的幫助，推翻了斯圖亞特王室。可是這種資產階級自由的實現顯得危險：人民也要求自由，因此產生一個獨裁制度把資產階級隔離起來，這之後接着一個反動。把自己理想化的革命者的高貴的質樸性（撤但，競技者撤生，沙漠中的基督）就在一種戰敗的氣氛中消滅。

英雄式的資產階級幻覺以古代的術語回來，可是較為自覺，而且並不投射在帝王的人物上。牠是個人的，而不是戲劇的。清教徒對於朝廷的反叛給牠一種素樸而博學的語彙；並且這種有意識的約制是反映在一種更嚴格的節奏上面。

王政復古時代——德萊頓，色克林，勒甫萊斯。詩歌忘却了自己的高貴的情操，而變為犬儒主義式的，適度的和合理的。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聯盟，而不和人民聯盟；宮廷又復復了，可是不再用絕對的帝王的形式。帝王現在服從於『理性』。

設立了形式的規則來約束『精神』，精神的橫暴顯得危險。詩歌忘卻了對內行動，這表示牠讓步的迅速。宮廷詩歌復行出現，因為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聯盟，因此依里薩白時代的抒情詩的那種簡單的格律和宮廷式的優美逐出了艱澀的學者的詩歌。語彙變得更談話式的和更社會性的。

十八世紀——濱普。勞動的短缺使資產階級繼續和農業資本家（民黨的『貴族』）聯盟。為了要維持那些壓低勞動的價格並且使牠能夠通過手工業的階段而發展的法律和限制。詩歌反映著對於形式和限制，良好趣味和上層階級『色彩』的正當性。

外在的『規則』現在被接受了，不作為一個讓步而作為文體的最明顯而合理的要素。詩歌變成奧古斯都式的，並且把限制自然的繁茂的文體，格律，彌琢和對偶理想化了。語彙變得形式化而優美地流行式的。

工业革命
和反雅
可賓的
反動
一七八五
—一八〇五年

浪漫的復活——拜倫，克萊，雪萊和華茨華斯。從手工業到機械力的發展把工匠階級無產階級化，而使重商主義限制成為不必要的。據有土地的資本家和小資產階級之間的聯盟現在中止了

二五年。
到鄉間去，而作為工業，國家裏面的優越的力量，出現。小的

資本現在獲得巨大的擴展的力量，而資產階級因獲得權力而得意忘形。手工

業時代的形式是對於工業的一種妨礙。『自由主義的』資本家領導人民組織十字軍以反抗那自由的名義的特權。詩歌變得熱烈而且充滿着情感。牠在自己裏面看到和依里薩白時代的個人主義有一種血統關係。牠反叛傳統而渴望一種更充實，更自由的生活。但是在法國大革命中人民和資產階級的聯盟引向對於無產階級的自由的一個革命的要求，資產階級嚇起來了，撤回牠的要求，失去牠的大眾基礎，和擁有土地的貴族階級聯盟而走進一個反動階段中。幻象破滅的詩歌愈加退縮到私人的傳奇世界中。牠讓步得太厲害了，除了用極端的虛偽和空洞的皇外，對於社會的現實不能有什麼大作用。所有的詩人在成熟的路上，暴露了他們的幼稚。

詩歌以懲訴於精神和情操而向舊的『形式』反叛。詩歌以回復到依里薩白和雅各時代的格律和語彙，來同時要求自然語言的容納以及語言的浪漫主義化。當感覺的和物質上『豐富的』字眼變得流行的時候，同時也強烈地注射進表現『抽象』觀念的字眼。這兩種字眼聯合起來把詩的語彙和現實生活分開。節奏——對於依里薩白時代的詩歌是朗誦的，對於雅各時代的詩歌是冥想的，對於清教徒的詩歌是崇高的，對於奧古斯都時代的詩歌是優美的——對於浪漫主義的詩歌却變為催眠的了。詩的技巧的發展上有一個極大的進步。維多利亞時代的詩人——但尼生，勃朗寧，阿諾爾特，史

英國資本主義的沒落，一八二五年——文明，羅薩蒂，派脫摩爾，莫理斯。當詩人由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和社會隔離時，他變為悲觀或者愈加退到一個私人的世界裏去。

在前一個時代中已經發現的技巧上的一種一般的加強。

都不能夠看到自己的好壞的。

巴爾扎克

『爲藝術而藝術』；巴那爾斯派；象徵主義；未來主義；帝國主義時代，超現實主義。——詩人用極端的個人主義，商品拜物主義和社會關係的失却控制來反叛。詩經過一連串的階段，從社會的世界轉到完全私人的世界。這個對於資產階級條件的反叛，最後極度純粹地表現了資產階級生產的範疇。這樣牠在無政府狀態中否定了自己，而且一定必然地走出了資產階級的幻覺。英國的詩歌由於英國資本主義的受庇蔭的狀況，在發展上跟在其餘的歐洲國家的後面。法國的詩歌以及（次要地）意大利，西班牙和俄羅斯的詩歌，變爲這發展的經典的例子。王爾德，愛略脫，弗萊苟，和龐特或許可以被提出。

維多利亞時代的詩歌繼續存在於受庇蔭的區域：鄉間（哈代，湯姆斯，大衛斯），牛津和劍橋大學（霍斯曼，勃洛克，史怪亥，等等）。大戰表現出發展的資本主義的不能解決的對立而隨着牠來的資本主義第一次危機以後一百年的經濟總危機結束了這個時期。

完全把藝術的世界和社會的世界分開的企圖。拒絕詩歌中一切特殊的社會特徵，作爲對於傳統的一個反叛。字眼逐漸爲個人的聯想而被使用。不是抗拒一切的節奏因爲牠由社會所創始，就是催眠式地使用牠以宣洩聯想，這些聯想的屬於個人的程度是和牠們的深度，因此和牠們的無意識成爲正比例。最後是，超現實主義的『完全自由的』字眼。

聯合陣線——詩歌現在由資產階級的觀念論者或『匠人』最後的資本主義危機，一九三〇——等等。在美國是：魯威斯，奧鄧和史班持。

再行企圖把一種社會價值給與以前各階段的運動所展開的一切的技巧。在這個時期中看到詩歌整個內容的完全的變化，在前期運動的末了是變成了沒有內容而且形式的。形式的問題現在有退到第二位之勢，這要到社會關係的問題被澈底地解決的時候爲止。

——完——

求 真

羅式熙

求！求！求！

勇敢地朝着真理追求！

讓我們眼前出現一面纖毫畢露的照妖鏡，
出現一條光明平坦的大路。

讓我們可以知道現在是生機蓬勃的春，
抑是殘敗衰老的秋？

讓我們分得出誰是維護正義的勇士，
誰是歪曲現實的騙徒？

讓我們看得見誰在爲人類的幸福而拚着性命，
誰在爲自家的私利而運用奸謀？

讓我們算得清幾世紀來虛偽的舊帳，
到現在是怎樣的糊塗荒謬！

讓我們堅信真理永在前進，
從不會在黑暗的背後停留！

求！求！求！

勇敢地朝着真理追求！
讓我們擰斷了一切的枷鎖，
逃出了兩面人的魔手！

讓我們抱着人類的天良，
誠實地在真理面前低頭！

讓我們除下了着色的眼鏡，
認清誰是讎敵，誰是朋友？
讓我們把無數被壓抑者的呻吟，
連結成暴風雨前巨雷般的怒吼！

讓我們及時揮動批評的武器，
把一切招搖撞騙的敗類擋走！
讓我們迅捷地洗淨這古老污濁的大地，
重新引導着人類踏上合理生活的坦途！

求！求！求！

勇敢地朝着真理追求！

我們再不要信甚麼奧妙莫測的道法，
再不要在黑暗裏歡呼！

我們再不要聽甚麼救主的口惠恩賜，
再不要那陶醉我們的毒醪！

數不盡的壓榨與迫害，
已使我們辛酸地受夠；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 (三)

李毓鏞

三 百賴斯替及其他

在化學上，凡是原素或結晶形的物質，都是有固定不移的熔點的。假使溫度低於熔點，這物質還是一種固體，溫度超過熔點，固體便熔化為液體了。但是另外有一種無定形的有機化合物，情形却與此不同。這一類化合物，在一大範圍的溫度之下，可以保持軟而不化的狀態。假使趁着柔軟的時候，把牠壓成某一種特定的形狀，冷却以後，就保持壓定的形狀，這就是現在所要提到的百賴斯替 (plastics)。百賴斯替是依相同的物理性質而集合的一個門類，包含的物質很不少。在自然界的產物之中，像動物性的蟲膠、植物性的樹脂、琥珀和寧波年糕，以及礦物性的瀝青、石蠟，就是百賴斯替中最普通的實例。不過在現代工業上所說的百賴斯替，專指人工合成的種類而言，並不包括天然的百賴斯替在內。

人類應用百賴斯替的歷史，並不始於今日。遠在上古時代，歐洲的國王，曾經用火漆來密封重要的文件，這可說是應用百賴斯替的濫觴。到了中世紀時代，人們又用火漆以製造許多器用什物，這一種什物，現在還可以在博物館中看得到。古代的百賴斯替，除了火漆以外，還有紙型橡皮和蟲蠟。其中紙型的物件，就是用嚼碎的紙和適量的膠調合，再用高壓壓成所需的形狀，這一種方法竟和現代人製造百賴斯替的方法相同。現代的百賴斯替，所以不同於古代的百賴斯替，就在於造形的物質，每要經過疊合 (polymerization) 的作用。而在古代的製造技術中是絕沒有這一種反應的。

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雖然有一部分的百賴斯替在實驗室中早已為科學家所發見，但是其工業上的價值，並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現代百賴斯替工業中間最早成立的一種，要算是橡皮的工業，接着橡皮工業而起的還有蟲膠工業。不過這兩種工業都以天然的物質為原料，和人工合成的百賴斯替無關。

在人工合成的百賴斯替工業中，最早成立的是硝化纖維素的工業。這一種工業乃是代替貴重的物質而產生的。原來在十九世紀中葉，世界上做裝飾品的寶貴物質如琥珀、象牙、玳瑁等，都漸有供不應求的趨勢。尤其是象牙一物因為非洲象被人大量的殺戮之後，產量更大為減少。到了一八六八年，紐約城的費蘭 (Phelan) 和可棱徒 (collender) 兩家彈子公司頗有鑑於此，就出重金徵求象牙的代用品。當時紐約有印刷工海艾特 (John Wesley & Isaiah Hyatt) 兄弟兩人，心為獎金所動，就以閒暇的時間，從事於人造象牙的試驗。他們試驗無數的物質，最後把硝化纖維和樟腦調合，竟得到一種可塑性的物質，就是現在所謂硝化纖維素的百賴斯替。兩年後，海艾特兄弟在這一方面得到許多專利，就設廠製造，這就是世界上第一種人造百賴斯替的工業。但是這時候百賴斯替的應用還沒有十分普遍，一直到一九〇九年，培刻蘭 (Leo H. Baekeland) 發明了酚百賴斯替且加以製造以後，遂使世界進入一個百賴斯替的時代。

在百賴斯替這一個名詞之下，實在包括有很多的化合物的。在這一類化合物之中，化學的成分，雖然大相懸殊，但是以物理性質的不同，大別可以分為熱塑 (thermoplastic) 性和熱定 (thermosetting) 性的兩大類。所謂熱塑性的百賴斯替，在加熱到硬化的過程之中，沒有經過化學的變化，所以在既經硬化之後，還可以再三的因加熱而軟化。並且在加熱以前可以侵蝕這一種物質的藥品，當物質硬化以後，可以一樣的侵蝕物質。至於熱定性的百賴斯替，在加熱的過程之中，只能軟化到某一種程度。假使在這一個程度達到以後，還是繼續的加熱，這物質就發生一種化學變化，轉變為一種不熔化、不溶解的堅硬物質。從此以後，縱使加以極高的溫度，也不能再行使其軟化。所以在壓製完以後，這一種百賴斯替可以趁燙出模，和熱塑性物質的製品，必須在模內冷卻，然後出模的不同。

在現在工業上所用的百賴斯替之中，熱塑性百賴斯替佔了絕大的一部分。這一類物質，因為化學成分的不同，又可以分別為下列的三大類。一、纖維素（cellulose）百賴斯替類，包括纖維素醋（cellulose ester）百賴斯替和纖維素醚（cellulose ether）百賴斯替。二、酪素（casein）百賴斯替類。三、基烯百賴斯替類，包括丙烯（acrylic）百賴斯替、困一烯（styrene）百賴斯替和疊乙烯基（poly vinyl）百賴斯替。現在就一一分述於下。

纖維素酯百賴斯替，一共又分為兩大類，就是硝化纖維素（cellulose nitrate）的百賴斯替和醋酸纖維素（cellulose acetate）的百賴斯替。硝化纖維素的百賴斯替，最初在市上流行時，商業上稱為擬纖素（celluloid）。我們所謂「賽璐珞」，就是這一個名詞的譯音。後來同類競爭的商品日漸增多，於是又有擬纖維（fiberloid）、火棉（pyralin）、硝子（nitron）、太石（xylonite）等等的名目。硝化纖維素，是用提淨的木質纖維，棉毛或紙漿，放在硝酸和硫酸的混合液中，硝化而成的。硝化完成以後，再經過去酸，漂白和洗滌的工作，就把他浸漬於酒精中，以免發生爆炸。製造百賴斯替的方法，第一步要把浸漬的硝化纖維素，傾在攪拌機中，再加樟腦與之拌和，打成柔軟的麵團。這一種麵團最後送到噴射機中壓成餅狀、棒狀或片狀的料子，烘乾切碎，就成為型塑的原料。硝化纖維素的百賴斯替，可以配深淺、斑駁等各種顏色，性質強韌，不吸水膨脹。只是容易着火燃燒，可說是最大的缺點。硝化纖維素的百賴斯替，除供假漆的底子和人造革的原料以外，普通專供塑造之用。如影片、玩偶、空心的動物模型、乒乓球、西裝襯衫硬領、刷、梳、鋼琴的鍵和自來水筆的筆管等，平常都是用這一種原料來製造的。

醋酸纖維素的百賴斯替，為一八六九年舒貢柏革（Schutzenberger）所發明。商業上稱為德奈特石（tenite）、可塑醋酸（Plastacele）或盧馬里司（lumarith），係由醋酸纖維素和塑化劑及酮，在攪拌機中調合而成的。醋酸纖維素的製法，和硝化纖維素相同，只是不用硝酸而用醋酸和乙酐的混合物，並且以硫酸作接觸劑罷了。醋酸百賴斯替所以優於硝化纖維素的百賴斯替的優點，在於無色透明、色澤美麗、富有彈性和絕緣性，極耐衝擊，而且不易着火。只是能吸水膨脹，並且在低溫之下要失去韌性，可說是最大的缺點。現在市場上用這一種百賴斯替製造的物件極多。利用其透明的特性的，有劣等照相機的鏡頭、錶玻璃、遮光頭罩、太陽眼鏡、不碎眼鏡和新近發

明嵌在眼瞼裏面的眼鏡。利用其光澤的，如李利安館品、銀彩電車車燈、明窗、利用其耐撞的性質的，如不碎玻璃、螺旋刀柄、鏈的頭等。利用其不燃的性質的還有安全影片。近年化學家為補救這一種百賴斯替的缺點起見，在醋酸和乙酐的混合物中，另加入初油酸或醋酸，以處理纖維素，所得到的百賴斯替，性質上比原來的好得多。其中尤以醋酸纖維素（cellulose acetobutyrate）的百賴斯替，抵抗氣候變化和水濕的特性，尤為他種所不及。醋酸纖維素的百賴斯替，在商業上稱為德奈特石二號、累薛奈特石（rexinate）電太醋繩二號等等。

纖維素醚，是把纖維素的物質放在鹼性強烈的溶液之中，和氯化或硫酸甲酯或者氯化或硫酸乙酯作用而成的。和甲酯起作用的，稱為甲基纖維素，和乙酯起作用的，就稱為乙基纖維素。這兩種纖維素，都可以和塑化劑或一樹脂調合，製成百賴斯替。甲基纖維素的百賴斯替，為一九三九年所發明。普通僅供處理纖維之用，並不用以模塑物件。乙基纖維素的百賴斯替，為一九一二至七年間所發明。性質強韌、不吸水、不着火、不導電、不受溫度所影響，並且容易溶解於廉價的溶媒中。實在是最合理想的塗料。這一種百賴斯替的商品稱為乙纖（ethacel）或乙纖盧馬里司，在假漆的工業上，占有極高的地位。這雖然也可以模塑物件，但直到目前為止，僅用以製造太陽眼鏡、管子以及電器冷藏器、汽車、飛機等的零件為限，還未能普遍的應用於各方面。

在古老的百賴斯替之中，除了硝化纖維素以外，還有一種重要的物質，就是酪素百賴斯替。酪素百賴斯替在一八八五年為查耳志（Emory Edwin Childs）所發明，起初在歐洲製造的時候，名稱叫做乳石（galalith）。後來因為牛乳的用途，日趨廣大，而這一種百賴斯替又有許多缺點，終於不能發達為重要的工業。酪素是牛乳中一種複雜與氨基酸化合物，製造百賴斯替的時候，在牛乳中加酵素或無機酸，並且徐徐加熱，這一種酪素就逐漸沈積於容器的底上。再把沉澱物和填充料及塑化劑調合壓成棒狀或管狀的料子，就可以放在稀的甲醣溶液中硬化為角質的百賴斯替。不過這一種百賴斯替因為質地堅硬，不易受範，所以在模造的時候，必須先製成坯子，然後使之硬化。酪素百賴斯替能吸水膨脹，並且易於翹曲和拆裂，所以只可以製造寶石、紐扣、婦女用領扣和籌碼之類，不能製造其他精緻的物件。大豆中含有豐富的蛋白質，也可以代替乳酪，當做百賴斯替的原料。先把大豆壓碎，除去

所有的油質，然後用氫氧化鈉轉變豆餅爲酪素，用酸使之沈澱。至於以後的各種步驟和製造牛乳百賴斯替時相同。大豆百賴斯替和牛乳百賴斯替有相同的缺點，必須和其他抗水性的百賴斯替混合，方才可以製造什物。

丙烯酸百賴斯替，包括有內烯酸甲酯(methyl acrylate)和甲基丙烯酸甲酯(methyl methacrylate)的兩大類。而以後者尤其重要。這一種百賴斯替，爲一九〇一年羅姆(Rohm)所合成。一九三一年美國開始大量加以製造。羅合(Rehm & Haas)公司稱張狀的出品爲塑料玻璃(plexiglas)，而稱造型的粉料爲結晶石(crystallite)。甲基丙烯酸甲酯，係先以酮和氯氣酸化合爲氯醇酮，再以氯醇酮和甲醇化合而成。製成後再經疊合，就成爲百賴斯替。這丙烯酸百賴斯替軟如半液體，硬至固體，一共有許多種。軟的極富黏性，用以膠合木料、橡皮、玻璃、織物和金屬之類，可以在兩層物質之間造成一種無色、無臭、堅強而不受細菌所腐敗的膠合層。假使用以浸漬織物，可以造成極堅韌的織物，尤其以必須忍受嚴寒的皮質，如航空員所用的皮鞋和手套，以這一種百賴斯替爲最好的末次塗劑。至於固體的丙烯酸百賴斯替，乃是一種無色透明的物質，質輕而堅，極耐碰撞，既不受電火花所燒灼，又不受水濕、酸、鹼所影響。這一種物質透光的能力，竟爲玻璃所不及，所以將來光學儀器的原料，或者可取給於此。

遠在一八三九年的時候，英國某一家公司，曾藉日光的能力，使蘇合香疊合爲一種百賴斯替，這就是現在的困一烯百賴斯替。但是這一種發明，因爲製法上有許多困難點以致在將近一百年之間，沒有發展爲重要的工業，一直到一九三七年，美國才有大量的出品。商品的名字有困容(styron)、盧克特容(lutron)和洛亞林(loanin)等。困一烯的原料爲苯和乙烯。這兩種物質如以氯化鋁做接觸劑，可以化合而產生乙苯。在每一個乙苯的分子中，因加熱而除去一個氫，就變成困一烯。困一烯本是一種液體，經過疊合的手續，於是變成固體。困一烯百賴斯替的特點，是無色透明，質輕而韌，不着火、不吸水、有強大的耐寒力和抗化力。能够使光線沿彎曲的方向前進，並且落地作金屬聲。因爲其色澤美麗，所以可製各種裝飾品，因爲其對化學藥品有強大的抵抗力，所以可製瓶塞、碟子及電池匣。因爲能够耐寒，所以可製冷藏器的零件。因爲有特別的折光力，所以可製醫學上或工業上檢視內部的傳光管。因爲能發金屬聲，所以可製百賴斯替簾。只是這一種百賴斯替，表面容易坼裂，不可以製造常受扭曲的物件。並且絕緣不持久，日久

能夠變色，可說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至於疊乙稀基內百賴斯替，是一八三八年累惲特(Regnault)所發明。蘭方才用以大量的製造物件。商品的名字有培氏木(bakelite)、耐石(durelite)、耐膠(durez)等。其中培氏木一種，我們俗稱電木，流行尤其廣闊。直到現在，我們一談起百賴斯替，往往要聯想到電木，也可見這一種百賴斯替普遍的程度。酚百賴斯替是酚和醚兩類物質的化合物。其中酚的部分，可以用酚、甲酚、苯酚或克累賽立克酸。而醚的部分，也可以用甲醚或數醚。現代的工業家，鑑於採用甲醚，必須要消耗大量的木精，所以都採用麥殼中提煉而出的數醚。原料上既然有這樣大的歧異，產物的性質，當然隨之而變化了。酚百賴斯替的製法，第一步係把甲醚和過量的酚放在大壺中加熱，以硫酸及鹽酸爲接觸劑，造成一種熱塑性的中間產物，名稱叫做謹服拉刻(novolak)。(未完)

投稿簡章

一、本誌宗旨旨在發揚自由研究學術之精神，故採取絕對公開態度——凡關於各種學術思想：如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藝理論等，以及中國歷史發展法則，中國社會經濟性質，農業經濟，土地問題，各國社會政治經濟史及其現狀之研究，並文藝作品等均所歡迎。

二、賜稿請以一萬字為限。如有必要須超過此限度者，請先向本社接洽。

三、賜稿務必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譯稿請附原文或指明出處。

四、稿費概用現金。從優奉酬。

五、凡稿件本社在必要時，有權修改。如不欲修改者，請在稿末註明。

六、來稿經本社擇錄後，版權即為本社所有。作者如欲保留版權，請預先聲明。

七、稿未被採用，仍得採入。

八、來稿請寄上海南京路六六號本社編輯部。

本誌外埠經銷處

南 京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杭 州	文藻書社
北 平	當代出版社
天 津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漢 昌	馬德增書店
天 津	新時代書局
各 中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各 大	華大書局
各 大	書局
都 慶	書局
安 昌	書局
南 都	廣州書局
廣 州	潮州書局
香 港	香港書局
重 慶	重慶書局

太平路二七五號
夫子廟貢院街
官巷口廿八號
琉璃廠一五五號
王府井
舊法租界濱江道
江漢一路三號
陸家山路（六眼井段）
太平路二二八號

求真雜誌

第一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一日出版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每月一日出版

本期定價一千五百元

編輯者 求真雜誌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上海南京路六六號
求真雜誌社

印刷者 上海山東路三三二號
中國科學圖書報社

總經售處 五洲書報社
△不許轉載 ▽

等級	地 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 二
超等	封底之外面	十二萬元	七 萬 元	
特等	封面之裏及正文 首篇之前	十 萬 元	五 千 元	
普通	正文之後	五 萬 元	三 萬 元	八 千 元

- 一 廣告費請先惠付
- 二 廣告版用白紙黑字如用彩印價目另議
- 三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A.B.C.

標

準

工

裝

中
國
服
裝
工
業
公
司
製
造
廠
商
場

質料上等式樣美觀
稱體舒適一致公認

康定路一〇九九號
電話：三二九二〇

南京路五六二號
電話：九一〇六四一五